周恩来选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周恩来选集

上　卷

人民出版社

封面浮雕像作者:刘开渠
包封素描像作者:伍必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2004.12 重印)
ISBN 7-01-003962-3

Ⅰ.周… Ⅱ.中… Ⅲ.周恩来(1898~1976)—选集
Ⅳ.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544 号

周 恩 来 选 集

ZHOU ENLAI XUANJI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张:62
字数:666 千字 印数:60,001-63,000 册

ISBN 7-01-003962-3 定价(上下):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周恩来

出 版 说 明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在白区工作和根据地工作，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等许多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需要，编辑出版了这部《周恩来选集》。选集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著作，下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

周恩来同志写过大量的文章、文件、书信、电报，做过很多重要的讲话。由于过去艰苦的战争环境，那时的许多文献未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尽可能地把周恩来同志的著作和讲话记录收集起来，收入选集的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不少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收入选集的著作，凡是周恩来同志在世时公开发表过或有手稿的，都保持原貌，只做了少量的字句和史实的订正；

对讲话记录稿做了文字的整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著作，还做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卷末。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目　录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5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6—7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8—13
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14—18
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19—22
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23—28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29—43
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29
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33
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34
红军与群众……35
红军的组织与训练……37
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39
红军中党的工作……40
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42

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一九二九年十月）……44—47
关于武汉工作问题（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48—54
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55—58
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一九三三年一月——
三月）……59—69
一 一月二十七日的电报……59
二 一月三十日的电报……61
三 二月七日的电报……63
四 二月十三日的电报……64
五 二月十五日的电报……65
六 三月二日的电报……66
七 三月四日的电报……66
八 三月十六日的电报……67
九 三月二十日的电报……68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70—75
一 与宋子文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70
二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72
三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73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九三七年七月
十五日）……76—78
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十三日）……79—80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一九三七年
十一月十六日)……81—87
一　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危机……81
二　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83
三　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86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8—91
今日青年运动的性质……88
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89
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92—100
一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92
二　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与内容……95
三　政治工作的组织与方法……99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一九三九年三月)……101—109
一　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 101
二　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 103
三　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 105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一九四二年一月)……110—111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春)……112—124
我的修养要则(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125
致柯棣华大夫家属的慰问信(一九四三年三月
二十二日)……126—127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128—132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133—141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142—156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142
二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145
三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150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152
五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155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157—187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 157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163
三 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168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175
五 党的各项政策…… 179
六 “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183
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188—189
论统一战线(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190—220
一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190
二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207
目前紧急要求(一九四五年八月) …… 221—222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223—224
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225
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226—232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233—235
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236—237
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238
悼李公朴、闻一多词(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 239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240—241
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十六日)……242—244
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245—246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的讲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247—250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251—261
一　一年来的谈判情况…… 251
二　一年谈判的经验教训与将来的前途…… 260
评马歇尔离华声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262—267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
文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五月五日)……268—271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一九四七年九月
二十八日)……272—282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一九四八年一月)……283—286
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287
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
二月二十二日)……288—296

关于土改和整党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297—300
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一九四八年
三月七日）……301—302
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三月
八日）……303—304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305—306
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一九四八年七月
二十七日）……307—309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310—312
致郑洞国信（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313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314—325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一九四九年四月
二十二日）……326—330
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331—343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
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344—358
一 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345
二 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 351
恢复生产，建设中国（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359—365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一九四九年九月
二十二日）……366—371

注 释……372—437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争斗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1〕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何以于国民党〔2〕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前政治争斗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愈加团结和互相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的回答：

（一）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

---

* 一九二六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发表于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三十七期。

利益既不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前驱。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二）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3〕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4〕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二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地表明之必要。

（一）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他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

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趋左倾，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5〕，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的敌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的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

本党，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在已有组织的民众，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蒙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的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时如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庚，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6〕这些严厉的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摭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胜利。

我们最后高呼：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

郭沫若来〔7〕，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8〕，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9〕，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10〕。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11〕、严重〔12〕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13〕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

---

* 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同志等。

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隤。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14〕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同志们：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国民党只是一个官僚政客的集团，此外则别无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都进入我们党内来；尤其在国共合作时代，又加入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所以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八七”会议〔15〕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切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但是，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要使党布尔

---

* 这是中共中央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发布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这部分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什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

第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党员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机械地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域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地肃清。

第二，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

第三，个人的意气之争。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

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气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

第四，小组织的倾向。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同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

第五，工学界限。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地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制”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会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械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

地规定指导机关中工人成份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原来那些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

第八，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负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求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九，把党看成救济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的机关，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党部工作。加之同志们如果继续不断地脱离社会的职业，而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联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

第十，消极怠工。许多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地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的党，只要全党同志坚决地一致地奋斗，少数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中央受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6〕的委托，坚决地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确的倾向继续猛烈争斗，尤其在党内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同志们！中央有决心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一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中央指出下面几点为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标准：

第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首先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增加党的工人的成份，集中注意于全国产业区域的党的组织的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主要的道路。

第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

第三，党员的职业化。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间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党员不依

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第四，支部生活的改进。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地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订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究没有接近的时候。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它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去年年底卢冬生同志〔17〕来，得到你们的报告，当即进行了研究，写信作出答复，并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6〕决议案中规定的我党总的政治路线、目前革命的形势以及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告诉你们。信系由冬生同志带回去的，想现在已经收到了。

兹又得你们去年旧历十二月初七日信，得悉你们不畏困难，带领同志及士兵忍饥耐寒地作了英勇的武装斗争，发动了不少的群众，并夺取了敌人许多武装，肃清了一些反动的民团，这些都是对的。

根据你们这次来信，中央尚有下列的指示：

（一）暴动问题。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在农村斗争中，自然不能说没有从日常生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以至暴动推翻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

豪绅政权、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和事实。海陆丰、琼崖、万安、黄安、醴陵等区域的苏维埃虽然失败了[18]，但土地革命在农村中的发动与深入，仍然使农民有由日常斗争走到武装暴动的需要。故农民暴动的直接行动，我们不但不应加以阻止，且应对农民自发的暴动极力加以领导，对农民的武装斗争极力加以扩大，使群众对于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念日益明了与热望其实现，并使这一行动能渐渐与城市工作配合起来，得到城市的领导。这样的农民暴动才真是群众创造的，才较易持久，才能发动和影响更广大的群众来拥护，才能从群众的直接行动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假使你们所领导的群众斗争，统治乡村的豪绅地主还没到动摇恐慌的时候，还有大批武装力量来镇压你们，群众斗争还没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还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微小要求，甚至还没做抗债、抗租、抗粮的行动，群众的发动亦不广大，则这种斗争即便是有了武装冲突，仍然是一个游击战争的局面，还不是建立农民乡村政权的武装暴动。对此，你们应分别认清。

（二）游击战争。从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19]经过看来，你们发动了群众，镇压了豪绅，收缴了反动民团和警察的枪枝，这些都是合乎游击战争的原则的，是对的。不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倾向，今后尚容易犯而应注意者：第一是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游民无产者心理的反映，它足以

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的发展，我们在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打倒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第三是散漫而缺乏组织。至于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这些当然是你们能够了解而且正在进行的。关于没收土地问题，六次大会已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这点你们在工作中亦须注意。

（三）游击区域内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问题。我们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不过，在革命空气高涨的时候，很容易把一切组织公开，而不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及至游击队一走，一切组织随之瓦解，甚至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牺牲于清乡军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无异于自己向敌人告密。过去，有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都犯过这种错误，所以你们必须特别注意。无论游击到什么地区，必须告知当地党部及当地的革命群众的组织，注意保存秘密，预备在红色势力被白色恐怖压迫时，还可以继续工作。

（四）游击队中党的组织问题及训练问题。你们现在在前委之下组织一个支部，管理全军党的组织，只要工作上感觉方便，也不是不可以的。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此外尚应注意者，

是红军中的党组织，仍须保存组织上的秘密性。至于训练问题，党的训练是加强军队纪律的，党的纪律也是帮助军队纪律无障碍地执行的。自然，红军的军事训练不能同于军阀军队的方式，施行强迫的和机械的军事纪律，应在党员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得到全体兵士的拥护。正因为这样，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党的组织要发展党员的自觉性，比较明了的同志应在思想上帮助尚不明了的同志，使一般同志咸能注意自觉地遵守纪律。党训练、教育同志，应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不但自己严格地遵守军队纪律，还能成为士兵的模范。对杨维藩的问题〔20〕，如你们所云，杨是犯了不少的错误，你们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是对的。不过以后训练同志，应特别注意教育方法。

（五）目前政治局面及你们今后的出路问题。目前，反动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冲突，正由酝酿而加紧而准备更大的破裂——军阀战争。关于目前政治局面的详细情形及我们应付的策略，中央有两个政治通告〔21〕，兹另抄录寄上，此地不多说。在这个政局之下，虽然可与你们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同时湘西、鄂西一带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还缺乏基础，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你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

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

（六）发展的区域问题。鄂西、湘西发展区域究竟以何处为最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湘西、鄂西的实际情形尚不十分明了，不能具体地答复。在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不过这些条件很难俱备，你们可斟酌实际环境，取这些条件最多者而选择之。

（七）派遣军事人才问题。你们军事人才缺乏，我们亦久想多派军事工作同志到你们那边工作，不过因为交通的阻碍，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以后有可能时，自然可以多派些人前去。

在白色恐怖下
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关于山西党的组织，中央最近依据全国组织的变动，有一新的决定，特分项说明如下：

一、自“八七”会议〔15〕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于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日益削弱，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党部机关尤多形成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生活相隔绝。因之自中央至支部有层层机关，而工作效能极其微弱。有时且因党的上级机关一再破坏，各地党部唯一的办法，便是要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复。中央过去确也循着这个路线，派人至各省恢复组织。结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动，新的关系不能发生，甚至旧的基础也日益缩小。工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于是这个架空的组织，在社会中便极易为敌人发现，屡遭破坏，在党内因有了这些不落实际的机关，反足以助长同志依赖机关、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因此，中央特改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指示信。

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嗣后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如果超越了这一基础工作而谈恢复，而先立一上级机关，则必致基础没有，徒然发生一些个人的关系，牵引这些同志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无职业，无社会关系。这种人越多，越妨碍党的下层基础的恢复和建立，于是这一机关越隔离群众，越隔绝社会，形成一架空而不合实际需要的组织。

二、依照上项说明的组织路线运用到北方党部，山西省委便成为目前最不必要的组织。如强行组织起来，必成为一空架子机关。汪铭同志〔22〕来信还主张调一批人到太原，结果必如上项所说，因为有了省委这一级空架子机关，于是又团聚了许多同志离开社会的关系而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这是最妨碍深入群众工作的。故中央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23〕兼管。

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大同由京绥路方面建立关系）。目前第一步工作，便应先在这些地方寻找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建立党的基础。工作恢复开始，党员的线索并不求多，重在质量的选择，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主要的还在产业工人，即无产业工人之地，亦应注意寻找手工业工人及乡村中雇农贫民。知识分子，必求能在社会中生活活动的人，如与社会一无关

系而又畏怯深入社会，不努力寻找职业，这种人从前即便是同志，现在找到也无甚利于党，这种人越多，反而越易使党停留在这些与社会隔绝的流落分子圈中，而不能建立社会基础——党的阶级基础。

假使在太原、榆次这类地方，仅只找到几个同志，最初便须以支部的形式开始他们党的生活。主要的工作自然须依照中央前次致山西的信去做。要能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以发展到行动，并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我们的战斗员。假使我们能在每一地方，得到几个能深藏在群众中、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同志，则便是仅仅这几个同志，便是仅仅一两个工人支部，也会使这一些组织成为山西工作发展的核心。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在县、市委没有成立前，几个支部并存时，可指定一个较健全的支部为特支，指导其他支部的工作。中心县、市委须指导其他邻近县份。

三、根据上述的办法，目前山西实无集中一部分同志到太原的必要。便是太原的工作，也只能设法在当地找有社会职业或下决心找社会职业的同志，去开始恢复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基础。

顺直省委应根据此信所指示的办法，函知汪铭同志至天津面商；依指示的区域，速即计划如何用巡视方法去寻找各地在业的同志，开始恢复中心区域的工作。汪铭同志得此信后，

亦应速至顺直省委处面商。

* * *

河东有七县范围[24]，工作不可忽视。在目前春荒期中，主要的斗争固在扩大借粮分粮运动，但斗争的对象宜多领导着向地主方面进攻，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使农民斗争专停顿在这一运动上，宜从抗债分粮运动发展到农民反抗地主的日常斗争。只有斗争的范围日益扩大，斗争有继续不断的小胜利，然后农民运动才会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才得在北方开始进行。这一点很重要的指示，望你们于指示河东工作时特别注意。

对士兵运动和土匪、民团等工作，也望依照中央的工作计划指示河东特委。

彭杨颜邢四同志[25]被敌人捕杀经过*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时时合作以压迫工农群众，以屠杀革命领袖的。尤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自“四一二”[26]以来，在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铁蹄之下牺牲的已经有几万人；现时关闭在西牢，在漕河泾，在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的，还有成千以上的工农群众、革命战士，过着那无期徒刑的岁月。

近来因世界大战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战争还在继续，而群众斗争又在日益开展，于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乃更加紧地合作，向着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施行更残酷的进攻。彭、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切的合作、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暗杀！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

---

*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捕人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27〕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28〕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七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至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二十八日清晨即转解

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29]，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钉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30]，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31]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们相聚谈话时，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可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

在三十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五人复审。司令

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公安局包探多人，司令部副官几个，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法院在特别法庭开审，不许人旁听，问辞与供辞如上次。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些，并未将彭、杨等同志罪状究是些什么公开宣布。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法官等并不注意，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直至彭、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上海英文报上忽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这一复审，简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他们想以法律的手续来欺骗群众，但又深恐怕群众晓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知暗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屠杀成河的血，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心，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谁还管你们的鸟法律！

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

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当着彭、杨五同志初被捕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夸功报告。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狗们寝食不安，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

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中的不知几多！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个革命战士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的确，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故敌人消灭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压迫革命之最残酷最恶

毒的办法。我们只有努力于群众的斗争，加紧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力量足以消灭白色恐怖，消灭敌人的屠杀，则革命的胜利便将临近，敌人的统治便届末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赎今日的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尽了彭、杨四烈士的遗志！才报了我们被压迫阶级的大恨深仇！

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来暗杀革命领袖，我们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回答，却永远是赤裸裸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仅只这一点差别，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利器。因为只有公开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只有群众力量才能消灭敌人！惯于阴谋暗杀的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便要在这公开的阶级斗争中一齐消灭，一齐死绝！

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革命先锋战士们！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我们的奋斗不绝！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地前进！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军前委并转全体同志：

陈毅同志来〔32〕，详谈一切。中央于其口头及书面报告后，决定给前委以下列之指示：

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

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33〕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加大了些，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地向前发展，因此反蒋的军阀混战又由酝酿至于爆发。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定了航空合同〔34〕，英帝国主义定了中英海军协定〔35〕，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36〕的急进，各帝国主义都努力在华的军事布置，这都表示帝国主义间互相冲突的尖锐化。中东路问题〔37〕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露骨表现，亦是各帝国主义在开始战争前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成了军阀混战的

---

* 这封信是陈毅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同志审定的，收入本书时个别段落没有选入。

主要动因。再则蒋桂、蒋冯战争后，并没能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什么实际利益，固然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的封建势力却又抬起头来，这乃资产阶级本身力量微弱必须拉拢封建势力以自固的必然命运。资产阶级利用封建势力去打击封建势力的这种企图，不但不能解决两个阶级的矛盾，而且成为军阀混战的又一动因。又中国军阀因数个帝国主义的唆使，中国经济破产的加速，庞大军队需要财源维持，因此为各自争夺地盘与饷源又推动着军阀混战的危机。上面这三种矛盾，是军阀混战的动因，亦是军阀混战所不能解决的。每一次混战只有使这三种矛盾加深。目前反蒋的军阀战争〔38〕就是上次蒋桂冯混战的继续，这次混战爆发后，也当然要继续发展下去，除工农兵暴动的力量而外，绝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解决引起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这是我们应该坚决认定的。

目前蒋系政府把持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外得了帝国主义承认，想独揽出卖民族利益的特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财权及重要军械制造所，自然要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全国其他军阀各派的反蒋联合。蒋系除浙江比较统一外，其余各省都有着反蒋的势力。蒋的嫡系军队号称九师，此九师有些还系改编别人的部队，同时有改组派〔39〕从中活动，所以亦包含有反蒋的分子。这些，是蒋本身的弱点。在反蒋方面以汪陈派的改良主义〔40〕的理论为旗帜，但没有一个中心势力。南方各省散布着不少的反蒋力量，在表面上可以为改组派利用，但实际上还各怀鬼胎，如张发奎、俞作柏都想攻下广东，而彼此则不相下。冯、唐、朱诸系军阀〔41〕则想攻下南京、武汉，而本身的利害又

各冲突。北方阎、张两派〔42〕则自知无力统治南京，故始终有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企图，对于拥护改组派便不十分积极。同时各派部下都有被蒋收买之事，阎部下另成系统与蒋不无关系。奉张内部有新旧之争〔43〕，新派自杨、常〔44〕死后势力大衰，张学良对于旧派已不能如意支配，旧派则忠顺于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入关的企图十分积极。中东路问题发生后，显然与蒋有冲突。这都是军阀间不能协调互相排挤的实况。张发奎事件〔38〕发生，显然是改组派反蒋运动开始爆发的第一声，武汉战争、两广战争都有扩大为全国混战的可能。如蒋得一时胜利，混战局面并不能因之消灭，且必然要继续发生；如改组派胜利，则小军阀割据局面更要加多。军阀战争的目的只是争夺反革命政权以便于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夺取地盘以加紧剥削工农，反蒋与护蒋两方皆是如此的。党在军阀混战中，应该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军阀混战。这一工作须与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这是走向以工农兵暴动的力量消灭军阀战争的正确道路。

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其在红军中更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应付敌人“会剿”是红军经常应注意的问题，不可因为军阀混战爆发，便松懈起来疏忽起来，尤不可因军阀混战暂时休止，便恐慌起来。我们应认清军阀“会剿”红军，有其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常常使“会剿”不能完局反而便利于我们的发展，但并不因此便使我们不注意“会剿”，不下决心去与敌人作艰苦斗争了。前委过去尝根据红军近邻军阀的行动来判断整个统治局面的稳定与动摇，这样的分析是

不对的。前委要十分注意纠正军事同志以红军为革命本位的狭隘观念。根据红军部分的环境去观察整个革命形势，这是万分不够的，而且一定要陷于错误。军阀对红军曾三次“会剿”，每次都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面固然是在共同进攻革命势力，一面却又是军阀为了准备自己战争，必须先求解决红军以固后防，过去湘、赣、粤三省“会剿”以及最近闽、赣、粤三省“会剿”皆是如此。最近蒋派刘和鼎入闽〔45〕，固然为的进攻朱、毛，但还有一个解决张贞〔46〕的任务，因此闽军每一部分都互相戒备，对于进攻红军反互相推诿起来。粤军在二陈冲突〔47〕、两广冲突的形势下面，虽然有入闽部队，现亦急急撤退。金汉鼎〔48〕部自朱培德失掉江西地盘〔49〕、王均〔50〕调蚌埠后，独处赣南，此次又参加改组派运动，对红军几月来皆采取防御性质。这就是三省“会剿”的实际。红军应该采取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认识整个的敌人的形势，团结广大群众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要存丝毫退却苟全的犹豫念头。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一个条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在目前反动政局走向崩溃过程中，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地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

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

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

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的任务的重大。

至于红军是否应该固守一个地区的割据，这个问题你们在行动中常常碰见。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在一省或几省以上的政权就不然，因为它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总之，农村的政权或游击队应该是一个斗争的单位，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保守必然要失败。反之，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

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若经常停滞在边境，在缺乏斗争的某些边境，将减少红军的政治意义。对于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行游击，以驱逐反动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地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绝不可有保存实力观望时局的等待倾向。固然亦决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人作殊死战，致非牺牲偌大兵力，不能有胜利把握，而敌人又可从容退去，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这种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但这决不能动摇围缴敌人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必要信念。红军不从斗争中锻炼自己绝不能发展。我们有了避免战斗的观念，必然要错过许多可以使自己发展的良机。这是关于红军发展的主要几点，是最值得注意的。

关于红军战争中之分兵与集中问题，过去四军各级党部讨论中间曾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小目标各个自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

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至于全军如集中行动，当然有一些困难，如行军、宿营、给养等之不轻便，但这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技术上的困难，绝不能因此而取消集中指挥的必要条件与忽视了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伟大作用。

关于一般战术问题，如前委来信所提出之波浪式推进，兜圈子以及十六字诀等办法，应就实际情况去运用，不能定为一个原则。前委在两年奋斗中已有不少经验可以运用，中央在此不作机械的指示。

红军与群众

前委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所到地区豪绅等多已闻风逃窜，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有苏维埃区域的党均忽视了这个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

帮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

红军到一地区不要只是找地方党部，应该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开联席会，发生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在宣传上，在斗争上，都要与工农会协议共同去做，红军不要单独去干或者只是发命令，然后才可以扩大红军在工农中的政治影响，提高群众对于自己组织的信仰与效能。如群众尚未组成工农会，则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

红军对于苏维埃政权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政权的基础。要提高对农会的信仰，一切问题都拿到农会去解决，做成转变为苏维埃的基础。例如一切政治布告等要与农会共同联名发出，增加群众组织的威信，使群众相信自己政权的力量。

红军的群众工作，四军过去有相当努力，兹特别指出重要几点：第一，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致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第二，关于宣传工作务求其扩大，不要只限于红军游击区域以内，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则影响更大。第三，关于组织工作，如反帝组织、拥护苏联组织、雇农工会及其他的平常有助于革命的临时组织都很重要，要用各种方法去建立。第四，关于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而且这一工作要特别加深。第五，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时固然做不到由群众组织来担负红军给养，但在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党与红军有时可斟酌

情形在群众中募捐，尤其红军的给养，更应在群众中举行盛大的募集以扩大红军影响。关于经费支配亦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一切经费的开支应多用在群众工作之支付上，绝不要大半作为党费开支，养成党之腐化。第六，对于武装工农问题，四军同志中尚保存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以致工作没有做好。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把群众与红军分做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固然有些地区群众斗争尚未起来，先发给以武装不能有多大作用，或者红军枪不够分配时，是可以暂不发给的，但需要发给时，一定要纠正过去的不好倾向。同时，派人去担任农军的训练，亦甚重要。

红军的组织与训练

（1）红军扩大问题。红军扩大与红军生存问题有莫大关系。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扩大的路线，应该从广大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帮助。红军所到区域，应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大会，鼓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同时，如能有机会收缴敌人枪械时，不要轻易错过。

（2）红军的成份与来源。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份来改变红军倾向的。

（3）组织系统与编制。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

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这一个办法目前不必马上执行，以免徒为一个空心机关，至少应在闽西、赣南、东江三地区域工作扩大能开联席会时，再设法执行。关于红军编制，最要紧的是使之能适合于游击动作，指挥单位不要过多，军事组织及名称不必拘于一个固定形式。

（4）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

（5）兵委的组织。四军中兵委过去有成绩，其组织路线也很正确。其职权规定为监督军队经济，参加军队管理，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做群众工作，与军事机关的关系用报告建议而不能直接管涉。发生特别事件，政治委员有解散兵委之权；兵委开会政治委员列席为顾问等。这些规定虽然较之俄国红军兵委权力扩大得很多，但在目前红军游击时期是可以适用的；不过要注意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否则于斗争是有害的。

（6）政治工作。军与纵队设政治部，营连只设政治委员，这是可以的，其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

（7）军事训练。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不爱严格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

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

（8）军队中民主化问题。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对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9）妇女参加红军的问题。对于革命妇女可引导她们参加农村斗争，不必加入红军，四军过去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对于农村的妇女运动，红军应扶助之。

(10)红军的纪律与处罚。应做到使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裁制违犯纪律的人，坚决地废除肉刑。至于军事上所规定之一般纪律，可以斟酌实施。

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

（1）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

（2）筹款标准，主要的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这一点，四军执行得很好，可应用到其他游击队伍中去。

（3）募捐亦是红军筹款的一个办法，四军要应用这个办法，可以在群众中组织募捐委员会，特别要向富农及中小商人募捐。

（4）对中小商人及富农态度。我们为实现党的政纲所规定及为工农经济流通与贫民利益，在城市不举行经济没收，这是对的。城市的政治没收应该执行。对富农及中小商人要向其募捐，并要防止其反动。

（5）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这是对的。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

（6）经济组织。对红军的给养费用可由兵委审查，其他特别开支不必要由兵委审查，将来应由群众政权组织决定和审查。

红军中党的工作

（1）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一般的可以不必设立营委，营部可成立直属小组，一营单独行动时，可委托营的支部来指挥，但此点前委可斟酌采用。

（2）党的工作路线。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

（3）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

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4）团的小组。团应该成立小组，现在指定成年人做青年工作即以之为团的小组，这个办法是不好的。红军中团员与党员应有划分，连支部中设CY〔51〕小组属于连委管理。纵委前委中设青年工作科，表面归政治部，计划并指导CY小组如何在群众中做青年工作。前委更须帮助所到地区的CY工作。

（5）组织上的争论问题。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6）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7）成立边界特委问题。在几省边界工作可以联系，能够指挥时，可以成立特委，目前则尚不需要。如今后工作发展，前委即可负责特委的责任，届时再报告中央指定名单，或开边界各县代表会议选定。

（8）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

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

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界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两广军阀混战成相持局面而且蔓延及于全国，红军即可向潮汕方面游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向惠属方面逼近。如蒋系军队失败，红军应位置于粤、赣大道左右或其败退所经之路围缴其枪械。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

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前委对赣南、闽西的游击工作亦要同时注意，要与该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系，然后才能使其与红军四军及东江斗争相策应。

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专此。

革命的敬礼！

中　　央

托洛茨基反对派[52]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53]上说：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31]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活动情形与反党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有人说，反对派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起了反对派的介绍作用。现在，我们指出反对派发生的几种主要的客观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时，很注意如何引俄国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宝贝”不但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所利用，即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一样地看上了。在联共的反对派坚决地固执他们的路线时，欧洲资产阶级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们分裂联共的组织，破坏联共的正确路线。在中国，胡汉民[54]、戴季陶[55]、周佛海[56]，都企

---

* 这是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所做的报告。

图借着宣传反对派以分裂中国党。中国的统治阶级恨不得抓住中国党内的这一工具，以达到消灭中国革命领导者的目的。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容许反对派在中国活动。这是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俄国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是如此。中国党自“八七”会议〔15〕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在组织上有相当成功、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直到六次大会〔16〕，才有相当成功；然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还都是待机而动。这是中国发生反对派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结合之思想上组织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国党的党内生活，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健全。虽然在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引进工人分子入党，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坚固地建立起来。因此，党的生活上，常发生动摇的现象。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在上海，有些中心的产业支部并不巩固，有些产业支部非常缺乏政治生活，因此，斗争胜利了，支部就活跃；斗争失败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瓦解的。这表明政治路线还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完全巩固，不但反对派可以借此活动，即机会主义者亦容易去活动。这是第三个客观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这是第四个客观原因。

尽管过去没有发生过反对派的活动，然而有了这四个原因，就必不可免地使中国有反对派暂时活动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回国的学生与机会主义的复活。

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四点：

第一，必然不可免地要与统治阶级勾结。《新生命》〔57〕已经登过关于反对派的文章。将来反对派更要利用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关，以进行其帮助统治阶级反党的活动。如果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了，他们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当前实际问题上表现他们的反党路线的宣传与活动。他们在“五卅”〔3〕纪念时，宣言号召同志向党斗争，要比反帝国主义斗争更重要，客观上毫无疑义地是帮助敌人。“八一”示威〔58〕，他们又认为是盲动主义，反映出许多失败的情绪。在论调上表现出极右的悲观的取消主义。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实行其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他们借着停留在支部内，以动摇下层群众，并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利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当斗争困难时，反对派在宣传上可以说出极左的口号，如“没收工厂”，以使工人阶级孤立，并引导工人群众幻想未来的

天国而忽略了目前斗争的实际意义；反之，在实际问题上却又提出极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无出路的消沉状态。

第四，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结合。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因为固执自己的路线，现在既不能深入群众，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纲，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样，反对派的政纲，正好在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上，在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与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于是就被他们利用了。而反对派的策略，也正是要利用这些分子帮助他们进行反党的活动。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59〕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诬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必须提到支部中，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关于武汉工作问题*

（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

第一，我们要决定武汉的工作计划，不仅要从客观形势上去了解目前工作发展的可能及其趋势（这一点我们已无可怀疑与争辩），更其重要的还是目前我们究在何种主观的可能上去发动工作。依据你们许多来信，都证明在今天的武汉，我们的主观力量的确还是很弱。严重的是，党员团员及赤色工会〔60〕会员总共不出三百人，支部生活多数没有，主要部分的产业工人组织微弱到万分，各级党部的关系非常隔阂。尤其严重的是，下层群众的实际情形还不能反映到指导机关中来。在这样模糊的主观情形之下，要想定出一个切实而具体的计划，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钧兄〔61〕几次来信都说，不能知道下层群众情形是最苦痛的事。中央因此更加严重指出：如不

---

* 一九三〇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八一”、“八三”会议上，李立三同志又要求在南京、武汉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党、青年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出国，八月下旬回国，九月中、下旬出席并参与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这篇文章是在三中全会前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的第一部分。

能知道下层群众实际情形，不仅工作计划定不好，便连你们所说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也还与实际行动离着很远，因为这中间还找不出党的领导作用与组织力量，而没有这些，是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的。所以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弄清（不仅是先进的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不仅要注意一些先进勇敢分子或是少数干部所说的“现在不是谈工钱的事，而是大干问题”，“现在只有拿武装来干，才有用处”等等，而更加要注意的，还是大多数群众现在还没有人领导他们去作任何的斗争，大多数群众现在还没有造成可以干的组织力量。即使这种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情绪是大多数群众的，我们也还不能说大多数群众有了这种情绪，革命便可达到胜利。相反，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观点去了解，即群众不愿小干只愿大干的情绪，是对于极端白色恐怖的反感，是对于广大农民战争发展的同情；从这种反感引导到坚决的斗争上，还须我们做极艰苦的工作，从这种同情引导到工人群众领导和参加农民战争的决心上，还须做很多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工人阶级只愿大干，而没有可以大干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尤其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大干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造成大干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不是仅仅以党的政治口号去动员便可以造成的，尤其不是仅仅以大干的口号即是以武装暴动的口号便可以造成的。少数分子的要武装，多数群众“普遍地希望红军来到武汉，一切事情都好了”的观念，这不但不是群众决心要大干的表示，且反而是依赖红军的怯弱表示了。所以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

罢工与示威之不断开展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绝对不是没有这些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开展与锻炼，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便会突然存在的；也绝对不是没有这些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领导与发动，党的领导便会自然巩固的。这是你们决定一切策略与工作计划的根本观点，望你们对这一点多加注意。

第二，因为你们在主客观上有了上述的缺点与困难（缺点是你们注意力偏向一方，困难是对下层情形还很隔膜），所以你们所定的“目前党在工人中主要的策略”还是偏于原则，还是偏于在“准备武装暴动”本身上做文章，而没有注意于策略运用的实际意义，没有注意于在武汉特殊情形下做一些具体办法的规定。所以你们决定的几条办法，与中央通告无异，可以适用在任何地方。现在，我们指出这几条办法中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条，你们说：“党只有在政治上去动员，才能迅速夺取广大工人群众去实际组织武装暴动。”这样的解释，显然将日常斗争与准备武装暴动对立起来。这样的解释，显然忘记了发动群众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正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中争取广大群众的最基本的方法。

第二条，你们主张由省总制定武汉工人及各业工人的要求的纲领来组织同盟罢工，这是绝对不够的。假使没有各厂各业的工人日常斗争的发动与领导，假使没有不断的各部分工人的罢工与示威，而只注意于总的纲领的号召与鼓动，总同盟罢工是不会突然而至的。尤其重要的是失业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在现在武汉形势下，失业工人的数量一天一天增加，

在准备武装暴动中，他们更将成为主要的动力之一，故你们必须加重此种工作。

第三条，你们将“参加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与消灭国民党工会的策略对立起来，这更是不妥的。如果国民党工会有群众，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去争取群众大多数，直做到推翻这个工会为止。如果它是没有群众的，则我们便根本不必去参加了。不能因为现在黄色工会一天天国民党化与法西斯化，就认定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已根本改变。这是不实际的，而且会使一般党员机会主义地去了解过去加入黄色工会不是要消灭黄色工会〔62〕的了。

第四条，猛烈地发展赤色先锋队〔63〕是对的，但如果离开群众斗争，离开组织广大群众，专门等待武装暴动，拿枪就干，与群众日常斗争、实际生活一点也不联系，则赤色先锋队就会变成招兵式的武装别动队的组织。这不仅不能成为群众的先锋，而且必将离开群众很远，成为孤立的组织。现在上海就有这种危险现象发生。

你们累次来信提到武器的事，假使以此为中心来团结赤色先锋队，这将失掉赤色先锋队的群众性与夺取敌人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决心。在这一工作上，你们必须注意到兵工厂工人中的工作。武装要从敌人方面想法子，这是武装工人的根本出路。

第五、第六两条，你们提到党与团的发展，丝毫没有联系到斗争问题。这将埋伏着一种危险倾向，即是在猛烈地为准备武装暴动而发展党与团的组织时，将助长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接受“左”倾的空谈武装暴动，而不去领导群众实际斗争的

危险倾向。上海已有这种倾向发生，武汉必须预先看到。必须知道，在只谈武装暴动只要枪来训练而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说只有大干不要小干的动员之下，也同样会聚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在“左”倾的形式上表现出来。

第七条，你们提到产业委员会的工作，你们必须注意，产业委员会是一种临时的组织，是要聚集党内一些工运干部去推动与组织产业的赤色工会的。当产业的赤色工会以及各厂的分会已经吸收群众正式成立起来的时候，产业委员会便须立刻取消，退居党团地位，取消其在党内的直接指挥系统，推动各级工会发挥其独立的工会作用。所以产委只是党发展赤色工会的一种动力，赤色工会一成立，即须集全力于工会的独立系统的运用，绝对不容许再以党的产委来代行赤色工会的指挥职权。现时上海在这一组织方式中也正犯着使赤色工会退居无权地位的错误，望能引起你们预先注意。

第八条，你们提出加强反右倾的斗争是对的，同时“左”倾的危险也在党内继续发生。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自然，在目前右倾还是党内主要的危险〔64〕，尤其是在一般旧的干部分子中。

除了你们决定的八条外，还有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问题。过去将党与团合并在行委组织之中，不再存在团的独立组织系统，这是错误的。团是非党的组织，必须容许其存在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工作。团从支部起直到中央，参加党的行委组织是加重其政治责任，而不是与党合并。团本身的组织与工作

系统，仍应存在。过去的办法，你们应有所改正。尤其是青年工作，更须督促团加紧注意。团的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不调动。

支部工作的建立，是目前武汉工作中的最中心问题之一。如何建立支部工作，你们已知道很多。中央要特别指出的是，你们对于干部的分配与吸引，要特别注意于下层。许多中央派出的干部可以选择得力分子派他们到支部中去，即使不能立即入厂参加生产，也要他们能脱下长衫到工人群众中去，帮助工人党员建立支部生活。另一方面，你们要迅速地从工人斗争中吸引新的党员，吸引新的干部并引进他们到指导机关中来。所以，你们向中央要得力的干部，中央当然还要派人给你们，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从下层支部中坚决地吸引新的干部上来。

你们关于示威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的单独示威是失策，应准备发动广大的群众性的示威。从这点上也可推论到：只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号召，而不注意群众的日常斗争，不注意群众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不注意从日常斗争中发展赤色工会与赤色先锋队的组织，不注意从一切部分的要求联系到政治总要求，则组织总罢工示威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从斗争中组织自己，从斗争中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伟大的群众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才能造成党的坚强的领导。而所谓斗争又必须

从各部分的要求发展到总要求，从各种日常斗争、罢工、示威发展到总罢工。党的领导，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中的领导，便在于抓紧这些斗争，联系到总的政治要求，联系到总的行动，以准备最后的决战。

在这一原则下，我们要求你们，对于武汉工作要有最切实的计划与办法，要特别着重于中心工作之建立。在武汉，我们提出，铁路、海员、兵工厂、码头、市政、纱厂、黄包车夫是你们指导武汉工作的中心对象。

立三[65]路线的理论基础*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

我们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不仅是复述国际[66]的路线，必须对立三路线有彻底的揭发与批评。立三路线之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在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则它不会在党的领导机关起领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下面三个条件之下来认识立三路线之形成：1. 历史的条件，六次大会后有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2. 党内无产阶级成份薄弱，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了很大的数量，这使党的路线有忽“左”忽右的表现；3. 立三的思想，在过去的讨论中没有受到强烈的反对。这三个条件，帮助了它在领导机关中起了领导作用。

同时，我们在这里，必须认识立三路线之理论的基础：

（1）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国际来信所指出的，立三路线不懂得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及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这完全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报告以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67]中得到充分的材料来证明。当初立三同志分析敌人的力量时，总是只注意敌人的弱点，或将敌人的某一弱点特别夸大；估计主观的力

---

* 这是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所做的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节录。

量时，则只看到强点而掩盖了自己的弱点。所以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的进展问题，估量到帝国主义及统治阶级时，把他们看成是无能为力、只有等待崩溃的状态，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仅夸大了红军的发展，尤其对于城市工人斗争的发展及其觉悟性与组织性夸大了，不合实际。这两方面的会合，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自然变成为不正确的了。这是立三同志之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问题之观点。

（2）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在世界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也是如此。中央七十号通告〔68〕中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走向平衡。这一句话，在表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已经种下了以后错误的根源。在立三同志起草的向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之发展，不平衡其表面，平衡其实质。这完全否认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会上与陈韶玉〔69〕的争论，对这一点也完全错误了。立三同志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爆发必然地引起世界革命之同时的爆发。对长沙事件〔70〕，党的宣言说，中国革命之爆发必然掀起世界之普遍的武装暴动。立三同志想以世界革命第三时期〔71〕的特点来取消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他对于世界革命的观点，同时也就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他否认不平衡的观点，是将革命高潮解释成为直接革命形势。六次大会〔16〕的决议案中说，“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武装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就表明由高潮到直接革命形势，虽然中间没有万里长城隔着，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回国后的第一号通告却说，将来新的高潮的到来，武装暴动的口号将要从宣传的

口号变成为行动的口号，这便已经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模糊了。去年中国党接到国际十次大会的决议〔72〕，说中国革命运动已开始了新的高潮。在江苏省的代表大会上我曾说明这一问题，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个问题当时并未引起政治局热烈的讨论，只是在文件上有一点修正，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同时也就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立三同志说，坡的阿姆（подъём）的意义不应译作高潮，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如果这样，那末，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中“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一句话，便应改作“在总的直接革命形势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了。既是总的直接革命形势之下，那里还有什么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呢！当然，在他这样的认识之下，所谓今天是湘鄂赣之首先胜利，但必须得到武汉，武汉之首先胜利也就是全国革命胜利之开始的理论，是一点不奇怪的。所以他会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当然，这不仅是由于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一点，一切盲动主义、命令主义都同时爆发。

（3）组织观念不正确。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73〕的报告中，将主观力量放在革命发展的条件以外，而只分析客观的条件。他说革命形势一到，主观力量不成问题，例如“五卅”时期〔3〕与武汉时期。他虽然在“八一”、“八三”的会〔74〕上提出要“加强组织”，但这一

“加强组织”，他是认为革命形势已经一般的成熟，只要一组织便起来了。所以他只要用武装暴动的口号来号召，在上海则以四次暴动的口号来号召。这完全将组织力量放在革命形势成熟条件以外，实际上必然走到取消组织的路上去。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不仅取消了团，实际也取消了党。

（4）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立三同志对于红军及农民斗争之发展与组织，有奇怪的意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由农村来的人随便报告一些数目字可以帮助他，但根源还不在于此。在“八一”、“八三”的会上他认为：红军进攻武汉，工人必然会起来暴动。另一个政治局同志在《红旗》上说：单纯用红军进攻武汉，我们是反对的；但如果说红军逼近了武汉，工人斗争还不能起来，这也是错误的，工人一定会起来。立三同志之另一观点是建筑在南京士兵暴动的身上，他以为南京士兵一暴动，一定可以占领南京，响应武汉，引起上海总同盟罢工。因此，他以为红军逼近了武汉，武汉工人暴动，南京占领，上海暴动；同时蒋介石在陇海路的军阀战争中失败，冯玉祥〔75〕在河南也因农民暴动而失败；北方军队南下，北方空虚，则北方农民也可以起来暴动，因此要求蒙古出兵，苏联出兵。用这样的分析来决定与布置举行武装暴动，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观点，是想在军阀战争中取巧的观点。

（5）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立三同志在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中说：一省数省胜利的开始，也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民主革命政纲之中心的任务。所以他影响到苏代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用过早的办法，企图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纲。

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76]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月）

一　一月二十七日的电报

（甲）金溪战役[77]后，我军继取备战姿势，调动敌人与征集资材，即三军团开往贵溪亦本此旨。敌此次被我调动，一方企以信江之敌吸引我军，以抚州来敌截击我于金溪之北，一方则又因对我情况不明，深惧前辙，故抚州之敌前进极缓，且向北靠，至今日吴、罗、周三师[78]仍在泝湾、硫璃冈、黎墟一线。我方面军集中南移，只一天便达金溪东南部，以备战姿势吸引

---

*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统治中央领导机关。他们不仅提出了一条“左”倾的政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的命令是错误的。周恩来同志向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先后歼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敌主力十一师，缴枪万余枝。这里收入的电报，前八件是周恩来同志给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第九件是和朱德同志联合署名发布的命令。

敌人。但敌今日已侦知我主力不在金溪以北，故又改变计划，以吴、周两师集中浒湾附近，罗师退回抚州，二十三师仍西移乐安，回复其原定进攻部署。

（乙）我军决利用此两日时机，发动战斗员将金溪南之七八百病伤员一律后运至黎川地域，以便后方来运。俟敌二十三师明后日向西移动后（最好罗师也西移），我军即以十一军一部游击浒湾，一部佯攻南城，迷惑并牵制敌人。以十二军牵制邵武之敌，另以全力渡河，直攻南丰城，并准备在抚河西消灭敌人增援队，以突破抚河围攻线。

（丙）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只是后方连络远不便运输，主要还由于南丰、广昌、建宁、黎川的赤化工作差。但我之利即敌之不利。敌几次想在河东岸以一翼吸我一翼截击我之战略求战，但南丰、南城、金溪三次战役[79]，都因被我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而失败。故敌在抚河东岸作战，非俟其强有力之两个“进剿”军组织完备后，才敢猛进。上次礼西赵（南城）胜利后我以备战姿势在黎川待机，这次金溪胜利后我在金溪待机，都因敌不敢冒进坚守城防致不得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而必须转移地区，因此由南丰东而南城东而浒湾东。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上次东出邵武引敌，因我恐敌截击回师过早，致敌吴、周两师已半至硝石又复缩回，这证明一

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假使敌之抚河两强有力纵队已成，又如这次三军团逼近贵溪处于不利阵势，则战略便须改变。故十军渡河时，曾、邵、唐〔80〕等主张三军团过河攻贵溪，我们便立电反对。

（丁）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但须说明，这次宜黄、乐安战役〔81〕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其虽有主张放弃机械城防的，但必在我进攻与胜利调动敌人和消灭野战敌人条件下。我独立师两次袭击入崇仁，便由于我东岸的胜利和进攻。因此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

二　一月三十日的电报

甲、二十七日夜得确报，罗、周、吴三师企图乘我军南移，压迫我军于远距离外，定二十八日开金溪、左坊、琅琚之线，二十九日开珀圩、黄狮渡、琅琚之线，三十日罗师经礼西赵回南城，周、吴两师回浒湾。因此，我方面军乃更集中，准备在其三师分开时，首先消灭罗师。但二十八日敌仅达肖公庙、浒坊、琅琚之线，陈诚〔82〕更以“进剿”尚未准备完毕停止远追，于是二十九日敌复向回缩。今日十一师又开回浒湾、河西之东

馆待命，十四师、九十师集中浒湾附近，二十三师已西移乐安，五师到贵溪，八十三师二月半后来赣。蒋介石二十九日已抵南昌，其进攻布置当更加紧加速。

乙、敌不愿在布置完毕前，轻易冒进与分兵损实力，已甚明显。周至柔师现正急图补充，吴奇伟师正在整理，吴本人已往见蒋。在此敌情下，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击，仍可筹一笔款（金溪胜利后共得现款二十万），以利大战经费，并可加强十一军的赤化金溪、资溪，以更利于牵制敌五、六两师之编入“进剿”军。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移转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

丙、上述意见，朱、王〔83〕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三　二月七日的电报

甲、中央局命令攻南丰，我们部署意见：

（一）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二）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

（三）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四）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

（五）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

乙、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

动战中解决敌人。

丙、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丁、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四 二月十三日的电报

甲、昨日继续侦察南丰堡垒工事，只西北门外堡垒利用夜色可接近强袭。黄昏后我军开始攻击，与敌激战一夜，夺取敌人大小重要堡垒十数个。但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已夺得工事离城边尚远，城墙上又有炮楼。敌守堡垒多一班一排，最重要的不过一连，我攻堡垒费时久，险要的须围困。整夜激战结果，我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84〕及两团长均阵亡。攻城激战虽夜雨，士气极旺。

乙、十日，我十一军已牵制敌八师之一团于新丰街，十一日，二十二军又伸出里塔圩断其归路，故南丰敌为五团。今日，南丰敌在河南之一团，因夜中十二军在河东占第一个堡垒，亦撤回城内，并断浮桥，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两师由南城，一师由宜黄，两师由乐安。敌十一师已向宜黄开动。

丙、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队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五　二月十五日的电报

甲、确报，当我军在黎川时，敌大举部署为陈诚领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为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个师，集中宜黄、棠荫；第二纵队吴奇伟，为第十、第十四、九十三个师，集中抚州、龙骨渡；第三纵队赵观涛〔85〕，为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四个师，集中浒湾、金溪，以一部出资溪。四十三师集中宜黄、乐安间，为预备队。都限二十日前集中完毕。第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

乙、我军围攻南丰既急，敌即提前集中，以十一师十四日开至宜黄、棠荫，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开乐安，准备由东陂、黄陂、新丰市截击我军，现均向乐安前进。以第二纵队向南丰前进，十四日九十师到东馆，十四师亦有开动讯，十师尚未动。第三纵队集中时间与地点未变。四十三师向宜黄开，十四日到公陂，宜黄原有其一团。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

丙、我们现改强攻为佯攻与监视南丰之敌，准备消灭其增援队。敌又有改变进击路线可能。敌对我军猛攻坚城，认为可以损伤与疲劳我兵力，并吸引我于坚城之下，便于其增援队之截击与连续战斗，已定十八日开始“进剿”。

丁、现我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

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戊、猛攻南丰我军伤亡全数过四百人。

六 三月二日的电报

甲、我军与敌激战三昼夜，第三日本可将敌十一师继续消灭或击溃，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指挥均不易达到，故在第二日消灭五十二师及五十九师大部后，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十一师增援队，致昨日战斗未完全解决，只继续消灭五十九师，但胜利是空前的。本日，因敌二纵队三个师已于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丰市、东陂、黄陂，截我归路，我将陷于被包围中，且战场未清理，伤兵未撤，战利品到处堆积，故于今日在胜利中撤退，开始向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准备继续战斗。

乙、因此胜利，敌已纷纷调动，除十一师、二十八师已来河口外，第九师由南城今日抵杏坊，二纵队由南丰、里塔圩、新丰移至永兴桥、饶坊之线，明日逼近东陂、黄陂，三纵队一部一日已占领硝石，今日五师又被调龙骨渡，六师、七十九师则改在南城河西集中。

七 三月四日的电报

甲、这几天，敌完全处于被动。二纵队三个师原拟由新丰市截击我归路，嗣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消灭，乃改向黄陂开

进。及闻我军已离黄陂，敌十四师急由党口、饶坊北开演口，十师、九十师停在崇五都，十一师进黄陂，九师赶到河口，今日均未动。三纵队之第五师被调龙骨渡，今日又令由岳口回南城。三纵队现已改向南丰进，先头明日可到。

乙、闽敌刘和鼎〔45〕昨日率一旅一团进太宁。十九路军以区寿年师及张炎旅三日集中永安为右翼，以沈光汉及张贞师为左翼。右翼定八日进连城。这一部署是黄陂战役前预定的。

丙、陈诚中路军的进攻路线已改变。三纵队改走南丰，一、二纵队（现只五个师）或将更靠近，出东陂、黄陂、新丰市，求我主力决战于东韶、河口，而以三纵队趋广昌，出头陂、东山坝，截我归路。

丁、我军拟俟集中后（一军团带胜利品，经招携路较远）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八　三月十六日的电报

甲、北面敌两纵队各三个师靠拢并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进。今日其前纵队十四师始达新丰市，九十师达侯坊，十师达草台冈；后纵队九师达东陂，五师达黄陂，十一师达安槎、蛟湖。预备队七十九师在宜黄，有两团在河口，六师在抚州，许克祥全师在南城，刘绍先师在乐安、崇仁，余无变动。

乙、我们已调十一军，十八日可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并抑留敌进攻广昌之前纵队。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丙、我方面军昨日已开始移动，因敌两纵队太靠拢，故尚在待机中。但这是四次战役决定胜负的战斗，已下最大决心，准备一切牺牲，部署与敌三个师决战的阵势和动员。

九 三月二十日的电报

甲、敌情另电告。

我十一军已于十八日到广昌附近，拟于二十日起领导地方武装牵制向广昌去的敌人前纵队，并以主力阻敌回援，以掩护我军右侧背。

乙、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丙、五军团、十二军、宜黄独立团为右翼队，归董、朱〔86〕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以主力进攻草台冈、徐庄敌左侧背，以一部从摇篮寨方面牵制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十二军（附宜黄两独立团）应于二十日黄昏时到斜蕃附近，二十一日取捷路到侯坊上游适当地点渡河，占领灵埂山、三角砦一带，侧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并以一部领导宜黄老独立团，往石背、摇篮寨游击东陂之敌。新独立团往新丰市西南地带，挖毁由东向西的交通路（防敌回援），并警戒我右侧背。

（2）第五军团应于二十日到端溪附近，并派队伪装逼近侯坊游击。二十一日拂晓沿落马山、霹雳山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

丁、第三军团、第一军团、二十一军、独立第五师为左翼

队，归彭、滕[87]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先迅速消灭草台冈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三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界上、雷母山之线，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东边岭、亮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草台冈之敌。

（2）第一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三溪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大坪、徐坊、沚洲之线，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突击铁石坳附近之敌，以截断东陂与草台冈敌人之联系。

（3）二十一军（直受林[88]、聂[89]指挥）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王都、上堡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达古王坑、邱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进攻东陂之敌。

（4）独立第五师（直受林、聂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由吴城出秀山，由北向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警戒我左翼侧。

戊、两翼队战斗分界线由东边岭到东陂大路之右侧（道路归左翼队）。

己、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二十日在现地不动，二十一日随第一军团左后方前进，必要时由林、聂直接指挥。

庚、第一军团卫生部准备在长罗开设野战医院。三军团卫生部准备在徐庄、荫水开设兵站医院。后方联络线仍照作战计划规定。

辛、总部拟明（二十一）日到亮溪附近。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　与宋子文谈判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90〕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91〕、杨〔92〕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

*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严重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除掉蒋介石并取而代之。当时，中共中央坚持了反对新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同志为代表去西安。经过周恩来等同志艰苦的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不久，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三份电报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其中后两份是和博古同志联合署名的。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93]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12]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94]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95]。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

(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二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

与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三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

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丑、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

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

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甲、太原既失，敌正长驱南进，沪战亦转至松江，浦东已失。英美出头调解，日敌提出条件：一、沪占领区划为租界。二、华北自治。三、内蒙独立。四、取消中国捕鱼权。因此，沪、宁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晋局亦危。阎〔96〕留石口镇、隰县，集结其教导团、决死队、少先队〔97〕，坚持吕梁山脉，不来临汾，胜则发展游击战争，败则退河西，战事主持完全推之黄、卫〔98〕。黄已失信心，卫虽口头同意我们对持久战与游击战主张，但其心已不在晋，各军均纷纷谋退过河。蒋似已不如以前之严令坚守。对刘湘〔99〕，阎已希望其不会来晋主持。故灵石韩信岭之阻敌已无大望，敌直下风陵渡只是时间问题。

乙、因此，我意目前应：

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以此为一切动员的中心。指出凡要退过河的都是帮助日寇统治华北。

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改造，一致行动。分：（1）同情者，如决死队、教导团等。（2）有关系者，如许旅、赵师、孙军〔100〕等。（3）有来往者。

---

* 这是从山西临汾发给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志的电报。

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1）红军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已达万人。（2）山西各县游击队，知者十四县，有四千余人。（3）总动委〔101〕组织和领导的一千人。关于游击干部训练，各军区应自行组织训练队，收容各地青年学生及工农分子。

四、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此项成绩最差）。胡服〔102〕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提议华北扩大三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华北三万，请朱、彭、任下令规定办法，地方党政协助。

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方开始做，东线稍有成绩，西线因无兵较困难。

六、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103〕、彭真〔104〕去主持，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晋南以雪枫〔105〕为主，兼负责军政党委，以集中和统一党政军的行动。

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以及于省区。

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

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

丙、党的工作布置，由胡服电告。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危机

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具体地分析来看：

甲、在战局方面——日寇已占领上海，突破松江，我军防线已退至嘉善、苏州、昆山、浏河之线；华北方面，敌人自占领太原后，已进逼汾阳、介休、子洪镇之线；平汉、津浦亦有前进消息。日寇企图是想在稍加整理后，压迫我大军退过黄河南岸，以便其向全世界宣告：华北战事已告段落，上海亦已占领。它将从事于华北自治，上海中立，分化蒙回，捣乱华中、华南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口头的停战协定掩护之下来进行，以欺蒙列强，利诱汉奸。这比明枪真火来得毒辣！

乙、在国际方面——九国公约会议〔106〕，虽表示了英美的

---

* 这是在山西临汾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刊载于汉口《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二期。

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硬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能做到。因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意完全赞成日本说话，日本不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提出它的六项要求〔107〕，英美并预言，如果日本态度强硬，中国坚持抗战，他们将使九国公约会议延续下去，准备觅取新机从事调停。苏联因英美态度如此，自不能单独行动，虽说它在道义上在实际上已给了中国以有力的帮助。

丙、在军事上——中国正规军队现已用到相当的数目，而全民全面的动员，军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后方工作的改善，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没有开始。战争的失利，部队的损伤，给养的不充，这使部分的军人发生颓丧失望的心理。如恃着现有的正规军持久抗战，其胜利信心确已锐减。

丁、在民众动员方面——三四月来，不但政权没有开放，民运也没有开放。直到现在，党部仍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因此，包而不办是普遍现象。于是，许多大城市民运反不如过去局部抗战时的活跃，前线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民众武装不能组织。这是给日本造顺民，给自己造反对者。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由于上述的严重现象，遂至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而发生了下列的危机：

甲、汉奸政权的活跃——华北自治政府〔108〕，上海、华北维持会〔109〕，内蒙独立〔110〕，汉奸的活跃等等。

乙、投降主义的生长——亲日派的活跃，主张对日直接谈判；英美系的软弱，主张依靠英美谈判条件，没有自力更生的信心；对苏联失望的人，主张结束战争。这一切都是投降主义的变相。汪[111]说主和者是汉奸；蒋亦说抗战到底，目前讲妥协者是汉奸。政府给中国代表团的训令，亦说日军不从中国撤退，没有调解的余地。这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当头棒！

丙、特殊化[112]思想的增长——冀察特殊化的影响，至今尚引诱着许多人企图在此特殊化之下苟安。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而且这是制造汉奸、颓丧民气、出卖正义的过渡政治机构。故对日绝交十分必要。战败不能使中国民族屈服，特殊化可使中国民族万劫不复！

丁、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认为军事失败，一切都无办法，不是一拚求幸，便是退求自保。拚而求幸，胜已不可能，便更倾向于退过黄河以自保。果真在华北已无战的可能吗？如无可能，退过黄河也不能自保。故无命令自由退过黄河的，是等于让日寇来便利统治华北。

我们要为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要如此，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得到国际友邦的赞助，才能拒绝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调停，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二　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

抗战危机发生了，日寇更集中全力来加深我们的危机。其中心的一环，仍在压迫我军迅速退过黄河，拿着华北，好做文

章。上海原是其牵制方面，次作战线，谁知沪战中的损失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因而进迫苏州，现正向南京前进。但日寇的战略中心，第一步仍在取得华北。故华北的抗战如真告一段落，抗战的危机便严重到万分，而且日寇也可以喘一口气再干。

因此，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目前太原已失，华北抗战能继续么？能持久么？我们回答：绝对地能。

第一，假使中央能有得力的生力军开来，能实行各线配合的出击，能增加生力军到敌人后侧，改变过去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能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可转变目前的危机，进入胜利的反攻！

第二，如果上述这些条件一时做不到，甚至于敌人继续前进，占领了我们的渡河点——风陵渡，企图占领我们黄河要口，我们也还是有办法在华北在山西进行持久抗战。这持久战有下列各条件：

甲、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证以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恢复了十四个县城，烧毁了二十二架飞机，最近又夺回了南怀化〔113〕，击败了敌人许多前进的部队，就可以相信。

乙、在地形上，持久战也是可能的。因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线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识中国内地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存在与扩大。

丙、在气候上，外国人总不能较中国人适应，尤其是冬春两季，更于日军不利。

丁、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日寇侵略中国，不论他怎样欺骗利诱，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蹂躏的。故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敌人愈摧残，群众将愈觉醒起来，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奋斗。

戊、民众武装已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晋冀察边的广大发展，将是我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

己、政府领袖和军队的决心成为争取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条件。现在蒋、阎〔96〕及不少军队，正在加强着这个战争。我们还望他们有进一步的全局的布置。

庚、最后，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也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是红军改编的，他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

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这虽然会有一个时候，但它决不同于六年来的东北四省。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

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三　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

怎样来坚持华北抗战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问题，也就是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如何？最主要的，我提出四项问题：

第一，军队的改造。原有的正规军，虽越打越少，但打仗要用组织好了的军队来打，因此，改造旧军，成立新军，便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了。改造军队，目的不是在换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组织制度。在这里，今后在华北作战的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应采用“三三制”〔114〕，而附有游击队及轻便后方辎重与多数的通讯资材的编制。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提倡自觉纪律，保障部队与人民的密切关系。其三，部队的生活必须改善。政治生活要平等，连队经济要公开，士兵生活要提高，官兵要团结一致。其四，部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要使其能独立作战，分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其五，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这样的军队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指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开放政权。现在，全华北已不是中华民国的统一政权，而是日寇汉奸的政权。日寇的自治是伪自治，我们应该以真自治来发动民众，开放政权。因此，目前华北的政权，应该是国民政府一部分的地方政权。首先，它在制度上，应该是民主政治，应该团结全华北的抗日人民，不论何党何派何军，均应容纳他们的代表，来共同担当国事，主持救亡大计。其二，在组织上，应该从县区上施行地方自治自给，以坚持中华民国的正统，然后及于省区。其三，在政策上，应实行抗日的纲领。我们提议应该根据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115〕来实施战区的救亡政策。

第三，开放民运。华北若再不开放民运，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无丝毫迟疑地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首先，应向民众作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其二，要组织广大的民众在工会、商会、农会和学生会之中，并吸引他们到政治团体中来。其三，要发动民众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并联系到民族利益上来。其四，要组织他们在武装训练之中，引导其参加人民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并吸引到部队中来。

第四，肃清汉奸。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是争取持久战的先决条件。只有反对这些汉奸，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战争，而取得最后胜利。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日青年运动的性质

根据今天抗战的形势，我们来说一说目前青年的环境。

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3〕、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如今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

---

* 这是在武汉大学的演讲的第二、三部分，刊载于武汉《战时青年》第一期。

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然而我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我们青年不仅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

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

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

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

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我想，一个人不能自卫，便不能做人，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随时到直接杀敌

的战场上去。

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领导。我们得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动，去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必经的交通线……至少也得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活动不易。

第三，到乡村中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城乡。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要继续作战，继续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动员起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来。我们要改良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动员方式。有作为的青年们，因此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得注意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问题。最好能够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乡下有钱而不愿当兵的人切实负责赡养抗日军人的家属，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我相信会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减去许多磨擦的。再，我们还可以进行许多人民自卫的工作，准备将来配合着政府军的抗战。

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不能让华东、华南象东北四省〔116〕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我们要艰苦地在那残暴的统治之下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我们的救国组织发展起来，把我们被压迫的同胞暗地里武装起来，准备迎接我们正规军的反攻，与我们的正规军取得里应外合。

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分散到群众中去，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里去，那我们的力量是无比的！

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

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地展开。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我们要各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地方，去发扬我们自己的长处，去学习，去工作。

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抛弃以往的学习，而是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去发扬光大，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去把知识活用。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着最光荣的传统。今天，我们青年面对着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

我们去工作，我们要克服任何的困难，我们要解除任何的疑团，我们是勇敢的，沉毅的，艰苦的，深刻的……我们是抗战的支柱。

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远大的。

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一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

两个月全国抗战的教训，很清楚而迫切地把改造军队使之适合民族抗战需要的大问题，提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特别是尖锐地提在国民党的面前。

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只有在抗战军队中把政治工作实际地建立起来，才能把民族抗战的战斗力提高，才能把官与兵、军与民联结成一条心，象一个人一样，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到底！

当着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2〕，国民政府成立前，当时旧的军队尚未改造，革命军队还未建立，所以虽有二十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117〕各地，而胜负不决。在黄埔军校〔118〕第一期毕业，新的国民革命军成立了两个团后，仅仅以新成立这两个团为骨干，举兵“东征”〔119〕，即得着东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克复潮

---

*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上海出版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小册子，未标明写作时间。

汕，直抵闽境，并迅速扫平杨、刘[120]。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当时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一铁的事实的教训，才决心以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继续成立新的革命军队，改造旧的军队，如是才有北伐[121]的胜利。

苏联红军所以能够团结全国工农在残破困苦之中击败白党与外国的进攻，中国红军在过去十年所以能团结苏区人民进行残酷的战斗，西班牙政府军所以能团结人民与法西斯德、意侵略军及佛朗哥叛军进行坚决持久的战斗[122]，这些“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有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

有人说，政治工作是空谈，是“卖狗皮膏药”的。又有人说，政治工作徒然增加军队中上下级的磨擦，军官带兵更困难了；军队对民众关系“太好”，就更难指挥人民了。

我们必须坦白诚恳地说，这些非难政治工作的理由，不是不了解政治工作的实际意义，就是故意反对军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而不想军队革命化。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如果一方面空谈革命主义与革命政纲，

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却又多方阻碍革命主义与政纲见诸实行；如果一方面在宣言、广播谈话、训练中，向军队官兵与人民空喊全民族大家要参战，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处处不给人民参战的权利与机会，处处阻碍人民与军队的联系，甚至人民慰劳抗战军队都被禁止；如果一方面高谈抗战，空喊士兵要勇敢上前线，但是实际上高级军官临阵不前，甚至化装先逃：这一切的一切，与革命主义、革命政纲、革命军队的行动都背道而驰。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就不得不变成点缀、凑趣、捧场的东西了。这样的政治工作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卖狗皮膏药”的东西了。

政治工作，原是以革命主义、革命政纲来团结和联系军与民、官与兵的。如果官与兵、军与民之间没有这种为民族为国家而团结一致、坚决牺牲奋斗的最高原则来联系，没有“在上者”的提倡与做模范，而继续军队中的军阀制度，继续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离心作用，要想指挥如意，打成一片，是不可能的。欲使军队真正成为为民族解放的前卫战士的革命军队，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又有人说，现在全国国民革命军中不是也有继承大革命时代所建立的政治工作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白诚恳地答复说，大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组织与制度已不复存在于现在的所谓政训处〔123〕中。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大政策，已经不是十年来的政治工作内容了。这样没有革命制度与革命内容的政治工作，还能适合现在民族革命军队的需要么？一九二七年后，十年来保持与发扬了大革命时代革命制度与革命内容的政治工作的，只有现在的

第十八集团军，即红军。

二　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与内容

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是使军队本身团结起来，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

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的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的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友军遇危险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耻的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

全国军队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恢复以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基础，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骨干，使每个指挥员、战斗员，每个人民懂得而且确信我们今天的抗战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为子孙，为着争取民族解放、民生幸福、民权自由这三大目的而奋斗，而且深刻了解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策，认识这是达到革命三民主义的唯一方策。只有这样的政治工作与革命政策的实际执行配合起来，才能使全国军民上下一心，军民一体，抱着抗战胜利的信心，望着民族解放的光明而坚固团结起来，不怕艰难挫折，不受威迫利诱，不迷惑于挑拨离间，坚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这样的目的与基础，我们在政治工作的实施方面应做些什么呢？我以为革命政治工作应分为军队、居民、敌军三方面的工作。

在军队内部方面的政治工作，目前亟需做的是：

（一）向每个部队的全体官兵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发挥革命的三民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使每个官兵有着革命的前进的人生观，使之了解国际大势、国内形势、日本状况，以及如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高度地提高战士的民族觉醒与自我牺牲精神。因此军队的政治教育，必须与军事教育并重，必须有经常的政治教育时间，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必须开展指挥员、战斗员中的充分讨论，耐心解释一切疑难与误解，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与宗教仪式，提高战士们学习研究的兴趣。只有这样，政治教育才能深入。

（二）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必须承认，旧军队中士兵的待遇与生活是极不好的，如果不努力尽可能地改善，是不能把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提高，消除官与兵的隔阂的。必须禁止肉刑与打骂，禁止克扣军饷，这些均应明令规定，由政治机关监督实行。设置各种必要的组织，如抗战室、俱乐部、晚会等等，发展官兵中的正当娱乐与体育运动，发展士兵文化识字运动，保证部队的给养，由士兵自己选举伙食委员会，注意改善伙食。民众的一切慰劳品，主要的应尽量分给下级官佐与士兵，并应使慰劳的民众亲密地接近士兵。只有这样，才能使官兵生活愉快与兴奋。如果政治机关的政治工作不能和改善士兵生活与待遇密切联系起来，政治工作就成为“卖狗皮膏药”。

(三)建立革命军队自觉的革命军风纪。民族革命军队的军风纪的建立，部队的巩固，是建筑在政治的民族的觉悟上的，而不是依靠皮鞭、军棍、打骂及肉刑的。军队与人民的团结是建筑在每个官兵自觉地爱护民众、保护民众利益上的，而不是依靠压迫、摧残、强迫、命令所能成功的。对于犯错误犯纪律的分子，主要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执行纪律条令。因此，只有充分的政治教育，官兵间互相的了解与信任，军民间互相爱护，才有革命军队的自觉纪律。政治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从加强政治教育与改善士兵待遇中，来建立革命的军风纪。

(四)保障军事指挥员在军事行政上命令的贯彻执行。军事指挥员为着抗日的民族利益、为着发挥部队作用和巩固部队组织的一切命令，政治机关应经过政治工作，依靠下级官兵的高度民族觉悟与自觉的军风纪来贯彻执行，并向一切违犯命令的倾向作严肃的斗争，来教育全体官兵。

(五)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实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以谦逊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推动政治工作的前进，发展政治工作的效果。一切高傲的出风头的空谈的恶习，以至贪污腐化的生活，必须克服与排除。

对地方居民的政治工作，目前迫切需要的是：

(一)保护人民的利益，使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所到之地，必须禁止拉伕拉车和征粮征草。买卖要公平，不扰民，不害

民。在军事上必须人民帮助时，要召集民众的真正代表会议，说服人民，鼓动人民，使人民自愿地帮助军队。

革命军队所经之地，不仅要保障自己不扰民，不害民，而且还要为民除害。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军民才能坚固地联结起来。

（二）组织人民，武装人民。抗战军队所经之地，政治机关必须给人民自主权利，宣传与动员人民，帮助与领导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使各界各业人民都自动地组织抗日救国的团体，组织抗日的武装，一切不适合于动员广大人民参战的、限制人民行动的旧有组织，应给以改造，充实其民众基础，发挥民众的作用。只有这样，抗日的军队才能取得千千万万的民众力量的配合，抗战军队的一切需要与补充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解决。

（三）发动人民肃清汉奸。日本特务机关散布全国，汉奸到处横行。抗日军队为着巩固自己作战的战场与后方，为着提高军队与人民的政治警觉性，政治机关必须注意动员人民，配合人民进行锄奸运动。对日寇、汉奸的仁慈，即是对民族的犯罪。培养军民的力量，用坚决的手段，扑灭间谍、奸细的活动，是政治机关保障抗战的主要工作之一。

对敌军的工作，也应当进行：

（一）经常地对敌军宣传煽动，抓住敌军中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使敌军瓦解和涣散，因而减弱敌人的战斗力量。

（二）在火线上，即在战斗中，也要进行对敌军的喊话或散

放传单，使敌军动摇。

（三）应当极力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

三　政治工作的组织与方法

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这里，首先就应排除一切忽视政治工作，把政治机关看成点缀品装门面的错误观念。

政治工作，必须在军队的各级，从最高的全国的总政治部直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除各级部队的指挥员可指导同级的政治工作机关外，下级政治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政治机关的指挥。政治机关对同级指挥官的指导有异议时，有向其上级机关申诉之权。各级军事长官必须给同级政治机关实施政治工作的一切便利，而不应予以干涉与阻碍。各级政治机关的官长，对其同级及下级官佐违反革命主义、革命政纲与革命纪律的行动，有向上级政治机关弹劾之权。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机关有达到其政治工作目的与任务的保障。

正因为政治工作人员有这样严重的责任与不能逃避的负担，所以对于政治工作人员的选择与培养必须慎重。必须集中全国优秀的政治工作人材，必须不断地培养全国前进的青年干部，分到全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组织中去，才能保障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一切对人员安排位置滥竽充数的观念，都

是危害政治工作的。

正因为政治工作机关与人员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所以必须注意实施政治工作的方法。要根据每一部队的历史、组织、习惯、组成成份、官兵关系等等不同的情况，要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民等等不同的复杂条件，采取灵活的方式去进行，不要造成军事与政治对立，不要造成格格不入的现象，不要脱离军民。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

全国一切抗战的武装队伍，迫切需要以最大决心迅速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对于这一紧迫的重大问题，特将此刍议提在全国各军队之前。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三月）

一　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

今天，抗战正向新的阶段过渡，敌方、我方、国际三个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敌人的政策明显地表示了三个特点：

（1）认定扫荡敌后方是它的中心。不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军事的行动，都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敌后方，所以四个月来敌人没有进攻与深入内地的形势。

（2）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政策。敌人要拿这个政策来利用我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3）无论如何还是继续战争的局面。不是以政治为主了，战争就可以停止。除非是中国胜利或者是中国屈服，战争决不会停止，敌人也不会因扫荡后方就停止进攻。

二、我方的政策已转到要重视敌人后方。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

---

* 这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事上争胜负。我党总结了一年抗战的经验，在六中全会〔124〕决议案中讨论了敌后工作问题。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强调了全国军民和各党派应重视敌后工作。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优势的地方，欢迎各抗日党派共同到敌后去工作。

三、国际上也是极注意中国问题的：

（1）非常注意敌人占领地区的情况和敌人在占领地区的政策。

（2）非常注意游击战争的发展。

（3）非常注意中国共产党在游击区的政权。都想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政策是否侵犯各国的利益，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是否能真正破坏敌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实施，还要看这些军队能不能壮大起来成为正规军与敌人进行更大的胜利的战斗。

根据敌人、我们、国际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

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二　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

正是因为这样的形势和环境，所以我们新四军是有发展前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

三、愈深入到民众中间，愈能够创造根据地。我们如果打算把新四军所在的地方建立成根据地，就要依靠这个地方的广大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发展。

四、愈复杂，愈能够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只有在复杂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造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

五、愈有竞赛，愈能够使我们本身进步。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了彼此竞赛，我想江南江北地区特别是江南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各方面同我们竞赛，更能够锻炼我们，使我们进步。

六、愈坚持，愈能够影响全国全世界。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

绝不退后，绝不逃避。在这样困难的地区，我们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就用事实证明游击战争在中国的自卫抗战中是能够发展的。

虽然我们有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困难还是存在的：

一、敌人的政策和他的军事技术在不断变化。我们绝不要满足于现在能够克服敌人的进攻。敌人遭到挫折就会改变，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研究新的政策。所以，虽然今天的困难我们能够克服，还有明天的困难需要我们研究怎样克服。

二、我们活动的地区是有限的。大江南北和华北的情形不同，北方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而大江南北敌人所占领的地区是有限的。而且敌人要加紧造成电线公路网，在北岸要造铁路，以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

三、地形交通条件不利。

四、江南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十分有利。

五、我们的力量还小。虽然一年的战斗锻炼了我们，坚强了我们，我们还是游击队。

六、友党友军不会放弃江南，这个重要地区是他们誓死必争的。

这些困难我们如何来克服呢？

一、要坚持游击战争。拿战争的胜利来克服困难。只有我们胜利的扩大，胜利的增加，才会使友党友军重视我们，使敌人畏惧我们，使国际友邦尊重我们。

二、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

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

三、要坚持强大自己。要使我们的部队发展，使我们的地位提高，使我们的力量增强，这样才便于我们在大江南北进行工作。

四、要坚持深入群众。要使大江南北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是为民众谋利益，为民族谋解放的，环绕在我们周围。由劳苦群众以至上层分子，只要不当汉奸，都是我们要团结的。我们要到群众中间去埋头苦干，扩大我们的影响。

五、要坚持帮助友党友军。我们采取帮助的方法，影响的方法，使友党友军感到我们是可以合作的朋友。

这些就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针。只要坚持这样的方针，我们就能够基本上克服困难。至于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那全靠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实际运用。

三　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讲四个问题：

一、发展的方向。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

（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

（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

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

二、作战的方针。

根据全国在新阶段的任务，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的情况，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

三、建军工作。

以强大为原则，也就是说，第一要精，第二要发展。我们不能忽略精的方面，因为我们的扩充是有限制的。我们要使一个人有十个人的用处，一个干部当一百个干部用。我们走向正规军不能采取跳跃的方式，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功的。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上有决定的意义。干部健全才能使工作发展。在这一方面，新四军要用很大的力量，因为现在干部的水平在军事上文化上技术上政治上都是不够的，要很好地培养和教育。

战斗动作的教育很重要，特别是夜战、白刃战。要学习跳跃、游泳，这是打游击战特别要学会的，比如攻据点时跳铁丝网，携枪游泳袭击敌人。将来我们要在长江上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运输，发扬水上游击队的特长对我们游击队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爆炸的方法也要研究。还要学习爬城，这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动作。在游击战中我们要把体育运动提

倡起来。

我们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

四、对敌人的政治经济斗争。

过去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游击队胜利地集中，迅速开赴前线，转入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要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政治经济斗争。敌人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开发占领区资源的政策，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尽量摧毁敌伪政权。能够破坏的应该去破坏它，能够推翻的应该去推翻它。

（2）保障恢复我抗日政权。在敌后，应该尽量帮助地方，配合地方自卫武装，恢复和保护抗日政权，并帮助地方群众团体进行工作。

（3）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他们部队里面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到最后五分钟不拚命。

（4）瓦解伪军。敌人从本国抽调部队到中国来是非常困难的，主要的是利用伪军，以华制华，来弥补他兵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我们应该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他，而且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

（5）利用维持会、伪军等做内线，为我们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将来时机成熟可以里应外合。

（6）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这不仅有军事上的作用，而且有政治经济上的作用。

（7）爆炸敌人的矿山、工厂。

（8）封锁敌人的商业。

（9）敌人发行的伪币，我们的地区不能使用。

（10）研究在游击战中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譬如江南有许多棉花，应研究怎样自纺自织，供给自己的需要。

（11）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提高民众的文化程度、政治认识，使他们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一天天地提高起来，加强地方自治的能力。

（12）发展地方自卫武装，由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进而发展到游击队。

（13）争取青帮、大刀会〔125〕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

（14）适当地改善民生。凡是跑到敌人那方面去的地主，不可以回来收租。

（15）坚决肃清汉奸。在伪军伪政府中是有两面派的，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策略。

（16）加强宣传工作。对我们的胜利消息应该尽量地宣传，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应该不放松地驳斥。敌人贴了一个布告，我们也应该贴一个布告，揭穿敌人的欺骗。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要迟疑。我们政治部以后应该听敌人的广播，好来研究对策。

（17）在大城市中建立秘密的工作。

我只能够提出这些大纲，请大家来研究讨论。在跟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中，有这许多工作要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不亚于拿刀枪跟敌人斗争。我所说的是很浅薄的，仅仅

是过去的一点经验和现在的一些问题。希望我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共同努力，提出更多的具体材料和具体办法，表示出我们新四军不仅有模范的游击战争，而且在游击战争中有模范的政治工作，模范的和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的成绩。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一九四二年一月）

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条件是：

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

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

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

---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会议最后发了言，这是发言中关于西南党组织的任务部分。

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

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

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这七点都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春）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2〕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126〕、陈潭秋同志〔127〕，湖南的何叔衡〔128〕、夏曦同志〔129〕，浙江的宣中华同志〔130〕，江苏的侯绍裘同志〔131〕，北方的李大钊同志〔132〕、于树德〔133〕（那时是共产党员）和李永声〔134〕、于方舟同志〔135〕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

---

* 这是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

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136〕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137〕，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地作各种解释。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138〕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139〕。他们公开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组织。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廖仲恺，拉拢蒋介石。他们对蒋介石是看对了的。这些右派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55〕。他虽然也在孙中山的遗嘱

上签了字，表面上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说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但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到黄埔军官学校〔118〕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他讲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140〕，这是右派的组织。另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141〕。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142〕式的民主。国民党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143〕的第一师。这是邓铿〔144〕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145〕、叶挺〔369〕、邓演达〔146〕以至陈诚〔82〕，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147〕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148〕。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

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149〕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50〕，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54〕、汪精卫〔111〕等都不干，黄克强〔151〕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152〕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153〕，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

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154〕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155〕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156〕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157〕，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158〕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159〕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

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4〕，他是知情的。谭延闿〔160〕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161〕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程潜〔162〕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3〕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63〕，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119〕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120〕，在沙基惨案〔164〕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

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165〕，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119〕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25〕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166〕。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167〕、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168〕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

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169〕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170〕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171〕到冯玉祥〔75〕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粤，张静江〔172〕、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173〕。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174〕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

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175〕，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176〕、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177〕，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178〕。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

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

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179〕、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180〕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181〕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182〕，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183〕，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184〕（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185〕。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

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北伐〔121〕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节〔186〕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187〕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我的修养要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

* 本文是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

致柯棣华大夫[188]家属的慰问信*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朋友：

我谨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柯棣华大夫的逝世，向你们致最深挚的悲悼。柯大夫曾予华北敌后五台区最需帮助的军民以无可比拟的贡献。

柯棣华大夫系于一九三八年受印度国民大会之命，参加其所派遣的印度医疗队，去到延安，于一九三九年进入华北游击区。他在华北曾经过许多地方，最后定居于五台区，成为故白求恩大夫事业的承继者，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直到逝世。他的中国同志都爱他，尊敬他。为了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之最高贵的任务，为了给伤病战士以兄弟般的友爱，他曾救活了许多抵抗日寇侵入自己祖国的战士的生命，还帮助了许多人免于残废。我们受惠于他的极多，使我们永不能忘。

柯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

---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我们在全体爱自由的人类的共同损失中，分担你们的悲痛。

谨致热烈的敬礼！

周 恩 来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领导者的定义。

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而且多半已经做了领导工作。所以讲领导工作，是包含了上中下各级领导干部说的。

两岩〔189〕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更非以干部与非干部来区别。今天两岩、报馆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下列几点：

（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三）要相信群众力量。

（四）要有学习精神。

（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

* 这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

（一）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190〕来加以说明：

（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次之，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种审查的方法：（1）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2）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下而上地审查；（5）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注意大事；（2）提高政治警觉性；（3）提高理论水平；（4）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2）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

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191〕。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审查工作。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劣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劣点〔192〕。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这是不对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193〕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194〕，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195〕；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196〕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7〕，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198〕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199〕，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200〕；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

---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201〕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202〕；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203〕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204〕，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

“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205〕，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206〕，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207〕，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

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末，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208〕，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

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那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那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那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那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209〕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210〕），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

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66〕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

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象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

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170〕、张国焘〔169〕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共产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

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新专制主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

---

*　这是一个报告提纲，收入本书时第五部分有删节。

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的〔211〕。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212〕，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

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213〕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214〕。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不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

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否有它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呢？我们回答：有的。下面，我们就分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215〕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216〕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于是他要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217〕的样子，很沉痛地说

“不解决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218〕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

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219〕，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要人民盲从他不抗日而安内。抗战初期，要人民盲从他片面抗战。现在，又要人民盲从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实，他在内战时，早夸下海口：“剿共失败，必将自杀以谢国人。”可是从来也没见他实行过。失败时要实行连坐法〔220〕，但也没“坐”到他头上。抗战前，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六十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六十万，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221〕如出一辙！

蒋介石在心理建设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其实，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强调诚，但他是最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对苏对共对人民，也就是对革命对抗战，他都没有诚意。并且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222〕的抽象道德。

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谈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那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变，这那能说到和平！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在《中国之命运》中，有所谓“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的话，故《皇朝经世文编》及陈弘谋《五种遗规》两书〔223〕乃得大用。

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224〕）和拿破仑〔225〕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他公开说："（日本）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到梧州、邕宁。""他（指日本）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国家作战呢？"因此，他的抗战国策，早就定在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的上头。但现在日本既未征服俄罗斯，又不能吃下美国，反倒压在中国头上，于是他便着急起来，一方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便内战，另方面便要与日本勾勾搭搭了。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他统治十八年，从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变〔226〕直到今天，他几乎无一年不在战争中，而且无一时不在打内战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〇"，北伐后有宁汉分家，宁汉合作〔227〕。内战中有党内战争，党外战争。抗战中又有削除异己，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公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

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故“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这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不要说中共及其领导的武力和边区是抗战的，是革命的组织、武力和政权，就连其他党派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政权，为什么也是一点自由没有，而且到处受压迫，更不要说“发展和成功”了。甚至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真正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孙夫人，还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压迫么？所以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好，都是蒋记的，早已不是孙中山改组时的国民党，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国民党了。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最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他一方面侈谈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憧憬

于《礼运》大同之篇[228]，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民生主义的幌子下，存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经济买办经济的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他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地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

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三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他们的历史来源的。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我们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来看，蒋出身于封建家庭。

辛亥革命[147]，他一出手便在军阀张宗昌[229]之下当排长，奉陈其美[149]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230]，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这时，孙中山是以革命党和新军、会党的结合而成功，而陈其美、蒋介石却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蒋介石、戴季陶[55]、陈果夫[180]结帮卷入交易所的投机浪潮中。后来这种传统，更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发展。于是，这一买办集团，遂成为统治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虽然蒋介石在广东也反对广东的英国买办，可是戴、陈留在上海，一开始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蒋介石一到长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首先揭旗反苏、反共、反工农。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

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在办黄埔之初，他是反对苏联顾问的，等到得到苏联军火帮助，他又高叫第三国际[66]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围攻苏联顾问在广州的东山住宅的，也就是他。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231]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他领兵东征，便与许崇智发生地盘的争执。他赶走汪精卫，更是军阀行为。他率兵北伐，对待各军，更是排除异己，拥兵自私。所以，不待宁汉分裂，他已经发展起新军阀的思想

和行为了。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为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而他所领导的集团，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十年内战，便是他这个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具体表演。不论是对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党内战争还是“剿共”，他都用了这一套手法，并且从德、意、日那里学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新法宝。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去学，并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务人员直接来教。

从西安事变〔232〕到抗战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这一套手法。不要忘记蒋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革命性一面，但更不要忘记他那反动性的另一面，而且这一面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抗战当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内战，同时又能见风使舵，故作悬崖勒马的惊人之举。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233〕，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

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我们可以为它归纳成为十二项：

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

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

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

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

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

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

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

八、滥发法币〔234〕，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

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

十、放任贪污，强征捐税，纵容走私，任意检查；

十一、焚书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诱，斫丧人格；

十二、紊乱法纪，败坏道德，摧残文化，毁灭民族。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这十二条纲领，当然不是公开宣布的，也永不会公开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它是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在实行，而且只有比这多，不会比这少。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软弱处，也正是它的无耻和卑怯处。蒋介石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

我们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进步的，我们决不容

许抗战失败。我们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加强领导权的争取，这首先就必须壮大和巩固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有力地领导别人，制止中间分子的动摇，孤立顽固分子，而坚决地实行我们的抗战十大纲领〔115〕和“三三制”〔208〕的施政纲领。

讲到策略，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的。

如对日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

如对英美的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内战。

如对苏的冷冷热热，以冀达到为它牵制日本，便其解决内争的目的。

如对地方势力、各小党派威迫利诱，以图达到离间我们、孤立我们便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对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元老时好时坏，来看他们是否对统治者怀有贰心。

如对进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明压暗勾，以逼其离开我们，反对我们。

如对工农劳动大众监视侦察，隔断其与我们的一切来往。

最后，对待我们，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而其策略亦时软时硬。不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决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论时期，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

消共产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

五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它的组织的。它的组织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夺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这就是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CC〔180〕。他胚胎于一九二六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着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国民党经费，一九四三年度预算为二万万八千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务的党务活动上，而特别费并不在内。

第二个系统是在三青团内。那就是以复兴社为前身而转成今日三青团内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胚胎于孙文主义学会〔140〕和黄埔军校同学会〔235〕，创始于“九一八”后之力行社，后改复兴社，至抗战初并入三青团，而康泽〔236〕所领导之别动队及特训班加入进来，成为三青团的特务灵魂。

第三个系统是在军事系统内，那就是政训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贺衷寒的政训处有一批军队特务，连军官都厌恨他们。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是戴笠一手组成的，创始于一九三二年，初期为戴笠复兴社之特务组，现在羽毛丰满自成一系了。军统局的组织最庞大，人、钱均多。军统局本身分处，下分区、站、组、队。他的组织触角最广，军队中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各级情报参谋，军事机关中有调统专员，边区有军事督导组，保安团队中从保安处长、第三科长直到下层情报人员，全国的整个警宪系统除少数几省外，都在其控制之下。全国整个税收系统，有其缉私队和检查处来管。全国交通机关，有其监察处和检查站来管。国内外外交系统乃至武官情报人员，都归其管辖派遣。全国经济系统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员。敌伪沦陷区工作归其管理。破坏我军、我区的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也归其布置。与CC平行进行。

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一特务统治的世界，而且国民党特务还与日特、伪特勾结在一起。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关于党的“六大”[16]的研究*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同志们：近半年来，大家都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在学习大革命时期的文件中，大家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看法有很多争论，而且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些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有些我已经忘记。现在在延安还有十个同志参加过“六大”，我同有些同志谈了一下，不过没有都找到一起对一对。我分六部分来讲，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

---

*　这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

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237〕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38〕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239〕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240〕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241〕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242〕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

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2〕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169〕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179〕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226〕，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243〕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244〕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托派的

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170〕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245〕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246〕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247〕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

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248〕，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249〕。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250〕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208〕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

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到“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65〕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

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251〕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252〕，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39〕与第三党〔253〕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拚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254〕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

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160〕、孙科〔255〕、唐生智〔256〕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66〕把国民党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54〕。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257〕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258〕、马超骏〔259〕、古应芬〔176〕。刺廖仲恺〔4〕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260〕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55〕。“四一二”〔26〕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261〕。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168〕起草，由瞿秋白〔262〕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263〕，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264〕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118〕，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157〕反孙文主义学会〔140〕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146〕。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三 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象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265〕、南昌起义、广州起义〔266〕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第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267〕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

才说群众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268〕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269〕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270〕。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扩大的却不

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271]。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75]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272]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273]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171]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274]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共产党领导

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的错误平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对“八七”会议〔15〕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

“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第三，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也总结了。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不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革命形势的低潮，“六大”没有严重地指出来。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275〕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

产党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第四，“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

西、鄂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拚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143〕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276〕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369〕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173〕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

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277〕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209〕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278〕。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〇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

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〇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

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33〕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再从反面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但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

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279〕看到陶行知〔280〕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88〕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例如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

五　党的各项政策

“六大”对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政策是缺乏策略观点

的，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最明显的是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其次是关于建党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重视这些问题，这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白表现出来。

第一，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记得我曾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但那时所知道的材料也仅限于白区城市党的问题。“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密切，领导机关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象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得最多谁就是好党员，谁要坐下来多研究一些问题，谁就会被当作坏党员看。后来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曾批评过这种作风，当时许多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

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思想斗争问题，也没有象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当时提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对的，并且写在决议上了。可是如何去争取？是组织赤色工会〔60〕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还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六大”决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后来在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上，决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是错误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是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工人组织差不多都被摧垮了，即使有留下来的工会，会员数量与党员差不多，已经很少。当时存在的还有这样几种工会：一种是原来的工会，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了记，成为合法的组织；一种是原来的工会，没有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记，也还存在；还有一种是国民党派人组织的工会。当时这些工会中有的还是有群众的，再去组织赤色工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应该

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确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与中国党内对工人运动“左”的倾向和职工国际〔281〕一贯的“左”倾是有关系的，对后来党的职工运动过左起了很大影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企图在工人斗争中建立既非赤色工会亦非黄色工会的工人统一组织，今天看来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农民运动。“六大”写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两个决议。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摸索过程的，而且要有许多具体的办法，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根据“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

第四，关于苏维埃问题。从决议中看不出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

第五，关于反帝反军阀斗争。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都是要反对的。但“六大”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看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

第六，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时应该在城市中间发动广泛的民

权主义斗争，“六大”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第七，关于军事运动。“六大”有一个秘密的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没有宣布，里边有一部分是关于白军工作的。当时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军官是反动的。但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282〕，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283〕，都是由军官领导的。

六 “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一）共产国际对“六大”的影响。“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今天对它应有个分析。我上面说的“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

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二、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三、至于对中国富农的问题，布哈林在苏联对富农问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六大”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又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所以没有多大坏的影响。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69〕、沈泽民〔284〕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285〕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

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二）代表成份。今天看来是不很健全的。代表有七十五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一百十二人。不健全的地方在于：一、太重视工人成份。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三月底来电通知，四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286〕、恽代英、陈潭秋〔127〕、李富春〔287〕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三、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例如，当检讨到两湖起义的错误时，两湖的代表们便觉得他们的工作中也有些成绩而极力争辩。但必须说明，当时各地代表团中并没有宗派小组织的活动。

这是三个主要的弱点。代表成份不健全，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加之在领导上又没有少奇、泽东等更正确的同志参加。

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

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但当时对选举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宗派主义，如毛泽东同志和关向应同志〔288〕等得票是很多的，而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等犯过错误的，票数最少。

（三）大会时间。大会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讨论问题。代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代表又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对许多决议的讨论也不充分，只是所谓原则通过交委员会在文字上修改。如果时间多一点，可能好些。

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就是说，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

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党一产生就开始的，是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代表。“六大”正确的东西属于这方面。“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

对大后方文化人整风的问题，我们有以下意见，请考虑：

（一）如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289〕及《新华日报》〔290〕社两部门的同志，则可行；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因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至于延安文教大会〔291〕，只能以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文化人，而不是以它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

（二）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

---

* 这是给当时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的电报，与董必武同志联名从延安发出。

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论统一战线*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同志们：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着重讲国共关系，一个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合起来说，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

一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

---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232〕；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292〕、福建人民政府〔293〕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某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

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294〕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295〕，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296〕，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297〕。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95〕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298〕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82〕来了，蒋鼎文〔90〕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

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91〕、杨虎城将军〔92〕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299〕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90〕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300〕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94〕、冯玉祥〔75〕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被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301〕，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218〕，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302〕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

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303〕、博古同志〔368〕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304〕。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305〕、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306〕，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

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

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拚，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307〕，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拚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

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308〕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309〕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象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

宣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

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石友三〔310〕、高树勋〔311〕、汤恩伯〔312〕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313〕发生了，竹沟惨案〔314〕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290〕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315〕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98〕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316〕。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

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都往北送，这真是“投畀有北”〔317〕。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到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不干，来了一个何白《皓电》〔318〕，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319〕，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〇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320〕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那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同志〔61〕的错误。陈毅同志〔321〕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155〕就到顾祝同〔305〕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209〕，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

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322〕，德苏战争〔194〕，太平洋战争〔195〕，以及新疆问题〔323〕。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将军〔369〕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和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324〕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同志〔325〕和邓颖超同志〔326〕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叶挺

将军被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88〕去见张治中〔327〕，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66〕，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

谈判正值宪政运动〔328〕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从这三次反共高潮和三次国共谈判中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继续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在第四个阶段中特别明显，所以谈判时他们充满着反共思想，反共高潮时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内战。虽然这样，文章还没有了结，还有新文章：不是再来第四次反共高潮，就是再来第四次谈判。结果，不是反共高潮而是继续谈判。这个谈判不仅有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而且有外国人参加；同时，谈判又是公开的。这是和过去谈判不同之点，是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斗争，就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

人士所拥护，所同情。正因为这样，所以谈判也就继续下去，于是有了赫尔利〔329〕到延安以及我的两次出去〔330〕。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定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内容主要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这五条他承认了，所以我到了重庆，就是为实现这个方针——联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又拒绝了。我回延安以后，赫尔利又继续邀请，我就又出去一次，提出为实现联合政府，办法可以采取一个准备的步骤，先开一个各党各派的会议，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331〕三方面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来讨论如何改组国民政府成为联合政府，如何起草共同纲领，如何废止一党专政。这一次谈判国民党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反而叫嚷什么“你们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完全把我们的主张抹杀了。他还是要继续原来的方针。从《根绝赤祸案》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这从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上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

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332〕。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他这条方针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今天除了抗战这点上还可说是相同之外，至于如何抗战，完全是两套。我们是要胜利——彻底的胜利，要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团结——民主的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要国际的团结。国民党是另外一套，不是要彻底的胜利而是企图妥协投降，将来能用日本的资本和武器来打内战，把伪军收编过来打内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维持独裁，不是要团结而是要分裂，在国际上是挑拨离间，企图英美帮助来一个“斯科比”〔333〕，国民党就是这一条路线。

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我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反动的消极抗战的路线，另方面还是留有余地，不关谈判之门。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

民主，为了团结，这样的谈判才有作用，否则那真是谈话会了，那就不会有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情形。

二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谈到经验教训，不能不联系到十年内战时期，甚至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误问题。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入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我们才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现在先说敌人方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这样，我们要认清敌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成了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敌人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例如大革命失败，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即所谓“宁汉合作”〔227〕的时候，帝国主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致地压迫革命。但是这种情形在整个二十多年当中并不很多，许多时候敌人是分开的。“九一八”以后就很明显，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他们就分开了。抗战以后更加明显，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所以帝国主义是有分有合，分开的时间还是长的。从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说，北伐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时候，南方就有些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到革命阵线里来投机，夺取领导权。十年内战时候，敌人对红军的进攻也是不一致的。抗战时期，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翻过来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但同时又和日本勾结。这样，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蒋介石在大革命初期，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但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226〕以后，很快地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汪精卫〔111〕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总之，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变动很大，尤其以抗战时期为最。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思想，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错误。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蒋介石在江西杀了陈赞贤〔334〕，向共产党开了刀以后，一天天地走向反动，很清楚的是要走到敌人方面去，但是那时候我们党内象陈独秀〔170〕这样的人，还主张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就没有认识这个转变关头的变动。“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内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是我们的朋友，特别在“九一八”以后，就是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朋友，而“左”倾观点认为他们是敌人，并且是最危险的敌人，竟错到这样的程度。

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倾观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

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比如一九三五年在瓦窑堡会议〔335〕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估计到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大资产阶级，有转向抗战的可能，那时候“左”倾观点的同志就不相信，不懂得联合他们来推动抗战。

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那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

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例如刚才说的第一次武汉时期的汪精卫，以前他的确是代表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的，但是到了武汉以后，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还认为他是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例如“九一八”以前，十九路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江西进攻我们，但是到了“九一八”以后，民族革命高潮来到了，在福建和我们合作。有“左”倾观点的同志还把他们当作敌人，反对他们。这些都说明了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

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

再说队伍方面。

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

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依靠一个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的主要力量，象毛泽东同志说的，五个指头占四个。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打不好仗。北伐战争〔121〕时，军队本身也好，军队以外的配合力量也好，最大多数是农民。内战时候更清楚，完全依靠农民。抗战时期还是一样。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恰恰都是不认识农民，忘记了农民。“左”倾的错误是不依靠农民，只凭无产阶级打冲锋，结果使自己孤立。右倾的错误是依靠资产阶级，甚至依靠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期，在武汉时期，认为资产阶级可靠，甚至把唐生智〔256〕、冯玉祥〔75〕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当成依靠，而不去依靠农民。第二个武汉时期，抗战初期，有一部分同志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大资产阶级，以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胜仗，把主要的力量农民忘记了。这种依靠法很危险，不仅要打败仗，还会被人家俘虏。第二个武汉时

期，由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我们主要的力量在华北，所以没有象第一次大革命时候那样失败，但是危险还是有的。后来，大后方工作存在一个弱点，就是民主运动没有深入到农村。

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革命取胜。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不对的。“左”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大革命失败前后，曾经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譬如广州起义〔266〕，只把城市工人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教导团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也没有打算退到农村中去，所以广州起义失败了。上海起义〔336〕也是如此，想依靠城市的工人和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在敌人力量最强的上海硬坚持，结果失败。现在我们又到了要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力军是在农村。做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同志应该认识，要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队伍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右的观点忘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

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当时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有叶挺〔369〕的二十四师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从广东到武汉，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有了武装，这是我们的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169〕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当然还有土地革命问题，不过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这在当时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武汉时期，以为国民党军队不改造也可以同他很好地合作，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

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析了这个队伍，把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右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第二个武汉时期重复了这个错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以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337〕。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左”的观点是只相信无产阶级，只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脱离一切群众，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去联合。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分析，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结果孤立了自己。这是我们对统一战线队伍的分析，我们应有这样的认

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犯错误。

但是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样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以外，有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就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都同无产阶级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假如不区别，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一定受人家的影响。“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右的错误是受了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和他合作，就

容易受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好一点，请我们作客，吃茶吃饭，就不去区别了，就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右的错误，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的呢？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在我们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也这样指出了。同时，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容易有“左”倾情绪。这些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再说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179〕，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分了家，成了两个队伍。一直到现在还是两个队伍。一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代表，

所领导的队伍，发展到今天有了解放区，有了人民的武装。另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十八年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这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象和友军的关系一样。大革命初期、中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当然，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不但实质上可以领导，而且形式上也可以领导。如在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是不是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呢？从历史的经验看，一时的或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地说，当他们的力量小的时候可以受我们领导。譬如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就不愿受我们的领导了，但他没有力量北伐，就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这时还受我们领导，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又如那一天朱德同志报告中讲的，当华北敌人九路围攻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

就要我们朱总司令领导。但那是一时的，一旦他和他的后方打通，就要跑掉，反而来打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仅在不得已时、在某一个问题上能受我们领导，他们一旦有了力量，有了外援，就会立刻和我们分裂。所以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

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一些县政权是归

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第二个武汉时期的错误也是不懂得这个领导权问题。那时有一种解释，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是统一的政府，蒋介石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但当时党中央是很强调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这两点的。武汉时期放弃领导权，还表现在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假若这个统一战线是我们领导的，当然很好。但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承认我们的领导。他所承认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领导的队伍统一到他的军令、政令里去。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那时提出了七个统一〔338〕，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不是都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令吗？还不是都统一给他吗？又如提出晋察冀边区也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才能成立。这还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吗？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339〕，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209〕。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就是争取领导权上犯的右倾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简单说来，就是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为已经越

过俄国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的阶段，急于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政策“左”了，不仅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脱离了工农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以上是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那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那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目前紧急要求*

（一九四五年八月）

目前，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设的新阶段业已来临。为着团结全国各抗日党派，保证国内和平，在民主基础上进入建设新中国的轨道，并巩固国际团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国民政府提出下列的紧急要求：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

二、撤退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危害全国人民和扰乱国际和平的内战。

三、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

四、容许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及其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

五、容许中国解放区选出代表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六、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七、释放爱国政治犯。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当时没有发出，后来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包括了本文的内容。

八、救济被难同胞。

九、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

十、取消特务机关。

十一、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物的检查条例。

十二、在一切收复地区，组织地方性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容纳中共及各方面抗日民主分子参加。

十三、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

十四、立即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340〕，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1. 数日来，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动员接近他的中外记者向外广播，企图嫁其责任于我，吓唬人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

2. 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在具体问题上，应强调被我包围的敌伪军队应归我缴械，指出五六年来蒋素不承认、接济和命令的解放区军队，今忽令其留原防待命〔341〕，其目的即在一方面便于他来解决，另一方面便于他进行蒋伪合流。我们反对乱命即反对内战，实际上蒋早已无权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盟国最高统帅〔342〕如强令日军只许向蒋军投降，不许向我军缴械，即等于助蒋内战，我们坚决反对。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343〕，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往渝全系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只是步调常乱，空隙甚多。你们应在报纸上，在中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决地予以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重庆局的指示电。

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极有利于我们反对蒋之内战，望坚持此方针，以便放手动员群众，巩固和发展我们已得的胜利。

致邹韬奋[344]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粹缜先生：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些，您，最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也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致衷心的慰问，并祝

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

周　恩　来　启

卅四年九月十二日

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诸位先生：在政治协商会议〔345〕之后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我们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结果实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一、关于保障人民权利问题。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诺言〔346〕，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堂打人〔347〕、较场口事件〔348〕、捣毁新华报馆〔349〕、捣乱西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350〕，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351〕。这许多事件至今没有一件得到解决。如言论、出版的自由问题，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名义上虽已废止，但实际上仍限制重重，并且采用了极不平等的限制办法。象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的禁止，而别的新出版的报纸在上海则得到许可。又如释放著名的政治犯，除叶挺〔369〕、廖承志〔352〕外，不论中共或其他党派

---

* 这是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刊载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及无党派被捕的人和青年学生，至今仍毫无消息。现在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政府，这些违反保障人权的事件，国民党负有责任，但二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一字未提，所有决议案中，没有一字谴责这些妨害人权的罪恶行为。

二、关于改组政府问题。改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结束训政〔340〕走向宪政，在此过渡期间成立举国一致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会无明确态度。它不仅避开结束训政不谈，反而要把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是完全违反政协决议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二中全会后将要"恢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性质，很可能"恢复"到从前指导国民政府的政治委员会去〔353〕。果如此，国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常会选任，中政会又要指导国民政府，这说明政府仍是一党的政府，决不是民主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与政协会议、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全国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

三、更重要的是关于宪草问题。宪法关系中国今后是民主或仍是一党独裁的大问题。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354〕是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全体起立通过的，对这些原则如有任何变动，一定要经过政协各方代表的一致协议。国民党中有些人特别指责宪草修改原则不合于五权宪法〔355〕。我们且不说这些修改原则是在蒋主席主持下，经政协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全体起立赞成通过的。即从五权宪法本身来说，五权宪法，第一是主张五权分立，孙先生是反对中央集权于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权，某些权应归中央，某些权应归地方，故孙先生主张实行省自治并得制定省宪。可见政协的修改原

则是与孙先生的五权宪法原则完全符合的。至于根据这些原则如何规定政府组织，那就要因时间与条件而定，过去的办法不一定适合现在。如说孙先生遗教的一个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就违反了建国大纲〔356〕。根据建国大纲的程序先实行县自治，然后实行省自治，在全国有过半数省自治后，才可以召开国大，实行宪政。现在政府并没照这程序做，可见政府的组织程序是可以变动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与国民党协商。为了减少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个协议〔357〕。但这种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二中全会对于宪草通过了五点修正原则，所增加之两点半关系至大〔358〕，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不受政协拘束。另外，吴稚晖先生〔264〕又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立即在二中全会上成为决议。他主张“五五宪草”〔142〕，政协协议事项，二中全会决议……一并提交国大参考，这是与政协决议完全相反的。按政协决定，只能将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修正案提交国大，并无其他，国大代表个人虽自由，但各党派要负责约束其自己的党员，使这个民主的宪草得以通过，这样，包括十年前一党包办的旧代表的国大〔332〕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还是要保证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宪法，所以在国大问题上，各党派曾向国民党作了极大的让步。但今天，国民党却想利用各党派承认的国大，反转来反对政协决定的宪草修改原则，来动摇民主宪法的产生。这种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四、国大问题。国大代表中地区代表还未最后确定，国大组织法也还没有修改，根据政协决议，国大的职权只限于制

宪，而宪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才能通过，但国大组织法如再迟迟不改或改而不当，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就可以通过决议，来做更多其他不利于民主的事情。这样，将来的国民大会就会更便于做一党专政的保镖。

五、整军问题。在政协会议中，军政部次长林蔚氏报告，政府军队现有三百八十万，要减到一百八十万，编为九十个师。但在二中全会中，同一人的报告则说政府军队及机关学校现有四百九十万，将来只减到三百四十七万，仍编九十个师，这和在政协报告中的数目比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万。即去掉机关学校，仍然会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谓兵工总队，成为正规军的后备队或补充队。这是违反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359〕中复员计划的，因这既不能减少国库开支，且将保持额外的一部分队伍，完全与复员精神相反。

六、停战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360〕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林、郑两位〔361〕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军到现在还没有被解除武装，因为阎锡山氏〔96〕还在利用他们攻打中共和解放区的军民。在华北、华中其他地方，继续进攻和蚕食中共地区的村镇的事，还在不断发生。

关于东北的情形，马歇尔将军〔362〕在两个月前曾提议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军事冲突，当时我们立即赞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这个提议，可是又发生了执行小组的任务问题。我们曾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无条件派遣执行小组去，立刻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调查当地实际情况，把问题

带回来提供三人会议〔363〕解决。另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先在重庆谈判关于军事、政治问题解决方法的一般原则，然后再派遣执行小组根据已经谈好的原则去具体执行。这两个办法，都还没商得结果。我们向来主张东北的内政与外交问题应分开解决：外交问题，过去一直是政府负责的，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内政问题，大家都有责任，必须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意见，这也是其他民主党派和东北人民的意见。

以上所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国民党内顽固派有意识地破坏政协整个决议，并不奇怪。但是，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虽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有表示要执行政协决议的话，但是容许了上述反政协的决议存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又着重于反共，说中共如何如何。中共愿坚决实行自己签了字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也愿意朋友们善意地（而不是恶意地）来督促我们。但是我们要反转来问问国民党朋友，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骗什么呢？就是想模糊过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党派参加了政府，国大开成，宪法照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要求通过，中国不就是“民主”了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我们要向人民说真话，谈实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想做些什么？这不是一个人或一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欺骗老百姓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没有完全和平对人民说成有了完全和平，还没有

民主说成有了民主，还没有稳定说成已经稳定。

我们同意马歇尔将军说的：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时期。照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展下去，将会更加严重，不能象某些国内外舆论那样的乐观。但情势不是不能更改，这须要全国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帮助，特别是政协各方代表要努力来维护政协决议。

此外，亦如马歇尔将军在华府招待记者席上所说：国民党当权一派，不愿把大部分权力交出来。其实政协决议并未要求国民党交出大部分的权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权利，如各党派在政府中能有充分代表性。现在国民党无论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国大中，仍占第一大党地位。可是就是这一点点民主，顽固派还是不愿意让人民享有，只是压迫和打击人民与其他党派的民主运动。而且照杜鲁门总统的声明〔364〕及三国外长会议公报〔365〕中所指的内容来看，也可见政协决议还没达到那样的民主要求。现在军队整编统编方案是有了，但是组成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仍未做到，就连政协决定的这样一点点民主，国民党还不愿实行，还要由国民党中常会来选任国府委员。

因此，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366〕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对三人会议关于停止冲突与军事小组关于整军方案的协定，也是一样的。人权若无保障，就无法改组政府成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宪草，各党派如不受约束，如不照五方通过的修改原则制成修正案，国大一定开不好。军事冲突，若不在全国范围内停

止下来，和平也无保障。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真和平、真民主、真稳定的中国。

我们愿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特别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团结的朋友，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来纠正和推翻党内这种反政协的企图。且这种企图现在已成为决议，快要实行了。我们应提醒国民党的朋友，因为国民党对今天的政治是负有最大的责任的。由于这一缘故，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来做这一声明，是有必要的。我们不愿蒙蔽舆论，而愿诉诸舆论。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若飞〔367〕！博古〔368〕！希夷〔369〕！邓发〔370〕！黄老先生〔371〕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372〕！你们集体牺牲，你们已成了“四八”烈士。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

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象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二三十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生涯，已经把你们锻炼成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你们中，象若飞等七位同志，都经过一二十年共产主义党的教育，已成为久经考验永远忠于人民事业的党的优秀领导者和党的骨干。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瓌宝，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现在竟活生生地把你们从我们中间夺去，从中国人民中间夺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不幸！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

---

* 这是在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为《新华日报》写的署名文章。

抗战胜利后，若飞等同志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事业，努力奋斗，奔走呼号，从未息止。双十国共会谈纪要〔373〕、政协五项决议〔345〕、停战协定〔360〕、整军方案〔359〕，直至三月二十七日的东北停战协定〔374〕，都有着若飞同志的共同筹划以及其他同志的后来参加。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354〕，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作最坚强的搏斗。四月八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改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向着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

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的实施，是决不会顺利的。中国人民为求和平民主的实现，已付了极大代价，没料到还付上这样惨重的代价，并且还未付完；反动派正在改组政府、召开国大和接收主权等表面文章后面，进行着更大的独裁、分裂和屠杀的阴谋活动呢！

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

若飞！你最后一夕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

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万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已经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思想领导下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我们要为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世纪奋斗到底！

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209〕，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为继续和发扬这一成就，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中国和世界的职工联合运动的彻底成功而奋斗！

一切飞延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你们每一个人的优点和成就，都是人民中的希望。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要继续你们遗留下来的为人民教育服务、为革命工作努力、为培养革命后代而自我牺牲、为努力中美合作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并把它们永远坚持下去。

我们要将一切悲痛化成团结的力量，向一切反动派搏斗！

和平民主，就是你们的旗帜！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急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我代表中共代表团，特发表严正的声明：

（一）目前内战形势已经从局部向全面发展，大规模内战主要地已在四个战场上进行。首先是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三十万，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对中原军区“围歼”〔375〕，二十九日占宣化店，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我军开始突过平汉路，现仍在被追击中。第二是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五个军，约十五万人，沿胶济路向我进攻，其济南、潍县间已于本月中旬会师。第三为苏北战场：国民党用十二个军，加上地方团队约五十万人，于本月十五日从三方面向我作全面进攻，并有海空军配合。第四为晋南三角地区：胡宗南〔376〕的第一军于七月三日由陕西过黄河，占茅津渡，配合阎锡山〔96〕军队，已占我闻喜、侯马。此等情势，如果任其发展，平汉、津浦两线与热河及东北也很快有卷入内战的可能。我们要求国民党当局，少作违反事实的宣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否则应负内战全部责任。

---

* 这是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刊载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昆明两次政治暗杀，足以根本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团结合作的大局。李公朴先生〔377〕被刺后四天，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刺〔378〕，这完全是有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西安、南通之血案〔379〕未了，昆明今又继之，则重庆、成都、武汉、北平、广州，甚至南京、上海亦可以任意杀人。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如果国民党当局对此仍不采取紧急处置，改弦更张，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都将徒然无望。

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我及小超〔380〕等今日下午飞回南京。

二、在离沪前，陶行知〔280〕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他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十二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

三、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344〕之后请求入党。

四、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298〕及伍云甫〔381〕，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五、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六、我今日弄清情况，明日再见马歇尔〔362〕及司徒雷登〔382〕。

---

* 这是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悼李公朴[377]、闻一多[378]词*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

* 这篇悼词是为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写的，由邓颖超同志代表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宣读，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

---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378〕，都是我们的榜样。

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协协议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始能召开。

政协各项决议〔345〕，是各党派协议的临时大宪章，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十个月来，政协决议不但未曾丝毫付诸实施，而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无遗。停战协定是经过政协决议批准的，但内战从东北大打到关内，政府当局已彻底破坏了一月间停战令〔360〕的位置。政府当局在政协开幕时所宣布的

---

*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之后，蒋介石立即发布命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妄图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法，使其内战、独裁、卖国的路线“合法”化。“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这个书面声明，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四项诺言〔346〕，从较场口大打〔348〕直到李〔377〕、闻〔378〕暗杀案，已被国民党特务统治破坏得一干二净。政府改组迄未协议成功，和平建国纲领遂亦无从实行，而对许多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当局不仅不准其依照纲领规定维持现状，且欲实行"接收"，不允则实行武力占领。军事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军民分治，但现在国民党政府的各省主席几无不以现役军人充当。宪草审议在重庆既未完工，中共代表当即有全部保留之声明；政府迁南京后，国民党当局更将其一搁至今，从未再议。国大问题的协议，是政协开会期中最后一个妥协。国民党当局保证不开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并保证通过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其他党派方允许十年前一党包办的代表〔332〕得保留在区域与职业的代表名额之中，且必须增加各党派代表与解放区代表。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保障及政府改组之后，才能够召开国大。这样的国大，才算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现在开幕的所谓国大，不只违背上述决议及其精神，而且连开会日期或延期也由一党政府决定。代表名额，据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已公布者竟达一千五百八十人，在原协议二千零五十人中，已侵占其他党派名额四百一十人，尤其是已侵占解放区二百人代表名额至一百四十人之多。可见这一"国大"是彻头彻尾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所谓空出名额等待中共参加，既系破坏政协，又属完全骗局，实际上只是想骗取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参加，以粉饰国民党当局个人独裁的面目而已。

一月来，南京商谈经第三方面人士的辛勤努力，中共方面曾不断提议商谈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须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

序办事，惟均被政府当局拒绝。一党“国大”的会议期愈近，我们愈主张停开一党“国大”，方有可能使军事三人会议〔363〕、政协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得以同时开会，根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359〕与政协决议，分别解决当前的军事政治问题，并立付实施，然后方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从容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但急于粉饰独裁的政府当局，对此根本不予考虑。

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停战令”〔383〕的欺骗性。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决无一顾之必要。参加了这一个“国大”，承认了这个把戏，就必然推翻了政协决议，破坏了政协以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轨道。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和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亲爱的总司令，你几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

*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同志六十寿辰。本文刊载于十一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147〕、云南起义〔384〕、北伐战争〔121〕、南昌起义〔246〕、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六十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人民祝你长寿！

全党祝你永康！！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232]纪念会上的讲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诸位先生，诸位同志：“双十二”事变过了整整十年了，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现在又不幸地回到内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历史教训！不管现在又回到内战中，中国总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在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296]、全国救亡运动、七

---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

君子之狱〔95〕，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295〕，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385〕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91〕、杨虎城〔92〕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强抗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先生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蒋介石的抗战既是被逼的勉强的，所以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的喝采。中共及人民是主张积极抗战、坚持胜利的；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则联合德意，企图妥协，在抗战后期则勾结敌伪，消极抗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便击败日寇的，而蒋介石则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抗战不断地削弱乃至消灭非嫡系军队，首先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更不惜实行内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实行民主，以

便能动员人民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而蒋介石则厉行独裁，压迫人民，使抗战陷于无力。在这种情形下，要不是中共在敌后努力，人民在全国坚持，中国的抗战早已被蒋介石断送了。所以日寇一经投降，蒋介石便利用日俘，收编伪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今年一月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声中，蒋介石又曾被逼地勉强地接受过停战协定〔360〕与政协决议〔345〕，但不久便被他所指使的南京二月“整军会议”与重庆三月“二中全会”或明或暗地推翻了。等到东北大打与关内大打，更证明他接受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决非心甘情愿。内战发展到最近，五个月侵占我解放区这样多的地方，现在又在开着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蒋介石的一切欺骗作用都被他自己揭穿无遗了。

就这一年多的情况看来，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之间依然继续着西安事变以前及西安事变以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中共及人民是主张依照政协路线实现和平民主与独立，坚决拥护一月停战令，主张政协决议的依序实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援蒋内战。而蒋介石则不惜破坏政协路线，坚决走上内战、独裁与卖国的道路。他企图以武力消灭解放区，以“宪法”形式使他的独裁合法化，以亡国的“中美商约”〔386〕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援助来进行内战，但他这种企图，一定会如十年前进行内战时一样遭遇到悲惨的失败。现在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和平、民主与独立。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奴役人民的企图，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独霸中国、奴役人民的企图，亦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想追随美帝国主

义之后寻找出路，结果必走到悬崖绝壁。只有政协的路线才是康庄大道。人民的世纪已经降临。中国的民主新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反动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各国人民的进步，将促进这一新高潮的到来。历史的发展会警告反动统治者：内战、独裁、卖国的道路是不是要走到底？

就在目前，蒋介石还高谈“政治解决”，然而，多数人已经知道这是骗局，或者叫做“和平攻势”。为辨别这一“政治解决”的真伪，我们只要求他立刻解散正在开会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承认恢复一月停战令所规定的双方军队的位置，国共谈判便可重开。蒋介石如果肯这样做，那才有回到政协路线上的可能。不然，中国人民就会看得更清楚：对于蒋介石，“武力消灭解放区”才是他的目的，“政治解决”不过是他的欺骗口号而已。我们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以来的十年经验教训，中国人民是再不会上当的了。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年来的情况很复杂，变化多端，现在只能把几个主要的问题说一说，把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分析一下，同时讲讲前途。

一　一年来的谈判情况

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可分三个阶段来说：从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宣言〔387〕、毛泽东同志去重庆直到年底，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从政协到六月休战；第三阶段从七月大打到现在。三个阶段有很多区别：第一阶段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第二阶段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实际上已被推翻；第三阶段，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证明谈判失败。这就是谈判各阶段的特征。现在分开来看：

第一个阶段。

抗战八年，赢得了日本的投降，当时的情况是：（1）日本投降后，人民非常希望和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2）中共

---

* 这是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第二部分是摘要。

所领导的人民主力，还不能产生一个全国的民主政府，但又有部分的在我们领导下的民主政府；（3）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都可以打倒，这是八年抗战所证明了的。所以这三种要求——和平、民主、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根据此愿望，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宣言，以适应这种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三个阶段，我党就贯串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那么在第四个历史阶段，我们更一定要贯串它。这是我党的历史方针，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方针，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要贯串它与实行它。

根据以上方针，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在去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373〕。在此纪要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同时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

解决的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尽管到现在，国民党在各地还捉杀我们的人，我们的党在蒋管区还处在地下，但中共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从双十会谈纪要发表后，是不同了。我们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年前西安事变〔232〕后，蒋还在庐山向我提出要朱、毛出洋的要求，把我们看成是地方军阀，污辱我党；抗战，我们向蒋提出国共共同纲领〔388〕，他不理，自己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233〕；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但在日本投降后，因为经过我们八年的努力，解放区有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共产党军队达到了一百四十万的人数，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因此，蒋也不

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报请毛泽东同志去。毛泽东同志的去重庆是关系着中共在中国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问题，去年这一次去是完全需要的，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虽然力量的发展是八年的成绩，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就不同了，取得能适合我党现在力量的地位。所以今年九月蒋在庐山训话中说，中共已不象过去江西时代那样容易剿灭的，他是有了国际地位了。

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在这以前，蒋根本不承认各党派的地位，而此后却承认了，提高了各党派的地位。历史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都是中共提出的，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389〕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张君劢〔390〕虽参加了“国大”，但在其见记者时，还说希望共产党原谅。这样使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这也就是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三制”〔208〕思想。“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这两特点是毛泽东同志“三三制”的思想。

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在此方案中，承认了我军二十个师。但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88〕去时，我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303〕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主席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

以上三点是双十会谈纪要的收获。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

另一方面，没有达到协议的是地区问题与政权问题。在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我们已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向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这对蒋来说，比前面的三个问题重大得多，因为凡是民主的地方，就没有独裁者的份儿。这对蒋是一个根本的威胁，因此蒋不承认。同时这也是与赫尔利〔329〕闹翻的中心。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367〕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半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还有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问题，就是受降、遣俘、改编伪军三个问题。原则上虽已承认，但实际上他干他的。受降，他要经过美国人，而这样他的军队才由西南到了各大城市，同时又利用日俘、伪军打我们，把内战重新打起来了。

所以，在第一阶段谈判中，我们有不可磨灭的成绩，同时又有第二类没有承认的问题，还有第三类形式上承认而实际上又被破坏了的问题，这样使谈判不能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

内战。

三个月的内战，证明蒋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主要力量在西南，虽然美国尽一切可能帮他运了五个军到山海关，两个军到华北，两个军到山东等，但他的绝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东北、华北广大地区还被我们解放着，使蒋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同时，在国际上有杜鲁门声明〔364〕、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365〕，马歇尔〔362〕来华等。因此，使内战暂停，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初期应该说有成绩，如一月十日停战令〔360〕、一月底政协决议〔345〕、二月整军协议〔359〕、三月东北停战协议〔374〕等四个文件的签订。这里有四个问题，需加以说明：

一、战争在全国范围的确是停止了一个时期，给中国人民一个希望，战争可能停止，这也不能不影响我们解放区的人民与党的方针。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夸大了，那就是幻想了。但中央当时估计和平的可能也确有许多根据。蒋在被逼下把战争暂时停下来了，在当时的协议中，不允许双方军队移动，假使蒋不动，他的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华北不多，的确打不起象过去五六个月来那样的大仗。所以当时我们签了字。但到后来蒋大的调动，使此协议被破坏（大的调动还是在五六月）。我党在当时也需要停战整顿，特别在东北是日本投降后才搞起来的。就是在华北，过去也没有这样大，所以当时党签订停战协议是对的。这，一直到今天还成为我们的斗争口号。我们拥护停战协定，并不要因蒋破坏而不去拥护，如果照停战令作下去，对人民还是有利的。

二、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蒋虽不愿承认联合政府这名词，但实际上如翻成英文，还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蒋不敢这样做，所以破坏它。但直到今天蒋还不敢公开否认它，因为政协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的。在一年前的“七大”，我们也还没有预料到这样快就会有这样一个党派会议，产生这样一些决议。因此，这个决议还要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决议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我们对此要有个深刻的认识，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不叫政协决议而叫政协路线呢？因为政协决议已被他们破坏。当时许多问题都协议了，就是国大问题也妥协了，我们还承认国民党圈定的九百五十名代表，因为如依决议去做，国大只是形式，一切问题需经党派会议协商解决。但国民党现在开“国大”，已破坏了政协宪草〔354〕，国大问题我们就无法妥协。如果将来再谈判，我们决不承认他过去的“国大”。如谈改组政府，在政府的成份名额条件上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了。整军方案也是如此，条件是要变更的。将来的整军我们绝不能接受五比一了。所以决议是要变的，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签了字也是没有用的，但我们不管他将来谈得好谈不好，政协这一条路线，我们还是不变的，不能放弃的。

三、整军方案。这件事，许多同志比较不大容易了解。整

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十，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来的，如果打起来是废铁一堆。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受束缚的就是美国人插进来一只手，但也不要紧，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

四、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成绩，主要就是上述的四项成就，尽管蒋很快就破坏了协定，但这四项成就是不能否认的。对停战协定，蒋从二月南京军事会议时便开始破坏它。当时在该会上有两句口号："为领袖任劳任怨，为国家死里求生。"实质上就是："破坏政协任劳任怨，反动集团死里求生。"此会后，在重庆为了欺骗，还命令张治中〔327〕与我们签订了整军方案。三月召开二中全会，又从政治上破坏政协，大骂国民党政协代表，

集中到宪草问题向我进攻，经过综合小组提出三点修改：要使国大变无形为有形；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391〕；取消省宪法，改为省自治法等。我们当时不慎重，同意作三点修改。但国民党的企图是要把自治缩小到县，使省没有权力，实行中 央集权，变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国大的权力，使国会无权，其中心就是“中 央集权个人独裁”八个大字。所以从国民党的整军会议后，证明国民党是采取上面谈判下面破坏的方针。这样，五月五日国大就无法开，同时东北三四五月大打，从沈阳打到长春，停战、政协都被破坏了。但为什么又有六月休战呢？因为国民党占了长春后，兵力分得很散，没有兵再进。当时我们在东北占了有利的地位，山东、山西收复了几个伪军占领的城市，这样国民党需要在东北实行几个月的休息，而在关内动手大打，于是有东北休战。二十三天的谈判，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打算再让一二个地方以保全广大的解放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作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蒋在形式上是要我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冀东等地，但他承认的只是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半省，华北只是临沂、大名、上党等几个地区，想把我们完全隔开，先限制在这几个地区，然后再来消灭我们。所以六月争论的还是根据地问题，这与第一阶段破裂的关键是一样的。

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

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七月时，马歇尔说各党派谈不好，国共直接谈，我们说也好，于是就开五人会议〔392〕，但还是那样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又要司徒雷登〔382〕参加，司徒雷登就上庐山，但蒋的条件更高了，除以前提的条件外，还要我退出山东、山西六月七日后占领的城市。司徒雷登从庐山下来问我们，我们问他看我们能否接受，他不表示意见。我们说，连你都知道困难，我们怎能接受。第三次，马歇尔、司徒雷登又说先谈改组政府，我说也好，但要保证停战，但蒋介石、马歇尔、司徒雷登都不能保证停战，所以就无可谈。我们就主动提出恢复三人会议〔363〕，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马歇尔不召开会议，我就到上海，马歇尔又急了，来找我。这时正打张家口，我们认为，三人会议既不开，又打张家口，这等于国民党造成全面破裂。于是他又来了停攻十天，要我们交国大代表名单，交十八个师的驻地，我们如何能接受，这样谈判又破裂了。最后一幕戏，就是第三方面出来调解，因为他们还没有单独试验过。我们为了使第三方面得到教育，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调解。蒋提八条，我们提两条，第三方面想试试，要我回南京，我们就跟着第三方面之后，一道回南京。第三方面想来个折衷方案。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389〕、民社党〔393〕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331〕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

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十一月十一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394〕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395〕又替他们加上一句：“天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由此看出，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二 一年谈判的经验教训与将来的前途

总结三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不过反动集团的反动方针，不能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对他不利的，任何的反动集团都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因为反动力量削弱，人民的力

量起来了。而我们共产党却公开把我们的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拿出来，光明正大地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是否双方没有谈判可能与妥协的余地呢？这就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联合政府是取消独裁政府的方针，在我们区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没有法子站得住，这是事实。所以联合政府的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然不会赞成，因为与他的方针是相反的。因此反动集团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一有机会就要实现他的方针，但客观形势常常不让它实现，那就要走些迂回的道路。我们也是同样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要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方针也是定了的，但也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所以斗争就非常复杂，变化就很大，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策略又不能违背方针。我们的基本方针当然仍是“七大”的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

从第三阶段起，关内就大打了，美国更大量援蒋了。今天的斗争不仅是解放区，而且蒋管区，不但下层群众，而且工业家，都反对美蒋的独占独裁。我们可以相信，如再打半年到一年，就以过去的条件，至少可以再去掉他四十到六十个旅，这样他就再没有进攻的能力，我们就可与他平衡。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半年到一年内，的确是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假使再打半年到一年，战局一定要改观，这也就会影响到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种斗争的汇合，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造成民主的新高潮。

评马歇尔[362]离华声明*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去年今日，正是全国停战协定[360]签字与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日子。在整整一年中，情形的变化与人民的觉悟发展得真快。一年前的今天，全国人民都在欢呼和平停战，但是为时不久，全国又陷入内战的深渊。大家已明白：不取消军阀主义的统治，中国永远得不到和平。去年一二月间，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政协成功，但是为时不久，政协全部决议[345]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大家已明白：不取消个人独裁的制度，民主的政协路线是永不会实现的。一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364]与马歇尔将军的来华调解，但是为时不久，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原形毕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外交亦暴露无遗。于是全中国各大城市，从几十万学生一直到广大市民，都喊出“美军退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奴才外交”、“反对中美商约”等口号。

去年一年的变化，不仅国民党反动派重新挑起了内战，破坏了政协，便连一同签字于停战协定上的美国调人也不再提起去年一月的停战令了，一同参加政协的青年党[389]、民社

---

* 这是在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治协商会议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刊载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党〔393〕及大部分所谓“社会贤达”也竟参加了彻底破坏政协路线的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制定完全违背政协原则的独裁“宪法”，以加深全国的分裂局面。所以，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与真正民主党派、真正社会贤达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一直为坚持去年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而奋斗，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奋斗。回顾这一年的奋斗，不由得想起去年为停战、政协奔走的“四八”遇难烈士及闻一多〔378〕、李公朴〔377〕、陶行知〔280〕诸先生。他们与破坏停战、破坏政协的反动集团搏斗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就在这一年正满，马歇尔将军于他离华前夜，发表了关于一年调解之总结性的声明。我现在借着他这个声明，略论一下一年谈判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马歇尔将军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在国民党政府中占优势，而且包括军事与政治领袖，他们反对联合政府，不相信国内合作，只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对实施政协决议显无诚意，这都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说，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去年北平执行部成立后，蒋介石反对派执行小组到东北调处。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议〔374〕方签字，蒋介石便命令杜聿明〔396〕在东北大打。六月休战谈判未成，是蒋介石硬违背政协决议要求中共退出苏北、热河等四个解放区破坏了的。接着，他便在关内大打，直到现在。一年来，他违背停战协定，调动了二百一十八个旅（或师）占其全兵力百分之九十来进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至去年年底止，还侵入解放区十七万九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侵占解放区一百

六十五个城市，这不是武力进攻是什么？去年召开的一党“国大”，彻底破坏了政协路线，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一人决定的。所以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

蒋介石反动集团用武力“维持其自身的封建控制”，但结果连马歇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已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至于“经济破坏”与“交通破坏”，都是蒋介石进行内战所造成的结果。蒋介石政府以其预算的百分之八十用在军费上，加以官僚资本的盘剥统制，独裁政府的腐败无能，金融如何不乱，经济如何不溃？

这样的坏政府，在同一个蒋介石领导之下，换上几个去年一月曾经参加政协，后来又背叛政协，并积极参加蒋记“国大”的某些所谓国民党内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之流的人，便可以一变而为好政府，马歇尔将军的想法，未免太廉价了罢。没有中共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度是无法取消的，也绝不会成为自由主义政府。

马歇尔将军明知去年召开的蒋记“国大”，是破坏了政协决议及其程序的，但他却故意说它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符合，且似已包括中共要求在内。这真是欺人之谈。去年蒋记“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反。政协主张保障人民自由，蒋宪则限制人民自由。政协主张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蒋宪则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政协主张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自订省宪，实行地方均权主义，蒋宪则取消省宪，实行中央集权主义。政协主张中央政权实行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蒋

宪则恢复“五五宪草”〔142〕的总统独裁制。马歇尔将军想以实行蒋宪、改组政府的办法，算作结束一党训政〔340〕，为蒋介石独裁政府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更加孤立，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

那么，中共这样反对蒋宪，反对在现在情况下参加政府，要求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的双方军事位置，要求取消蒋宪与重开党派会议，是否如马歇尔将军所说不愿促成公允的妥协呢？恰恰相反，这些要求，正是最公允的妥协，也是最低限度的和平民主要求。连马歇尔将军也承认中共在去年一二月间是愿意妥协的。而二三月起，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的一切行动，又显然出之国民党反动集团。故中共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在去年一月的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的基础上求妥协，其根据正是马歇尔所称赞的“自由而且远大的宪章”。两相比较，蒋介石是在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路线，中共是在维持停战协定，维持政协路线，究竟是蒋介石在企图消灭解放区，还是中共在追求推翻政府，岂不十分明显了么？若说蒋介石可以不接受取消蒋宪与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之最公允的妥协，难道中共就应承认破坏政协的蒋记“国大”、“宪法”与破坏停战协定的进占位置，才算“公允的妥协”么？中共不承认这些无理要求，就说中共党内有激烈分子，不顾国家利益与人民痛苦，这是最不合事实而且企图污辱中共的说法，中国人民决不会相信。因为中共为人民服务，二十六年来如一日，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如果中共同意蒋介石进占解放区这些地方，让他自由压迫人民，承认蒋记“国大”、“宪法”，让他继续独裁，那才真是不顾人民痛苦与国家利益呢！而且也必然

得不到真正和平。

有许多渴望和平的天真朋友，不去研究停战的可靠根据和最低保障，不愿为坚持原则而奋斗，只痴等和平之赐予。于是蒋介石看透了这点，在他进攻有利的时候，便决不停战；在他进攻失败，需要取得时间整顿军队，以便重新进攻，如象去年一二月间那样，他便赞成停战，举行所谓“和谈”。请问，这样怎能得到公允妥协呢？永远不能。公允妥协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人民有利而可靠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去年一月为马歇尔及蒋介石代表张群〔324〕所签字的停战协定与蒋介石所主持通过的政协决议。马歇尔将军的声明只提政协决议，不提停战协定，这不是偶然忘记，而是有意规避他签字在上边的责任，并为三人会议〔363〕及北平执行部的美方代表寻求解脱，但反而愈加证明美国政府是在有意助长蒋介石大打内战了。

因此，马歇尔将军对中共宣传工作最为怀恨，也可得到证明。的确，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对去年三月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曾不断揭发其错误，尤其对美军驻华，干涉中国内政，侵扰解放区（马歇尔所提之安平事件〔397〕，不过此中三十余件之一件而已），运送蒋军，及美政府以租借物资、剩余物资、经济借款、军舰、飞机、军事顾问、技术训练等等援助蒋介石政府军队，更不断予以暴露和抗议。而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政策的本质及国民党政府卖国外交的事实（如缔结“中美商约”〔386〕、“航空协定”〔398〕等），又常为我们揭露无遗。七月以后，中共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之下，犹与美国调人不断寻求妥协之道，乃蒋介石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无理要求，层出不穷，而美国调人始终无片言相责，反两次声明，深怪中共未能

接受其调解，这自不能不引起我方的驳斥。马歇尔将军认为上述各种宣传，足以激发世人对美政府的痛恨心理，故有“罪恶性质”。其实，能激发人的并不是抽象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上述的事实不改，在爱好独立自由的民族看来，都是罪恶。

现在马歇尔将军回去任美国国务卿了。我很希望他能站在故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立场上，为着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重新检讨美国政府近一年来的对华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那一定会有大助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努力，也更有助于远东和平与国际合作。

停战协定签字和政协会议召开一周年，我们不能忘怀于这一伟大的纪念日，并且要为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继续奋斗。我们相信一切民主人士、全国同胞都愿为它一道奋斗，以求其完全彻底实现，不达目的不止。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五月五日）

一

（一）目前，蒋顽在前线大败、后方危机重重及莫斯科会议趋向于解决国际问题的情况下，竟于其统治的城市，大施镇压，赶走我方人员，威胁民主运动，捕打人民学生。其企图不外：一、如我及人民团体、社会舆论默不作声，彼正好得寸进尺，加强镇压；二、如我及进步群众受其挑衅，实行硬碰，彼正好以有准备的打击，挫我锐气，加强恐怖；三、如我只动员少数进步分子提出中间分子尚不能接受的口号，进行反抗，正好中其暴露我方力量之计，便于其分化挑拨，各个击破。因此，蒋的镇压政策仍具试探性。尤其是使人活不下去的财经危机，人民既忍受不了，而前线继续大败，人民也吓唬不了，故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

---

* 一九四七年春，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将要出现新高潮的形势，对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这是其中的两份。

（二）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宣传上，我们对蒋之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都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只要我们善于抓住其弱点，击中其要害。蒋美的反动阴谋是最怕被人揭穿的。在行动上，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去年底，各地学生反美示威，由于一年多美军横行，半年多反美宣传，加之沈崇事件〔399〕的激动，而蒋美于事前又毫无准备，故运动成功，收获至大。此次蒋特捕人打人，是其预定计划，我如不管条件如何，仍在学生中号召游行示威，有遭其屠杀的危险。且一般学生对捕人事件，有愤激的，也有畏缩的，我应顾及此种不同情绪，联合大多数学生首先向学校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继之联合学校当局向地方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如仍捕人，则在校内实行自保，如集体出入，互相联保，在条件成熟时，亦可实行罢课，要求释放同学等。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组织上，学生的抗暴联合会虽已在京、沪、平、津、渝学生中有了基础和联络，但也要建立可以自保的防线，即在名称上与行动上，在蒋特发现施以高压后，不妨改换名称或分开作战，使我损失不大，而仍能继续斗争，继续联络。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现在沪津一带，工人反对一月指数、要求加薪的斗争已

起〔400〕，我应善为领导，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发展。

（三）今后数月，蒋管区的变化必大，望你们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为要。吴、张〔401〕在撤退前，望尽可能将此种意见转告隐蔽的同志。

二

近日，蒋顽因军事、经济、政治种种危机难以解脱，于是大造谣言，捏造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企图一方面借此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另方面借此捕杀我党秘密人员和进步分子，以镇压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在此情况下，你们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党与民主团体、群众组织及进步人士等关系，亦要多发展极端隐蔽党员及同情分子，成单线领导，居中工作，不要以党的公开面目经常来往，尤要避免书信文件来往，以防牵涉。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

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从城市派人往外县乡村去发动、组织与领导武装斗争，必须与城市其他任何工作及人员分开，免致牵连。高级领导机关更须十分隐蔽，少开会，少接头，多做局势研究与策略指导的工作。总之，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现在已进入大反攻时期。自卫战争是从去年大打起来的，为什么那时不提出大反攻，不提出打倒蒋介石，现在才提？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而是有根据的。我们先讲一讲过去一年自卫战争的总结。

日本投降后，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用什么方法实现？大家记得，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谈判，签订停战协定〔360〕，召开政治协商会议〔345〕，通过政协决议，那是用的和平方法。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和今天是不同的，今天要用武力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两个方法不同，是不是有一个对，有一个不对？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方法对，只有用武力打垮蒋介石，才能有独

---

*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经过八个月的激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我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本文是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所做的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

立和平民主。那末，过去就不对？我们答复：现在对，过去也对。同志们会以为讲不通。讲得通的。那时，和平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动员人民。那时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人民要和平。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373〕，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协决议，蒋介石也签了字，可见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做，我们没有吃亏。在这期间，我们的军队开进东北，不是胜利吗？对大部解放区的巩固，部队的整理，也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照协议办事，蒋介石破坏协议，这就证明给人民看：蒋介石不要和平。不仅一次证明，而且几次（一月停战、六月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402〕等）都证明蒋介石不要和平。这就把人民的认识提高一步：和平不是靠几个协议就能实现的，要靠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要用武力才能取得和平。从和平到要用武力，其间有个过程，有个变化，就是人民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问题。

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行不行？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蒋介石号称四百万军队，这么多部队，一下子不容易打倒。过去有人说，“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这种说法很流行。大打起来后，在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以及其他一部分中间分子，不是都与我们的想法相同，还有很多人以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如果我们那时就提出打倒蒋介石，他们会不相信，不接受。同时，去年蒋介石刚开始大打，我们如提出“打倒蒋介石”，他就会反过来说共产党要打他，进攻他。如果我们把自卫口号变成进攻口号，那末就成为国共两方面都要进攻，就抵销了。我们说自卫，就是抵制他的进攻。但是怎样表明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呢？就是讲我们一定胜利！讲胜利信心，蒋必败，我必胜！而不是正面说谁消灭谁。我们这样讲，人民中许多人还要想一想，成不成？我们就拿事实来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有把握，因为我们是新生力量，茁壮如青年，蒋介石犹如垂死的肺病鬼。去年一年的自卫战争，就证明了这个道理——蒋必败，我必胜！

去年一年自卫战争，蒋介石用三百万军队进攻我们。一年作战，死伤和被俘一百一十多万，就是说被消灭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从人数上说。从建制上看，蒋介石共有二百四十八个旅，被我消灭九十七个半旅，平均一个月八个旅，还多出一个半旅，也超过三分之一。蒋军建制被打垮这样多，把打垮的再补充起来，就没有战斗力。如胡宗南[376]有几个旅就被消灭过两次，被我消灭一次以后，再来就容易打了。不少俘虏军官在放回去时说，再碰到我们一定举手缴枪。敌军的新兵是绑来的，象我们在《抓壮丁》那个戏中看到的一样，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弱，逃亡的比老兵更多。蒋军被我俘虏和击毙的将级军官就有二百多，新提拔上来的军官，战斗经验少。武器方面也是如此，美造装备有许多缴获到我们手里来了。所以无论从人力上、战斗力上、装备上看，蒋介石都不行。粮

食也是如此，胡宗南军队打到解放区来，每天要用十架飞机运粮，才够他十万人吃。蒋介石的种种困难，证明他是无法长期打下去的。蒋介石不能消灭我们是定了的。这一点甚至已成为蒋军军官相当普遍的看法。不仅被俘军官这样看，就是现在蒋介石下面的军官，见到蒋介石时腰挺得很硬，说一定消灭共产党，但一背过蒋介石就摇头。开始大打时，蒋军是一旅一旅地被消灭，后来成为一师一师地被消灭。蒋介石说我们专门打他们的司令部，所以，旅长、师长都被我活捉了。那有这样的事?! 他们的司令部都是在自己队伍的紧紧围护中，部队全部被我歼灭了，旅长师长当然被我活捉。对这样的消灭，那有不寒心不害怕的？所以，一年自卫战争的结果，就是蒋介石的军队承认不能消灭我们，而且他们是要失败的。在人民中，去年下半年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蒋必败、我必胜，但自今年山东等地胜利以后就相信了。这是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很快，仅仅一年，变化就这样大。因此，经过一年战斗取得的胜利，我们有根据有把握地在“七七”口号中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九月又提出大反攻，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这个口号，人民已经能够接受了。

蒋介石一年来做了许多蠢事，也证明他已无法统治下去。他单独召开“国大”，中共不参加，民盟〔331〕不参加，立刻就使它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人民不高兴他的“宪法”，就叫它伪宪法。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又在四月改组政府〔403〕。政协规定组织联合政府要有中共参加。他改组政府不要中共参加，中共当然也不会去参加。他拉拢了民社党〔393〕、青年党〔389〕，这两个党，人民很熟悉，臭得很，没有人相信他们。蒋

介石的办法用完了，戏法变完了，再来一个没有了。单靠政治手法也不顶用，人民还要看一看：有没有饭吃？黄金涨不涨，美钞涨不涨？现在蒋管区不仅工农劳苦大众没法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公务员也没法生活。美货滚滚来，入口大大超过出口，入口货半数以上为美国货，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那一个人会欢迎？蒋介石靠借钱过日子，四十亿美元早用完了，又伸手向美国借。人民已看到他靠借款也挽救不了军事上的大败、政治上的破产和经济上的崩溃。因此，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处示威，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妇女，反对美军打死中国人，有的直接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出席参政会议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闹起来，使蒋介石下不了台〔404〕。蒋介石遭到人民反对，政治上破了产，所以我们应当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为什么我们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土地改革，平分土地，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推翻封建势力，贫苦农民当家作主。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是争取地主一道抗日。现在日本打败了，大地主拥护蒋介石。要打倒蒋介石的势力，就要消灭地主阶级，使他们都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人民就拥护我们，仗就打得好。全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得到土

改利益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大的力量，能不打胜仗吗？

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为人民谋利的。他有坚强的骨干，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锻炼，官兵一致，善于战斗。我们的军队有光荣传统，是战无不胜的。

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去年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消灭蒋军在解放区内，就是在内线作战中诱敌深入，让他占些地方，把兵力分散，我们把人民动员起来，找机会消灭他，由此转到反攻。所以一年来，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消灭敌人在解放区内。结果，他占我百余城，我们消灭他百余万军队，包括近七十万俘虏。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防御中的进攻，消灭他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战略是进攻，而战术却是防御的。这个战术与日本人的差不多。如在陕北的作战就是如此，蒋军开始凶得很，但到了岔口时，他五个旅，我用同等兵力就把他围住了。他动也不敢动，没有一点攻击精神。这就是蒋介石、陈诚[82]用的战术。他们定的办法，专说如何防卫，如何突围，如何待援，如何警戒，如象一个人害了肺病，专门讲究如何防感冒，防咳嗽，防消化不良，防这防那，这样的人距死期也就不远了。

这是一年战争的总结。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年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

现在再讲讲如何达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打倒蒋介石，这是早就定了的。十年内战是如此；抗日是一个时期，要他共同抗日；日本投降后一个时期，是要用和平

方法打倒他；现在是要打出去，全国大反攻，不是消灭蒋介石在解放区内，而是要消灭蒋介石在蒋管区。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蒋介石不仅战术是防御，而且战略也是防御了。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消灭不了他，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二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405〕，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形势变动了，我们是在黄河、长江之间来发展。中国中部有江、淮、河、汉四条大水，现在要在这之间来打。这是南线，我们已有三路大军。西北解放军也要打出去。东北解放军已经出击。这是全国反攻的形势。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有把握没有？有把握的，有根据的。从三方面看：

先从敌人方面看，他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

第一，兵力不足。蒋介石共有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万，被打剩一百五十万，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万，剩下九十万。今后一年，敌人减员数目还会大。就算和过去一年一样，每月平均被歼八个旅，还将有九十六至一百个旅被消灭，这是没有疑义的。他是否还能象去年补充那样多呢？肯定会更少。就算他

一切照去年一样，再只减少三十万正规军，明年不就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了！这样，蒋介石的兵愈打愈少。第一年，他的机动兵力多，开始用半数进攻，到今年四月份只有四十个旅进攻，现在则更少了。先看南线，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他的全部兵力二百四十八个旅，在南线用了一百五十七个旅，其中只有胶东十五个旅是进攻，其余都是防御。如我各路大军再获胜利，这十五个旅也会转为守势。北线七十个旅，只有孙连仲和傅作义〔406〕的二十九个旅能作点地方性的进攻。除去南北线二百二十七个旅，后备只剩二十一个旅。从各方面看，他的兵力不足。

第二，后方空虚。后方剩二十一个旅，当然空虚。而且其中有八个旅在新疆和甘西，新疆有民族问题，现在又闹起来，八个旅出不来了。另外的十三个旅，放在长江以南，云南两个，川康七个，广东两个，台湾两个，其他地方都依靠民团、保安队。保安队只能守，而且数量也不多，那好打得很。所以蒋介石的后方空虚不可言状。我们到了江北，江南就恐慌起来了。

第三，人民反对。上面已讲到蒋管区经济破产、政治黑暗，到处表现出来。那里的人民运动象海潮一样，时起时落，反对蒋介石的日益增多，连大学教授、开明一点的绅士商人也会参加。我们愈向外打出去，愈能促使蒋管区人民运动的高涨。

敌人方面的这三个弱点，是我们打出去的好条件。

我们方面充分具备了大反攻的条件。

首先是我军愈战愈强。过去，我们消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就算胜仗，现在消灭他个把旅都不在话下了。战斗力强了，人数也增加了。我们队伍的来源，除了大量的翻身农民参加

以外，同时还有大量的俘虏参加进来。在我们部队里，解放战士占半数以上。经过诉苦教育，他们就调转枪口打蒋介石。例如这次打陕州的炮兵，前一天才从灵宝解放过来，第二天原人原炮就参加了战斗，这是历史上世界上所少有的。我们的正规部队，从去年到今年，差不多增多了一半，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已接近二百万人，蒋军总数也只有二百五十万，我们与他差不了多少。我们的主力走了以后，地方武装也能打下运城，围困汾阳。大的走了，小的就长大起来了。这真叫做大的不走，小的不长。

第二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而且蒋管区的人民听了也喜欢。近来在华北开土地会议，要宣布一个新的土地纲领〔407〕，用彻底的办法平分土地。中国农民翻身，只有依靠共产党。要打倒蒋介石，土改和打仗，二者不能缺一。

第三是扩大解放区。去年一年，消灭敌人是在解放区以内，好处是我们有群众帮助。但是打一年可以，长此下去人民负担太重。只有打出去，才能吃蒋管区的饭，扩蒋管区的兵，打翻蒋介石的征兵计划，破坏他的总动员。当然也有困难，在新区地形不熟，人民还没有与我们打成一片。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为人民办事，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就可以得到人民的积极拥护，解放区就可以更加扩大。

举行大反攻，国内条件都成熟了，再从国际形势看，许可不许可？关起门来计算可以有把握，但是美国人来了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世界大势，要分析，不要一提到美国就给吓住了。美国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农民战争。美帝国主

义能给蒋介石什么东西？第一是给军火。过去他给了蒋介石多少？先是说给三十九个师的装备，后来给了四十五个师的装备，东北、山东给的最多，但是我们在这两个地区的缴获也最多，有什么可怕？第二是给钱。美国究竟能给他多少？从抗日以来共给了四十亿美元〔408〕，日本投降以来，占二十多亿，但是都被蒋介石用光了。美国还能再给多少？美帝国主义是“阔少”，很多国家都向他要钱，但他有多少钱？能给蒋介石多少？马歇尔〔362〕刚走不久，魏德迈〔409〕就来。为什么来？是想进一步控制蒋介石的军队与经济，经营台湾。宋子文〔410〕主张修铁路，建军事基地，筑海港，由美国控制。现在蒋介石卖国，让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更容易动员人民反对蒋介石。第三，再厉害一些，就是美国出兵。那末美国共有多少兵？一百一十万。全世界许多地方他都要出兵，要多少？算他拿出二十万来中国，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一。但二十万人放在中国算什么？顶多只能放在大城市，放在台湾。日本人在华北放过一百万，美国兵是少爷兵，就算他放上五十万，又算什么？同志们的确要打破以为美国了不起这样一个观念。如果美国真的出兵，那就完全暴露他的侵略面目，更利于我们动员人民。他顶多占几个城市。我们围困他，他不被歼灭就只有逃走。美国是可以打败的。不要以为我们在神泉堡这样落后的小地方不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落后的小地方干大事情！美国的困难多得很，他的政治、经济危机不能避免。世界人民的力量一天天大起来，美帝国主义的日子更不好过。

总之，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国内条件、国际条件，都是有根

据的，是能够实现的。当然不是再打一年就能解决的，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今后两年我们将要登上山顶，还要鼓两年劲，蒋介石的力量已是下降的，但还没有下降到最低点。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太原等城市还放在那里，最后如果美帝国主义守上海，我们还是要收回，所以火力要发展，要打阵地战。我们还有困难，如军事工业基础薄弱、干部不足、粮食不宽裕等等，这些困难都要我们来克服。战胜蒋介石，也就是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子挖去，所以战争不是小规模的。中国地区这样大，四万万五千万人翻了身，革命胜利了，对世界革命有很大意义。所以打倒蒋介石，不要说还要两年，就是五年也划得来。同志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怕等不到成功？我还有这个信心呢！

同志们会问，我们现在还在乡村，蒋介石、美国人仍占着城市，如何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呢？中国革命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主力打出去以后，地方武装起来“拔钉子”。不要看胡宗南今天还占了陕北多少城镇，一旦我们大军到了大关中，他不走也要被我们拔去的。城市要在最后取得，才是牢靠的。要从局部到全国，就是这样发展。我们是从井冈山起来的，现在要到处建立解放区，解放全中国，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定了的。这个规律，党的领导同志是熟悉的，现在全党同志都要熟悉这个规律。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是我们最兴奋最高兴的。无论在那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一月）

一、民主同盟〔331〕一部分中委已集会香港，恢复活动。国民党反对派已在香港成立革命委员会〔411〕，宣言反蒋。冯玉祥〔75〕在美组成“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援蒋内战，要求美助民盟获致中国和平。国民党已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另一方面，宋子文〔410〕确曾至港与李济深〔143〕、蔡廷锴〔412〕接洽。民盟及国民党民主人士多对冯、李、蔡等估计高，且有对两广反动当局伪装反蒋的阴谋感兴趣者。这一切，都需要我党对蒋管区民主党派问题根据中央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指示〔413〕作进一步的具体的分析，并规定对待他们的明确方针。

二、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345〕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的节录。

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青年党〔389〕、民社党〔393〕分子依其本来面目先后分裂出去，跟随国民党走了。其他民盟大多数分子在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不参加“国大”、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伪宪〔414〕的斗争中，是靠近共产党的，这就使民盟在人民中获得了信任。可是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跟着丧失，从而也证明要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

三、指出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中间道路想法的破产，并不等于说民盟不再恢复活动，国民党不可能分裂，各地小党派或其他人民政治团体从此也不存在了，也不等于说中间道路的想法就从此消失了。相反，在香港，在海外，乃至在蒋管区许多大城市中，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代表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或地方性上层集团，或进步的民主分子集团的小党派出现。美蒋愈失败，他们会出现愈多。我们愈胜利，他们会愈要求到解放区来活动。这些党派之所以小而且常为地方性所局限，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或很少做群众工作，另方面由于斗争的尖锐，特别是长期地处在战争中，使他们很难在国共双方阵线之外有多少活动余地。因此，这些党派，除在纲领和行动上明显地靠近国民党或靠近共产党易于使我党决定对策者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些带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和影响的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这些

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415〕等皆是，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416〕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尤其因为这些党派，现在多数处在香港或海外，无更多实际行动来证明其政治倾向，而美蒋正在华南运用伪装分裂的阴谋，冯、李、蔡等又是最易为美英政府所选择的对象。于是情势发展的复杂性，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

四、在革命战争和阶级变化的发展上，需要我党有领导的预见，但证实这个预见的正确，还需动员全党领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循着这个预见的方向努力奋斗，否则，预见便会落空。所以，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推动的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等走向进步，并在实际斗争中揭露美蒋阴谋，反对对美蒋的任何幻想与保存美帝侵略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任何企图，以证实和孤立这些君主立宪的右翼分子，那末，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的宣传，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应该记得，我党代表团在与民主同盟关于不参加南京“国大”的合作和斗争中，当时对于张君劢〔390〕等右翼分子乃至对青年党所采取的成功策略，并不在预言民社党、青年党一定参加“国大”，而在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并欢迎

任何人拒绝参加“国大”，连国民党代表在内。当时，我党及左派报纸刊物是配合这一宣传的。这样，就在群众面前孤立并抛弃了民社党、青年党，并阻止了民主同盟以后对于伪宪及改组政府的动摇。尤其应该记住毛泽东同志的统战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斗争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原则。要了解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即封建买办阶级中的开明士绅、爱国分子等)，均须以我党的行动纲领（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及十月十日解放军宣言〔417〕、土地法大纲〔407〕）争取之。在利用敌人矛盾上，当其还只是反动统治内部的反对派及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时，我们只能看做是间接同盟军；但当其已经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时，我们就须采取欢迎态度，促其在行动中改造自己，证明其为直接同盟军。自然，这中间的不稳定性与投机性还会很大，我们应持若干保留态度，但也只有在加强我党领导和又团结又斗争中才能解决。

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因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这些人既是基本上好的，虽有严重而多的错误，我们只能在信任中抓紧，而不应置之不理，冷淡起来。否则，领导者自己就无法批评他们的错误，反使自己陷于被动。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然后抓紧他们，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他们，同时也就改造了自己的领导。

---

* 这是一封党内信件的摘录。

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

根据各地最近数月的报告看来，各解放区，除了去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解放的新区以外，在所有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三类地区，并应根据三类地区的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

第一类地区，是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其中，大多数地区，经过了减租减息、清算斗争和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418〕以后的土地改革；一部分地区，经过了清算和土地改革；而陕甘宁的一部分地区则经过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分地及一九四〇年的归地〔419〕。在这些地区，土地已经平分，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不多。阶级情况，除了东北及其他平分不久的地区尚有不同外，地主与旧式富农均比过去大为减少，且有已下降为劳动农民或贫民者，但尚有一小部分地主旧富农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这类地区的工作干部有许多人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这类地区，新富农已经生长，且有多过旧富农者。中农在这类地区已发展为多数，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上下，其中，新中农占很大数量，有达一半以上者。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一般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约二分之一上下。贫雇农变为少数，占百分之十到四十上下，其中尚有若干未彻底翻身者，亦有由地主旧富农下降为贫农者。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土地已经平分，决无再行平分的必要。留下的问题是在较小的范围内，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使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从地主旧富农尤其是占有超过农民很多的土地财产的干部家庭那里，补进土地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需要抽出新富农甚至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取得被抽者的同意，方可抽动。绥德黄家川的典型经验〔420〕，可以大致应用于这类地区。

第二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经过了减租减息、清算斗争与“五四指示”后的土改；另一部分地区，经过了清算和土改，但均由于各种原因，例如领导方针动摇、党内不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战争情况等，致使土地平分尚不彻底，封建制度尚有残余，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较大。阶级情况，地主旧富农较第一类地区为多，大都仍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工作干部中许多人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新富农尚不多。中农占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上下，其中新中农亦占少数。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因减租清算致土地转移的结果，一般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达一倍上下。贫雇农仍占

多数，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上下，其中多数尚未彻底翻身。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平分已大体实施，但不彻底。因此，一般地也不是再来一次全面的平分，而是实行在较大范围内的调剂。只在某些特殊地方，在多数农民要求并取得中农同意的条件之下，应当重新平分。由于这类地区贫雇农人数最多而土地平均差额又较大，单动地主旧富农及干部的土地财产，一般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势非抽动新富农及一部分中农的土地不可。因此，凡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上下者，在取得本人同意以后，可以抽出中农的一部分土地，但以不超过其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为限度。如此，一方面可使中农波动面不致太大，另一方面仍可保持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但又不致相差太大。如果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以上，并赞成平分时，可以实行平分。在这类地区，绥德黄家川经验中所述土改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亦必须注意采用。

第三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虽然也经过了清算和土改，但是工作很坏；另一部分地区，则是边沿区或收复区，土改工作尚未进行。所有这些地区，土地并未平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土地关系及阶级情况仅有若干变动，地主旧富农仍占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贫雇农仍然是人多地少。在这类地区，完全适用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方针。平分的重点，应放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及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上面。对于一部分中农的多余土地，必须在取得其同意以后，方能抽出平分。如果某些中农所

有土地较一般农民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只超出百分之十以下者，应不变动。边沿区，如尚带游击性质，应作新区看待，适用中央关于新区土改要点的规定，不应列入此类地区。

二

不论是平分土地或调剂土地，不但应注重土地数量的差别，还应注重土地的质量、产量及其位置远近的差别；不但应从农村的一般耕地着眼，还应从公地、荒地、黑地、绝户地等着眼；尤其是非法强占的土地财产，分配不公的土地财产及干部贪污或侵占的果实，更应首先注意解决。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分方针，才能从多方面设法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同时又照顾了中农的利益。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

三

为着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在实行调剂土地时，应首先补足缺地较多的贫雇农。然后，才对于有完全劳动力的青壮年单身汉，补足其两人份的土地，但如土地不足时，亦可补给较两人份为少的土地，或者不补。对于孤老寡妇，因其缺乏劳动力，在土地不足时，亦可不补给两人份的土地。对家庭人口多的，亦可较家庭人口少的少补。对流氓习气很深一时难望改

好者，也可少补，后补，或不补。对于此种流氓，暂时应只给与土地使用权，不给与土地所有权。对于由地主富农下降到贫雇农为时不久者，亦可后补，或不补。总之，要使广大贫雇农群众能合理地补足土地，以利生产，而不应附和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在调剂土地以后，对于孤老寡妇及贫雇农中仍有困难不能解决者，政府应另行设法帮助其解决困难。

四

在第一第二两类地区中，在农民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目前应依上述各项规定，于春耕前实行调剂完毕，确定地权，以利生产。在工作尚未做好，估计春耕前已不可能完成土改任务的地方，即应将土改工作推迟至夏季以后进行，并保证今年的土地生产物归耕者所有，而将工作迅速转入生产、整党和建立乡村民主生活上去。在第一第二两类地区中，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在第三类地区中，更应将已着手的土改工作赶快作一结束，推迟至夏季以后重新进行，以便迅速转入生产及一般的宣传组织工作。

五

在老区半老区，应准备以二年到三年时间（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有计划地完成全区域的土改与整党任务，而不应操之过急，致发生许多不应有的毛病。土改工作与整党工

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速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

六

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但是在一切决定发动工作的地方，又要集中力量，按期完成工作计划，不要拖延太久，致使群众情绪减低，既碍生产，又不利于工作的推进。对于一切领导土改与整党工作的领导者及工作团，均必须加以训练，讲明政策，并要适时地检查他们的工作。

七

贫农团无疑是农民群众中坚决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骨干组织。但是在第一类地区平分已经实现、中农已占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也要人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一切，势必脱离多数，孤立自己。因此，在这类地区，应就原有的农会加以扩充，并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其能领导各项工作。原来无农会者，应成立农会。在农会中，成立贫雇农小组。如果

贫农团已经组织起来，则不应马上宣布取消，而应使贫农团逐渐改为农会中的贫雇农小组。在第二类地区，因为平分尚不彻底，贫雇农仍占多数，贫农团的独立领导作用尚未失去，因此应该组织贫农团，并使其在农民中起领导作用，但在组织时，应吸收新中农参加。在贫农团成立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个月）以后，即应就原有农会加以扩充，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其能领导各项工作。原来无农会者，即应成立农会。在土地调剂工作完成以后，贫农团即可改为贫雇农小组。如果在过去土地改革中业已成立有贫雇农及新中农领导的健全的农会，或者有顺利条件能够保证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占三分之二、实施土改工作的健全领导的地方，亦可不组织贫农团，而只于农会中组织贫雇农小组。在第三类地区，因为平分尚未实施，贫雇农占多数尚未翻身，中农对土改尚存观望心理，必须首先组织贫农团，发动土改斗争，树立领导威信，一个时期（例如三四个月）以后，再成立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农会应容许新富农入会，但对地主旧富农及一切投机分子，则应坚决拒绝其入会。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在农会的委员会中，在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委员会中，一般地贫雇农新中农应合占三分之二，旧中农及其他劳动分子应占三分之一。

八

各地整党工作正在开展，并创造了许多方法。其中，以经

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平山县的典型经验〔421〕，应为各地所取法。在第一第二类地区，一般的封建势力业已消灭，而农民中的不满常常集中于一批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恶、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身上。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调剂土地的工作，必须与整党工作相结合，有时还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采用上述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此种方法，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工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均应实行。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实行这种方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上级党的领导的健全，一个是本支部要有几个好的党员骨干。如果上级党的领导者的领导不健全，便须先健全领导。如果某些支部确已为坏分子所统治，甚或全部为坏分子所盘据，没有好的党员骨

干，无法进行改造时，就应解散这个支部。上级领导者就应超过该组织，直接动员群众，依靠贫农团、贫雇农小组及农会，领导土改与生产。这样经过一个时期之后，重新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对于原支部的党员，在该支部被宣布解散以后，上级党的领导者得依情况将他们提交贫农团大会或农民大会予以批判或审查，并给以应得的处分。其中，经群众评定认为错误较轻的分子，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证明其确已改正者，仍可个别地恢复党籍。但这是指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支部，总有若干好党员。上级领导者的责任，就在善于发现这些好党员，并依靠他们为骨干，吸收新鲜力量，改造支部，而不要抛弃或不理他们。整党审干，必须采取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应当承认，在战争和土改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批阶级异己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同时又一定会有大批的革命积极分子涌进党来。因此，各地党委在整党工作中，应当分别情况，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罪恶、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应当开除出党。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均应坚决清洗出党。对于那些虽然是从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自愿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们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时候，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并获得党外群众的同意，我们就应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而不要马上开除出党。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

关于土改和整党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阜平局关于平分土地的指示，一般很好。中央发表了一个关于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除在那个文件中已经说到者外，另有几点与你们的指示有关者，告如下：

（一）关于土改，你们在乙项二节中，原已依据不同情况，规定各种地区的不同方针。但在乙项三、四、五三节中，却显得实现这个方针的分类和办法不够明确。在第三节土改较彻底区，规定一般土地不平差额如都在平均数百分之十以下，就不再分，至多把差额较大者加以调剂，但对差额如在平均数百分之十以上，则无规定。在第四节所指地区，规定如缺地农户在百分之四十或五十以下，平分时需抽出土地的户数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即不要平分，而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动的办法。实际上，这种地区如是土改不彻底区，中间可能有小动，而缺地农户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抽地户数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仍可用调剂办法解决。如系土改极不彻底区，则又应平分，无所谓调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剂。我们认为可以有这样两类地区，主要均由于土地已经变动，地富封建剥削已不存在或只存残余，而占有较多较好土地者，是干部、军属、烈属及一部分地富，故原则上，不应再来一次平分土地，而应是调剂土地。在第一类土改较彻底区，中农多，贫雇农少，故调剂范围就小。在第二类土改不彻底区，中农少，贫雇农多，故调剂范围就大。因中农多，其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就不可能与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太大，贫雇农少，其所需抽补的土地就不多，故应尽可能不动或少动中农的土地。反之，因中农少，其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就可能与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较大，贫雇农多，其所需抽补的土地就较多，故不得不动一部分中农的土地。照中央指示，在这后一类地区，凡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上下者，在取得其本人同意后，可以抽出中农一部分土地，但以不超过其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为限度，似较合理些。望你们根据实情，加以斟酌。但这类地区，即使需要平分，也应当作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规定。在这类地区，你们规定了其他一些具体办法很好，在较彻底地区也一样适用。在土改极不彻底地区的主要情况，应是土改一般并未实施，地富封建剥削仍然存在，故原则应是平分土地，不是调剂土地，但办法仍应是抽补，而不是完全打烂。你们第四节第五节，如均系指这类地区，就无须划一界限，规定缺地农户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抽地户数又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时才平分，否则不平分而两头动。实际上，地富土地多，贫雇人数多，在实行抽补平分时，就是中间不动两头动。在这类地区，再规定某些中农占有土地不超过平均数百分之十者即不动，那对中农动的就会

更少，你们在第四第五两节规定两种标准（百分之十与百分之五），也不甚妥。

（二）关于春耕生产问题，关系确是很大。但如为满足农民分地要求，而不问工作是否做到，条件是否成熟，只靠一股劲，就将三类地区的土地都调剂好或平分好，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凡是靠一股劲，就想完成这样细致的土改工作，最多象东北煮成夹生饭，还要再煮，否则，就会搞错了，还要纠正。贫雇农欲罢不能，而中农无心生产，大吃大喝，地富则对生产怠工，故意破坏，正证明我们工作尚未深入。如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调剂土地，平分土地，其结果，可以想象得到不会很好。你们要研究绥德黄家川调剂土地的典型〔420〕，那样土改较彻底地区，还需要那样“深耕细作”的群众工作，那不彻底或很不彻底的地区，更可想而知。群众中此种情绪，你们还应在宣传上检查其影响，是否由于过去强调为贫雇农撑腰将中农冷落了，划分阶级有错误，宣传平分土地又没在抽补上定出办法，致中贫农情绪如此不同。而组织上又一下子停止几万村级地富党员的党籍，是否也起了副作用。凡此，你们应从造成这一心理现象的各种因素分析它的根源，迅速采取正确的领导和办法去纠正这些现象。同时，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并采用晋绥分局二月十日紧急通知及晋绥行署、农委会以命令保证的办法，使农民愿意加紧春耕，敢于发展生产，劳动致富。

（三）几万村级地富党员不加区别不分地区地一下子都停止党籍，也值得考虑。因为在地富党员本身，固然坏的投机的异己分子会多，但也不能说没有自愿放弃或脱离剥削关系的人，这是一。划成份既有错误，不能使中农党员不受影响而被

当成富农党员处置，这是二。在抗战、自卫战期中，地方党吸收了这么多村级地富党员，党的高级领导毫无警觉，现在一下子全部停止党籍，乡村支部不会毫无影响，而且有可能是一种带普遍性的震动，这是三。各地方县、区、村领导者及工作团，是否都很健全，又处在战争中，对于这件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能否应付裕如，这是四。这些，当然不是地富党员原则上是否还应留在党内的问题，而是实行步骤是否应该如此急促，如此不加区别的问题。你们对这件事的决定和实行，是否已筹划妥当，执行后的情形和影响又如何，均望你们搜集材料仔细研究后电告。你们既已下令停止地富党籍，如果现在又说不停止，当然不好。我们不是要你们取消过去停止党籍的规定，而是要你们研究停止后的结果如何，如果结果不好则应采取适当处理办法。在这里，我们认为平山用党内外民主结合的办法来整党审干是一个新创造，是最健全的整党方法。

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近两月来，晋绥分局许多指示及二月十日在《晋绥日报》上公布的分局紧急通知，对土改和整党工作所规定的方针和办法，与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故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

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你们如果认为中央指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是原则问题上）在实行时还须加以解释，不致使下级干部看到后以为他们所做的凡不完全合这一指示的，都需推翻重做，那你们可作一个决议接受这一指示，而将应该注意之点写在上边同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绥分局的指示。

时发表。

中央指示第四项有“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的规定，对你区多数土地已经分配的地方，除掉如你们紧急通知所指因动中农面过宽，应对不愿抽地的中农（划错成份的在内）实行减抽或退回一部外，完全适用。

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

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422〕，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如果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差，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地掌握三查运动的正确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一些“左”的偏向加以防止。但一般地说，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除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所谓不同情况，是指要选择连队中俘虏兵成份多或少、新兵多或少、连队或机关的行政领导强或弱、党的支部健全或不健全、前方或后方、火线上或休整中等的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的规律。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以新的补充。试行的经验不论好坏（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

原则：

1. 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经济；

2. 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3. 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还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

4. 基本上计划经济，还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

5. 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

工业与商业的区别。工业是生产的，商业则附属于工业，投机性大，必须区别二者，尤其要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为标准。

---

* 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的一个提纲。

金融斗争——国家银行与私人钱庄。什么是我们要提倡的保护的，什么是我们要反对的取消的，什么又是我们今天尚不能取消而于我们不利应暂时容忍而须加以限制的。

税收政策。区别超利润税、限制税、普通税、免税、减税及区别营业牌照、所得税及摊派包税的各种根据。

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脉所系或非国家命脉所系，于国计民生有利或不利。

国家权力如何运用。政权、法律、监狱、税收、管制、奖励、贷款、禁令、会计核算新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组织与旧资本主义合理化。

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

工会、党委的作用。

同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

工业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方机关制度。

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

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

工业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贫雇农路线。

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

政治条件是什么？老资格还是新资格。

向谁学习，学习什么？

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在我人民解放战争日益胜利面前，国民党区域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都在为自己前途作打算。进步的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多已表示赞成我党“五一”口号中召开新的政协会议〔423〕的主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则有不少的派别及个人，已在美帝国主义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中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表面上牺牲蒋介石，宣布停战议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在这一活动当中，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424〕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一部分中间派右翼分子，亦企图倒蒋取得权位，使中国革命限制于他们所要求的范围，避免彻底的改革。此外，确有一部分人民天真地认为在蒋倒之后会有和平，他们对于美帝、李宗仁及中间派右翼分子尚存幻想。至于蒋介石及其死党则将尽力挣扎，非至万不得已，不肯轻易下台。这样，就使在目前的革命战争和反美反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蒋的人民运动之外，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和趋势在发展着。这一可能的发展，中央在去年十月曾经告诉你们，要你们在群众中进行准备工作，现在这种工作应当加紧进行。你们必须认识，美帝与某些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和平阴谋，是对革命不利的，因为它能够欺骗群众。但在另一方面，倒蒋的活动，显示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分裂。蒋介石一倒，不管政变者使用什么法术，总是无法挽救反动派的命运，而且会加深国民党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是对革命有利的。

（二）你们必须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在人民中，在民主党派及民主分子中，根据事情的演变，不断地揭露美帝与中国反动分子的阴谋。你们必须注意具有说服性地而不是笼统地武断地分析这一阴谋的企图及其所具有的危险性，以打破他们对于倒蒋和平的幻想。同时，又要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混同于前者，必致为反动分子所骗而阻碍革命的发展。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严格区别于前者，则可利用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而有助于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所以，你们在国民党区不应笼统地反对和平，反对某些人倒蒋，而应利用各种倒蒋活动分化反动统治，便我各个击破，并准备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和平运动。这就是说，在凡有群众的地方，或在某些民主分子的集会中，当着反动派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的和平要求尚混杂在一起时，我们不要害怕和逃避，而应积极参加，领导群众，坚持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独立的革命要求，以区别和揭破反动派的阴谋。同时，对于企图发动政变的国民党反蒋派别，当着他

们找我们商谈时，你们亦不要拒绝商谈。一旦反动统治内部的政变果真爆发，我们便能有准备地将敌人的欺骗口号转变为群众的行动口号，这即是向代替蒋介石上台而依然是美国走狗的人们要求人民自由，保障生活，逮捕战犯，解散蒋军，取消伪宪伪国大，停止美援，撤退美军，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等等，以推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以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走向全国胜利。同时，也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使那些口头上反美反蒋分子即中间派右翼分子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或者跟着我党前进，或者暴露他们的虚伪而在人民面前破产。但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三）如果你们对于上述这一策略方针能有清楚的认识，并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下去，你们将有可能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国民党区域进行活动，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其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已有财经紧急处分令〔425〕。其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已有特种刑事检举〔426〕。现北平已发出拘捕学生传票二百四十份，南京已发出传票一百四十份，上海、天津、广州、昆明及全国各蒋管区城市必将接着大行检举，必将由学生发展到工人、文化工作者及一切民主进步人士。在紧急处分令中，已禁止罢工、怠工，不久必将禁止其他一切群众活动。这是蒋在我人民解放军愈加胜利面前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和手段，这是蒋愈加接近死亡的表现。但蒋愈接近死亡，他的统治内部便会愈加分崩离析，各找生路，他统治下的群众便会愈加不能生活而走向革命化。到那时，蒋及其死党仍有可能在其最后据守的城市，继续其疯狂的法西斯的最后挣扎。但这种挣扎不是将自己的统治直接送进坟墓，便是被其统治内部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之下进行和平阴谋的政变所代替，从而也使代替者进入坟墓。因此，我党在国民

---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此原则下，针对当前紧急情况及可能发展的情势，除乡村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尽量发展武装斗争、在条件不成熟或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坚持群众工作和隐蔽党的组织以待解放军的到来外，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其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根据最近上海来的材料，党的准备工作及学生运动情形，都有此冒险倾向，这对于今天的坚持，明天的配合解放军进城，或在反动统治内部举行政变时所需发动的人民革命运动，都是不利的。

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最后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其已进入解放区受训者（如泊头），目前绝不容许再出去。如一时无法进入解放区而又有可能回至家乡者，即回家乡进行隐蔽工作；不能回家者，即须转移地区，另找职业

隐蔽。凡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在检举风浪过去后，再谋有步骤的发展，以便积蓄新的力量，等待时机。在这次大检举中的斗争策略，要依据各个单位自己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人数，实行合法斗争（尽量利用统治内部的矛盾），如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如果大多数学生已发生恐慌，不敢或不愿进行斗争，则不要使少数觉悟者单独去斗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凡脱离中间派的群众行动必须力求避免。隐蔽后的组织形式，应采取抗战后期经验，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针。在蒋管区城市中的党的领导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不得违犯。必须认识敌人所欲打击的中心是我党组织，必然从公开检举当中寻找打击我党组织的线索，你们应特别注意党组织尤其领导机关的保护。对已经破坏的组织，不要急于恢复。对其中发生了叛变分子的关系，应暂时隔绝，待弄清情况，再谋处理。

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

致郑洞国[427]信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428]，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429]先后被俘，吴化文[430]、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431]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　恩　来

十月十八日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各位朋友：今天特别请诸位来此聚会。我们虽然来了二十多天，但因为忙，未及分头拜访和请教，很感不安。昨天我们请了住在北京、六国二饭店的朋友来谈，今天又请了各大学的教授及外面的朋友，向大家请教。

要谈的问题很多，今天只能把最近的和平谈判问题向诸位报告一下。这样的报告，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我相信是与以前不同了。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432〕在一九四六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象陈嘉庚、张奚若〔433〕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广大人民还不了解蒋介石的和平骗局。今天情况变了。今天可以说，如果诸位赞成这次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的话，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这个变化是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奋战的结果。关于民主运

---

* 这是向来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做的报告。

动，诸位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今天只把军事的胜利说一下。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战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他当时在武装力量上的确占着优势。他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人，二百四十八个旅。这些都是在抗战中未受损失的，因为他实行的是消极抗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打开始，他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中，却完全变了。头两年，战争平稳发展，我们每年消灭敌军一百五十万人，第三年起就起了突变，七个月（截至今年一月）就消灭敌军二百多万人。造成这个突变的是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434〕。现在蒋介石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如学校、后勤等在内，只有二百二十万人，正规军则只有一百多万人，其中不少是受过歼灭而又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更弱。所以，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个战争是失败了，他的反革命企图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一百二十万人，现在则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伯韬〔435〕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

少有的，若没有高度的政治训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在部队中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但今天的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三评运动中，革命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干部，可以推荐下级指挥员，推荐得对的就批准，而且多数是批准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士兵们很了解，指挥员必须是能勇敢作战的，并且必须有智慧，单单勇敢是不够的，然后才是态度。所以士兵们的推荐多数是对的。这是评干部。其次是评党员。公开党员，让群众来批评党员，使党真正受群众监督。第三是评战功。谁有功，群众知道得最清楚，群众来评，自然可以评得最确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分明。民主扩大了，纪律加强了，指挥员们说现在的部队可好带了，士兵们说指挥员的态度变好了。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取“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别需要。淮海战役中，敌人的工事星罗棋布，但一夜之后，情形变了，我们的工事包围了他们的工事。士兵们设法钻过敌人的工事，破坏它，而建立起自己的工事。打仗还要靠炸药，但这些物质的死的东西要靠活人来使用。没有士兵的勇敢和智慧，炸药也就没有用处。我们的士兵又勇敢又有智慧，没有炸不了的堡垒。即便是水泥工事做得好，一斤炸药不行，就用五斤、十斤、一百斤、

二百斤，终归可以炸毁的。矿山石头都可以炸开，何况工事？敌人称这为“土飞机”。这种“土飞机”需要靠下面，单靠上面是不行的。王耀武曾问我们，为什么蒋介石飞到那里，他们那里就打败仗，毛主席天天坐在陕北，却处处打胜仗？这是因为人民觉悟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我们大家的。人民解放军今天的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所以，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失败了。

这样一来，南京反动政府在一月一日不得不提出和平建议〔436〕。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议我们却要拿过来。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毛泽东同志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437〕，就是真和平的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只好下台〔438〕，让李宗仁〔424〕代替他，这就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一个主和派。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派私人代表团〔439〕来平，最后我们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440〕。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斗方式可以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441〕，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场上敌我的伤亡和人民群众的损失都很大。例如淮海战场上几百个村落全都毁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救济。这样的损伤自然是以就此终止为最好。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

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我们不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壮大，也看到了敌人的分化。我们要争取主和派力量的发展，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美国帮助蒋介石打了三年内战，现在也承认失败了，所以他要制造某种和平局面，派代理人钻进人民国家内部来活动。这也助长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的意愿。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大肆搜刮，刮得上海资产阶级也受不住了，他们要求和平。除此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的公教人员也是一个和平因素，金元券〔442〕实在弄得他们活不下去了。由于以上的各种因素，才有这次和平谈判。在谈了十多天后，我们已经将一个最后的和平方案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他们送交南京国民党政府。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443〕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接收。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147〕和北伐战争〔121〕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南京代表团说，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争论是兄弟之争，我们给了他们严正的批评。这不能叫做兄弟之争。难道孙中山与袁世凯之争是兄弟之争吗？不，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近二十年来与国民党之争也是如此。不过，南京代表团和我们之间在为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础上的争

论，还可以算是兄弟之争。在这种场合，我们必须坚持严肃的原则性，决不能混淆是非。我们之所以坚持要用人民解放军去接收，因为这是关系革命到底不到底的问题。辛亥革命后，督军等等还是一概仍旧，只是换了一面旗。大革命时，北伐军到长江下游后，连国民党都说，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样，革命就变了质。张治中〔327〕说起“前车之鉴”，那么，这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今天也是只换一面旗，让各色反动派依然压迫人民，照样滥发金元券，则人民的痛苦如故，人民就要骂我们。这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做法。不推翻旧的，就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人民解放军不去，政权的性质就不能变更，反动军队就不能改编，生产就搞不起来。但接收也不简单，需要时间和人才，我们要有组织地接收。接收将是先城市而后乡村。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人士大家来做。等到渡了江，北京、六国二饭店恐怕不免就要“人去楼空”。我们兢兢业业，怕搞不好，但我们不能放弃责任。将来在联合政府中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人力不够，有些地方一时还接收不了。苏、浙、皖、鄂、陕、陇东将最先接收，其他地方只好缓一下。南京代表团总希望我们慢一点渡江。当我把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他们时，他们问我有没有渡江的条款，我说没有，他们顿觉惊喜交集。但我说，虽没有“渡江”，却有“接收”。其实，渡江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条件，许多接收的地方都在江南，何况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南京和溪口还没有完全割断，即所谓“藕断丝连”。他们说要等我们去割，我们则要他们先从政治上割断，军事上可以由我们来割。南京代表团不能反对我们过江，因为既然承认我们去接

收，当然就必须承认我们渡江。但他们总希望慢一点。至于广州、溪口则希望划江而治。我们指明，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他们获得喘息机会。这一点，南京代表团无法反驳。

关于改编，即改编军队。不如此就不能根绝内战因素。但又不能急躁，条件要宽大。我们的改编条件，甚至比南京代表团所提出的还要宽大。例如，他们曾主张裁兵复员，我们则主张一律集中整训。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点尤其强调。初看起来，这好象是违背民意，所以对这一点就不能不多加解释。国民党军队二百多万人，一听到裁兵，就会发生动摇，各作打算，于是不免要造成骚乱，到处危害人民。我们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我们提出在第一阶段中，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并且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每人每日四斤半小米）。毛泽东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我们不会象从前国民党对待八路军那样，对他们有所歧视。这样，应该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之处了。如果还要闹，就严正制止。经过集中整训，士兵有了觉悟，军官得到学习，就可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我们不能急躁，集中后要分别对待，等待觉悟。觉悟有快有慢，相信他们大部分都会转变过来的。当然，也会有捣乱的。

有了政权的接收和军队的改编，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四、八两条。

关于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南京代表团争得厉害。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未将战犯名单列上去，"元凶"、"首恶"等字眼

也都勾去，而且说，“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有人问，对蒋介石怎么办？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

关于二、三两条，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没有多大争论。但这自然是不大容易的。

关于五、六两条，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我们对没收官僚资本作了解释，即没收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取得的官僚资本，凡是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就不没收了。若有私人股份，经查明并非官僚资本转移的，一律承认。不如此，就会牵涉太广，影响生产的进行。

关于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谨慎的。对外条约有的要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

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向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多少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但这种压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失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也正在失败。美帝国主义固然还是强大的，但他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与美帝也交过手，文仗武仗都打过。文仗和马歇尔〔362〕打了一年，最后他还是失败而去。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他就软些，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

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他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中国共产党就是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气概开始的。虽然当时只有五十多个人，其中李大钊同志〔132〕英勇壮烈，血洒北平。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这是自然的规律。一切腐朽的东西，尽管是一大堆，但必然一天一天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这和五四时代的反封建有相同之处，那时反对封建很坚决，提出打倒孔夫子、对封建家庭斗争的口号。但今天看来，孔夫子的话若是好的，我们也可引用。我们的父母来了，也还得照顾照顾。对封建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对帝国主义也要如此。

在军事上，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无论如何总是缺理的。我们叫他们退出去，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他们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但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军若不退出，我们就有权消灭他们。美国若是大规模出兵，我们也不怕。中国是吓不倒

的。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可爱之处，我们决不忽视这一点），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美军若真敢侵略到中国来，占领我们的大城市，我们就用乡村包围城市，叫他们什么军需品（包括大便纸和冰淇淋）都必须从美国运来，还要背上大城市这样的包袱，负责供养。美国人生活程度高，他们是不愿打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也闹过出兵干涉，结果还不是“自动撤退”〔444〕？就因为吃不了苦。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难道还怕美国兵？

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不过我们不挑衅。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以总领事的资格递来一封信，我们就退回去，说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后来他用铁路职员的名义写信来，我们就让他登记。其实，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往来，司徒雷登〔382〕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445〕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中共的动向是容易明白的，只要听一次报告或看几个文告就知道了。至于将来和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

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

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帝国主义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但此中问题很复杂，不能遽然解决。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了病还去那里就医。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

关于第八条，再补充一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允许南京政府还存在一个时期。起先我们想用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它，南京代表团觉得不好，我们取消了这个主张，而使二者平列。若南京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并且履行了，则我们保证负责向政协筹备会提出让他们参加新政协。当然，通得过与否，那是另一问题。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南京代表团以为我们老是要和平，一定有弱点。第一，他们见我们快要当家了，以为我们很怕破坏，老鼠蹲在花瓶上，投鼠要忌器。第二，面对滔滔长江，他们以为我们一定很怕牺牲。所以，他们老是讲价钱。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平也不免有破坏，战争也不见得就把一切都打碎，总

有打不碎的，或者我们去得快些，他们来不及破坏。我们不过是争取愈少破坏愈好罢了。所以，这是吓不了人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各位朋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即使是地主，在劳动几年之后，也可以变为农民。过去因为环境不同，我们不在一起，今天既然到了统一的环境，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干。非共产党人也照样能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446〕，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用和平方法比战斗还要忙，要大家帮助。希望在小组讨论或座谈会中提出意见。我们长期在农村，对城市已经很生疏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绝不是单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干部所能做到的。今天，青年团员才二十万，连党员一共也不过三百万，比起全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来，这个数目是很小的，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一。我们要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如果不同广大党外团外的人士合作，如何能做好呢！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过，不要骄傲和急躁，要谦虚谨慎；同时，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要同党外人士合作。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相看。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管是在工人中农民中和学生中，党员和团员总

---

* 这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四部分的节录。

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画地为牢”。

有的同志以为党内的同志什么都好，其实并不如此。一个同志一旦入党，那只是他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不一定完全入党。就拿我来说，我也是团员出身，后来转为党员的。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党内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党外人士也有许多长处，我们也应该向人家学习。每个党员都要长期锻炼，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首先在生活上思想上作风上需要长期的考验。所以，我们入党入团以后，要很好地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才能很好地前进。这是对党员团员起码的要求。党外团外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进党进团，当然有些事情不知道，比我们差一点，但并不是没有长处。比如在农村中，许多农民比我们勤劳勇敢，比我们有办法；在工厂中的广大工人，比我们能生产，比我们能创造；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觉悟得慢一点，或者一时还不愿意入党入团，我们要帮助他们，启发他们，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互相学习。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团员就另眼看待，而一旦入党入团就什么都放心了，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这个毛病是青年人容易犯的。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

起，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打倒他们。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要分别对待，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共产党青年团要有这样的气概。我们今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同时，我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这就是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然，这个宽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首先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对反革命不能存在任何幻想。我们这个大圈子，就是要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中最反动的几万、几十万、百把万、几百万划出去。同时还要看到，这里边有许多人还可以改造，比如地富分子，一旦土地改革以后，经过三五年的教育、改造，他们是可以慢慢地改变的。当然，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到，但是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要有步骤地去做，使他们参加生产，逐渐地改造成为新人，不是囫囵吞枣，一下子都混进来。但是，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把他们都改造过来，领导起来。

最近我们同国民党代表团〔440〕谈判。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这样大的功夫，多麻烦！虽然是几个人，但是他们后边有一群。在他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以及公教人员，总有几百万，加上这些人家庭里的

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对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头子就影响后边一批，有利于我们渡江，就是渡江以后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这样一想，我们就看得广了，不会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边了。用这样的精神去做事情，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走，同时反过来，我们还跟他们学习。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联共党史上不是也讲了这一件事情吗〔447〕？在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政治家也喜欢争辩。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所以，青年人要学习，就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也有这样一种人，因为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把自己弄得惶惶无主，本来开始他还有主意，这样一听就失掉了主意。我们要听各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必须加以思考。一个人生着两个耳朵，能听话；生着两只眼睛，能看东西；生着两个鼻孔，能闻味。听话，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看颜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闻味，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所以，人体的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

从青年的时候起，就培养这样的思考力。还有这样的同志，见了党内的人和团内的人不怕，可是怕见生人，就象小姑娘一样。怕什么呢！我们应该去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有了这样的精神，在社会上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前进。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的群众，才能增加自己的勇气。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我们青年很需要养成这种作风。

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448〕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

* 这是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收入本书时根据原记录重新进行了整理。

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

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449〕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450〕，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279〕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280〕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那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

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

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451〕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452〕。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

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

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象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就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的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

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

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不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

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象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

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

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各位代表：让我首先向你们庆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453〕的成功，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新文艺大军在跟敌人作战上，曾经取得很多的胜利。我们打败过封建文艺，二十年来我们又打败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艺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在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方向下，我们建立了广泛的文艺战线。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决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454〕，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

对于文艺界大团结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在各方面

坚持岗位艰苦奋斗的朋友们，不能不归功于全国广大人民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支持，但是尤其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没有军事战线上的胜利，那么我们今天这样七百多人的大团结大会合，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的讲话的第一部分，我想向大家说说我们这三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情况和根源，以及文艺工作所应当由此得到的教训。

一　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从一九四六年的七月算起，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战绩，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三年以前，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四百三十万军队来进攻。那时候我们只有一百二十万的人民解放军，与敌人相差三百一十万之多。反动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主人在当时满以为一定可以打垮人民解放军。多少好心肠的朋友也曾经为我们担心。我们感谢这些朋友，但是我们坚定地告诉他们，战争的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当时国民党首都南京的时候，许多的新闻记者问我："你们还回来不回来？"我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果然回南京了，不过进入南京的不是我们当时的代表团，而是胜利的人民解放军！

战争的第一个年头，敌人是处于进攻阶段，但是因为受到了我们的重大打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很快就变成了局部的进攻或重点的进攻。第二个年头，我们开始反攻，华北和华东的

野战大军渡过黄河向南前进到长江北岸，同时东北的人民解放军也由北满向南满进攻。在战争的第三年，我们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济南战役〔434〕，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的辽沈战役〔434〕，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初的淮海战役〔434〕，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底的平津战役〔434〕，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就从此基本上被消灭了。因此，在今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不可能组织一条有实际意义的防线。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现在的三年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从开始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九万人，这一百四十九万人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机关、学校和后勤部门，战斗的部队大约只占半数。我们人民解放军却从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今天的四百万人以上。巧得很，他们少了二百八十万，我们多了二百八十万。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二百二十多万的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着已经只剩八十多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我们已经解放了两万万七千九百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九；解放了一千零六十一座城市，占全国城市百分之五十三；解放了两万一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占全国铁路百分之八十。敌人除了在海军空军方面暂时还占有优势以外，一切方面的优势已经都属于人民了。这个情况，使我们相信人民解放战争的第四年，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

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的伤亡一共是一百四十三万人，而消灭的敌人是五百六十九万人，就是说我们伤亡一个人，消灭他们四个人。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

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三年中间，消灭了敌人正规编制的军队四百九十五个师，连非正规部队算在一起，消灭了敌人二千一百五十个团。俘虏的将级军官，加上上校级的师长，达到九百二十七人。三年中间缴获的武器，有各种炮四万四千多门，轻重机枪二十五万多挺，长短枪二百多万支，飞机一百三十四架，军舰一百二十三只，坦克车五百八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马十三万匹，步机枪子弹三万万七千多万发，炮弹三百一十一万发。我们就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解放过来的战士，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弹药，回过手来战胜了敌人。

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的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人民解放军本身的素质，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锻炼，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成熟的战略战术。尤其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经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但是这个纪律

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内部实施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在部队外部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得以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断地提高，使得人民解放军获得无上的战斗力量。

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你们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提议我们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以及所有解放军代表同志，你们应当利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热烈招待没有看到过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家到部队里去参观，给他们调查和写作的便利。

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不是孤立的。在三年的人民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得了土地，另外一万万以上的农民正在准备着解决土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两万万的农民将要进入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这在农业的中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农民贡献给战争的是些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们把生产节约的粮食供给我们的前方后方，他们当民兵，当民工，不但在后方维持秩序，并且大批地随着部队出发到前线去做种种协助战争的工作。只要那个地方的战事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就掀起了生产热潮。同志们！朋友们！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伟大的中国农民，特别要感谢老解放区的农民。尽管农民有他们的落后的方面，要待我们耐心

地改造，然而他们的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本质，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值得我们记录和宣扬的。所以我们希望已经习惯于乡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乡村工作，为他们服务；同时也欢迎没有到过农村的、没有习惯于农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去学习农民，与农民做朋友，以便于写下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业绩。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不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尽管我们二十二年斗争的很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在农民和部队里面，但是我们的斗争是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着进行的。从政治上说，是在工人阶级通过他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在乡村中间，我们也不能离开工人。大规模的战争首先不能离开兵工生产。武器主要是敌人输送给我们的，但弹药还需要我们自己的补充。我们依靠工人。我们把大的锅炉从矿山从机器厂用几千人抬到太行山上，抬到五台山上，抬到沂蒙山区，在山上建设了工厂，几千万的手榴弹，几百万的迫击炮弹，几十万的山野炮弹，便这样生产出来了。到了去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兵工，我们在乡村中还发展了各种小规模的轻工业，供给军需民用。今天我们进入大城市以后，情况更不同了。我们必需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恢复和发展工业。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

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一般精神劳动的

特点之一是个人劳动(当然歌咏队、剧社、电影厂等的许多活动是集体的),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在这一个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个胜利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却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长大,曾经经历过错误和失败,但是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是站在正确的方面。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敌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年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集中表现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的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同时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认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同志常常说,我们每一级的党委应该交几个文艺界的朋友,以便于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目标上共同努力。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世界人民力量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影响和援助。不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了以

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的援助，而且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也给了中国人民以伟大援助。帝国主义阵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西方，把次要的力量放在东方，这对于中国革命就是一个首先重要的有利条件。苏联的存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亚洲和其他地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新战争运动的存在，这一切力量的总和大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力量的总和，因而阻止了新世界战争的爆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武装干涉中国。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全国人民传播这个真理。我们要分清敌我，暴露帝国主义的罪恶，打击战争贩子的叫嚣，揭穿他们的恐吓、挑拨和欺骗。这个庄严的工作，是中国民族利益所要求的，也是世界人民利益所要求的，这正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二　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想讲几个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

第一，团结问题。我们现在开的是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应当说，出席这个大会的七百五十三位代表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现在在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加上直属兵团，加上五大军区〔455〕，参加文艺工作的，包括宣传队、歌咏队在内，有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的数目。解放区的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数目，估计也有两万以上。两项合计有六万人左右。这就是解

放区的四百多代表所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新文艺工作者的数目比较难算，大概总有一万人以上。这就是说，你们七百五十三位代表，代表着七万上下的新文艺部队，平均每一个人代表着一百个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旧艺人。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能领导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发扬这次大会的团结精神，并且希望大家经常地密切地联系这支广大的文艺军队，使你们真正不愧为他们的代表。

第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我们应该首先研究一下我们熟悉什么，不熟悉什么。部队文艺工作者熟悉部队，部分地熟悉农村，但对工人和城市的情形就不熟悉。解放区地方文艺工作者熟悉农民，不完全熟悉部队，对城市情况也不熟悉。我们从新区来的朋友，过去限于环境，不可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但今天的情况变了，有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了。总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

我们首先需要熟悉工人。现在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一般地都不熟悉工人，所以反映工人的作品还很少。我们希望能有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自己不能到工厂去的，也应该宣传这个号召，把它变成一个运动，推动成千成万的文艺工作者向这方向走去。

这几年有一部分同志已经开始熟悉了农民和兵士，兵士基本上是拿枪的农民。应该继续熟悉他们，并帮助不熟悉的人去熟悉。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

成一片，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希望已经下过农村的文艺工作者不要自满。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中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而近二十几年来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史，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那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

第三，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现在还是不是普及第一呢？还是普及第一。解放区做了一些普及工作，但是离开普及的需要还很远。至于说现在产生的普及性的文艺作品还很粗糙，需要改进，需要提高，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如因此而轻视普及工作，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新生的东西那有不粗糙不幼稚的？我们对于新生的东西不要责备过甚，对它要爱护帮助，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孩子需要批评教育，但是不能打骂，否则就把孩子打坏了，骂傻了。新生的事物常常大喊大叫，它要改造这个旧世界，这是一种革命气概。脱离人民的旧文艺已经是腐朽了，尽管外表如何好看，内部已经烂了，希望是属于新的方面。我们的普及性的文艺

作品虽然还不高，但它们确是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新文艺在普及方面的生长和成就，即使是一些小的生长，小的成就。

第四，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使我们高兴的，就是旧文艺界许多有成就的朋友，愿意参加这个改造的工作，而且希望同新文艺界的干部团结在一起来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应当用很大的热情来欢迎他们。旧社会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我们过去做了一些改造工作，但是成绩还很小。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如果不团结广大的旧艺人，排斥他们，企图一下子代替他们，是不可能的。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实在说，现在这个工作刚才开始。有些人觉得旧文艺没有什么前途，以为它总是要消灭的，因此就发生不重视它，让它自生自灭的心理。但是，今天的事实是广大的人民还在看它，听它，喜欢它，难道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对这样的事实视为等闲吗？旧文艺会不会消灭呢？我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它是会消灭的，它又是有前途的。旧

文艺里的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有前途的，而不是被消灭的了。我们要这样看，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如果认为旧文艺什么都好，什么都保存，那样就会走到复古的路上去了；另外我们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样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普及第一的主张，同时也不合于我们的历史观点。改造旧文艺也跟创造新的普及文艺一样，开始也会是粗糙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粗糙就轻视它，因为你一轻视它，它就很难生长，很难壮大。这种改造工作无疑地将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希望一下子改造得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而不去紧张地努力。

第五，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我们文艺界的朋友来自各方，譬如解放区的，就有一部分是从部队来的，他们是长期地在部队工作，另一部分是从解放区各地方组织来的，他们过去限于环境，工作也带局部性，现在聚会一堂，来商讨今后全国的文艺工作，那就不能不要求我们大家有全局观念。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那一个工作部门，或者只看见我们个人的工作环境，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解放事业，看到我们今天全国的文艺工作，我们的工作才能安排妥当。今天全国接近于完全解放，我们的后方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了解，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初期是一个

艰难缔造的过程，尽可能要求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每一项工作都能很快发展，同时又要求有计划地适合全局的需要与可能，各部门中的分工安排就需要我们根据轻重缓急来定了。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开得确实不坏。但是如果以为它一切都美满，或者以为今后的工作一切都会美满，那么一接触实际，便会有很多地方、很多工作感到不满和失望。假若我们各部门的文艺工作者都有全局的想法，能够和今天的建设联系起来，和我们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发展就会更快。比如我们的部队还要继续前进到南方、西北、西南，广大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就要向新区前进，去推广文艺的普及工作，和部队配合前进，解放尚未解放的两万万的人口，这是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向。因此尽管部队文艺工作者要求提高，也有可能一部分回来受训练，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甚至开始还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个人要求就要服从全体的利益。解放区地方的文艺工作者也是一样，也可能从老解放区调到新区去工作，去组织那个地区的文艺部队，推广那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这也是文艺与政治的一种结合。

今天要把事情的困难估计多一些，在什么困难条件下都能工作，那样，将来好一点当然更好了。我这样说，就是为了大家精神上有准备。

最后一个问题，是组织问题。因为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象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

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这是群众团体方面。

同时，新政治协商会议〔423〕将要产生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在这个政府机构之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个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因为这个部门是为我们广大人民及群众团体服务的，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同时又是由上而下的人民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文艺界也要关心这一方面的工作，也要推出代表来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在部队里，有的一个野战军多到八千多人，有的很少。当然这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各自发展的结果。地方上也是这样，有的一个县有一个文工团，有的没有。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还会继续，但是城市和乡村，部队和地方，慢慢地调整是需要的。尤其是新区，我们要派出大批的人员去。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朋友，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在反动派的统治下有空隙就要钻进去，控制它一块，被压迫就藏起来。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的国家，要自己来安排。所以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

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

这是在文艺方面我想说的几件事情，提供诸位研究参考。

同志们！朋友们！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

在全国接近于最后胜利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七百多位代表能够有这样的大团结、大会师，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中国革命领导到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恢复生产，建设中国*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开幕了。刚才朱总司令讲了工会工作的许多问题，大家在会议中还要讨论许多具体问题，我在这方面就不多说了。我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作重心讲一讲。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革命还在向着彻底胜利前进。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渡的发展的形势当中！我们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打到台湾去，打到海南岛去，打到昆明去，打到新疆去。我们要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帝国主义封锁作斗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工会工作也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主要地位。

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工会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的口号是：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艰巨的

---

* 这是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工作。原封不动地接收是比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进一步来管理就难得多。而且还要改革旧制度。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我们要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加上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的，象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用外国的运输工具运到外国市场去推销，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今天不同了，条件完全变了，也应该变了，应该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了。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是畸形的，不合理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第二是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冗员很多，原来敌伪的一套人员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员组成官僚主义的管理机构，人力浪费，开支庞大。这也给我们添了很大的负担。第三是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极大破产，没办法给城市工业提供原料。拿棉花生产来说，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棉田都减产，因为有美棉的倾销。其他原料也是这样。所以城市解放以后，我们会看到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这种困难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不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也不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还能转败为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无法克服。我们的困难是革命胜利中所遇到的，是以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带来

的。正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村解放和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只要经过一年时间，农业生产就能增加。这种经验在华北、东北、西北都有过。东北去年全部解放，今年就计划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华北今年春天全部解放，明年就可以增产。接着，华东、华中、华南都会这样发展。而且，现在我们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农村破坏很少，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要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恢复生产，必须靠交通运输畅通。比如淮南的铁道恢复了，就可以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将来平汉、粤汉都要这样地恢复。此外就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还要增产农业工具，如水车等，使农村得到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当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所以从全局来看，我们的事业是发展的。在局部，譬如上海，或者在某一方面，生产确实是减少了一些。大城市的那种殖民地商业，外国货充斥的商业，是会少一些的，有些买卖是会关闭一些的。特别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费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关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工人失业。但是，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

流与支流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我们的革命要彻底胜利，要把帝国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统统去掉，必然会遇到他们留给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准备迎接和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裳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这样才能节省国家的经费，使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东西，首先用到革命当中、战争当中去。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增加生产，克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困难。这是我们在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对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个号召，也是对于我们人民的一个号召。

我们的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领导他们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七百多万人。还要有多少民工支前！还要有多少民兵打游击战！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现在到了城市，我们的开支更大了。譬如上海、天津、北平三个大城市，有一千万人口，生产还没有恢复，我们要支出多少人民券？这些支出加在谁身上？还是加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身上了。因此，我们城市工作的同志要想到农民。我们工人阶级今天也要负担同样的辛苦，起到我

们应该起的作用。

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工作。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工会都要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423〕，这样就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不但工会的代表，而且我们革命的职员，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代表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要来领导全国政权的建设工作。现在各个地方也正在建设地方的人民政权，工人阶级要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还要参加今后的国防建设。过去，我们是从游击战发展到正规战，把敌人的武器缴获过来，装备自己，消灭敌人。今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努力。工人阶级还要参加文化建设。总之，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各种建设工作，而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我们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我们就有把握建设新中国。

最后，讲一讲团结问题。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我们要团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团结：

首先是我们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起来。据说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一百万以上，如果把全国一切工人、职员、手工业工人统统组织起来，把农村的农业工人也组织起来，会达到一千万以上。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教育工人的地方，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机构，也是代表工人阶级来参加领导和参加各种建设的组织。工人阶级团结不仅要看到工人中先进的部分，还要看到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对于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我们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团

结在一起，领导他们向前进，而不能搞关门主义，挑剔他们，冷淡他们，排斥他们。我们要有明确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这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是伟大的，才能担负起刚才所说的任务。

第二是公营企业中工人与职员要团结起来。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以前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对管理者有对立、反抗、斗争的情绪那是必然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把过去旧的对立的观念和态度改变为新的团结的观念和态度。实现这种团结的最好的机构就是工厂管理委员会。我们的工厂一切管理人员，不要把旧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拿过来，要实行民主，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在一起，民主地具体地来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等，同时要给厂长以最后决定权。有民主，有集中，全体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

第三是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因为过去他们只有投机才能生存。今天应该把这个投机破坏性去掉，这就需要斗争；同时要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这样才能够团结他们。要实现劳资两利，中心环节是要订立各行各业的集体合同，解决各行各业的劳资问题，否则两方面的斗争就不能限制，弄不好罢工也可能发生，生产就要受到破坏。订

立集体合同，双方就可以安心生产了。

第四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才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冒险。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欢迎和拥护，更增加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456〕草案，是新政治协商会议〔423〕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草案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现在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有如下几个问题，现在加以说明。

第一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努力，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伐〔121〕。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派主持起草了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并在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这是报告的摘要。

和成功。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始终反对统一战线的，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三次反共高潮〔457〕，而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推翻双十协议〔373〕和政协决议〔345〕，最后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这次内战教育了人民，使广大人民逐渐地走到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消灭反动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去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正如共同纲领草案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军队、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拥护和赞助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

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第二是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

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

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反动分子们，决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458〕，便是一个例证。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将加强工作以防止他们的阴谋破坏。我们大家则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打击反动分子的各种阴谋。

第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459〕，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是军事制度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

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它的特点是不仅勇敢机智善于作战，而且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并帮助人民劳动。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种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边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为人民的军队。

第五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460〕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那些是应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些是现在可以做的、那些是现在不能做的；那些是已经做了的、那些是尚未做的等分析规定出具体条文。

第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草案中规定了必须强调的几项，其他没有规定的并非不作，因为在草案第五章中已经都概括地提到了。

第七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问题。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

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第八是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问题。草案第七章中明确地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总纲上已明白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的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注　释

1　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第1页。

2　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一九一四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第1、92、112、159页。

3　“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近万人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46、57、88、117页。

4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在广州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为了调查这一重大暗杀事件的真象，由有关方面人士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第2、117、165页。

5　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新的译文是：“共

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第4页。

6　见《国民周刊》第3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所载范谔写的《从海康案说到农运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广东海康县军政当局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枪杀农民运动工作人员程庚的罪行。——第5页。

7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第6页。

8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安庆市国民党党部和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筹备处,打伤多人。——第6页。

9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四月九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杭州袭击了市总工会,三十一日又开枪杀伤参加抗议游行的工人八十多人。四月九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捣毁了左派领导的江苏省和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四月十日逮捕、殴打游行的革命群众,杀害省党部常委侯绍裘(共产党员)。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背叛革命,公开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第6页。

10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第6页。

11　薛岳(一八九六——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第6页。

12　严重(一八九二——一九四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总教官,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蒋介石任命的职务。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第6、71页。

13 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北路)总指挥兼三十七军军长。——第6页。

14 中央政府,指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第7页。

15 “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农运、工运及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时候,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第8、19、45、171页。

16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12、14、45、56、157页。

17 卢冬生(一九〇八——一九四五),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担任党中央联系湘鄂西苏区的交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湘鄂西苏区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师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初期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松江军区司令员。——第14页。

18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许多地方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先后建立了称为苏维埃的革命政权。广东海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四月、九月和十月三次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海南岛的定安、琼山、万宁、乐会等地的农民，十月举行起义组成了红三师。江西的万安、延福、东固、雩都等地的农民，十二月举行起义，万安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游击队。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孝感等地的起义农民，十一月占领了黄安县城三十多天，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南东部的农民，九月举行起义，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一九二八年初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第15页。

19　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指贺龙领导的红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攻下湖北省建始县城、一九二九年一月攻下湖北省鹤峰县城的两次战斗。——第15页。

20　杨维藩，曾是中国共产党恩(施)鹤(峰)临时特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初，因工作消极被停止党籍。鹤峰战斗后，因拖枪叛逃被处决。——第17页。

21　中央的两个政治通告，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和一九二九年二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十号——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第17页。

22　汪铭(一九〇三——一九三一)，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十月就义。——第20页。

23　中共顺直省委，先后称北方局、顺直省委、河北省委。顺直指北京(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顺直省委曾领导河北、山西、北平(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陕北一部的党的工作。——第20页。

24　河东七县，指山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安邑、闻喜、夏县、解县、猗氏、绛州(即新绛)和绛县。——第22页。

25　彭，即彭湃；杨，即杨殷；颜，即颜昌颐；邢，即邢士贞。他们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的烈士。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县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一九二五年五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失

败后，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在党的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第23、118页。

杨殷（一八九三——一九二九），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常委，并任中央军事部长。——第23页。

颜昌颐（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湖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四师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和彭湃一起发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任红军党代表。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第23页。

邢士贞（？——一九二九），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第23页。

26 “四一二”，指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参见注〔9〕。——第23、166页。

27 张际春（？——一九三三），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同年参加领导上海五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两次反帝大示威，八月二十四日被捕，一九三一年冬出狱。——第24页。

28 《布尔塞维克》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前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共出一二六期，前二十三期是周报，后一〇三期是三日报。一九三〇年八月二日停刊，同月十五日和《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红旗日报》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同年三月九日改名《红旗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六十四期。——第24页。

29　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第25页。

30　《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一九二二年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年先锋队歌》。——第25页。

31　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第25、44页。

32　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第29页。

33　蒋桂、蒋冯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和同年五月蒋介石与西北军冯玉祥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展势力进行的军阀战争。——第29、178页。

34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订立航空邮务合同，允许美国公司经营南京至汉口、南京至北平、汉口至广州三条航线的航空邮政业务，给予邮件运输的专利权，并允许以后可以延长和开辟新的国内航线。——第29页。

35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与英国订立海军援助协定，英国答应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海军。——第29页。

36　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进而侵略全中国的计划。据当时中外报纸揭载，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一九二七年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第29页。

37　中东路是一八九六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后，由俄国投资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经营的一条铁路。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改为两国共同

经营管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后，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一九二四年的中苏协定，以武力手段夺占中东铁路，驱逐任职的苏方人员。七月十七日，苏联宣布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十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八万余人开赴绥芬河，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这一进攻因苏联军队的回击而失败。——第29页。

38 目前反蒋的军阀战争（或称张发奎事件），指一九二九年九月开始的国民党军第四师师长张发奎与桂系军阀、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这次战争又称两广战争或两广冲突。——第30、31页。

39 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30、163页。

40 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改良主义，主张发展“国家资本”，兴办“合作事业”，实行工人“红利制”和农村“自治”，“以反对共产党和党内外的军阀”。——第30页。

41 冯，指冯玉祥；唐，指唐生智；朱，指朱培德。——第30页。

42 阎，指阎锡山；张，指张学良。——第31页。

43 奉张内部的新旧之争，指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属中土匪出身的以张景惠、张作相为首的旧派与留日士官学校出身的杨宇霆、韩春麟为首的新派之间的斗争。——第31页。

44 杨，指当时东北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常，指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他们是张作霖的重要部属。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枪杀了杨、常。——第31页。

45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驻浦口一带，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围剿”红军。——第32、67页。

46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第32页。

47 二陈冲突，指一九二九年夏天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和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为争夺广东的军政大权而发生的冲突。——第32页。

48　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军长。——第 32 页。

49　朱培德，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调离江西，省主席一职为鲁涤平所取代。——第 32 页。

50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第 32 页。

51　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第 41 页。

52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一九一二年联络过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在战争、和平以及革命等基本问题上以“左”的立场反对列宁的正确方针政策。一九二三年秋集结同伙，提出反对派纲领，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和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清除出党。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第 44 页。

53　中央的第四十四号通告，指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第 44 页。

54　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长等职，著名的右派首领，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盟者。后来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长期对立。——第 44、115、165 页。

55　戴季陶（一八九〇——一九四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忠实追随蒋介石。——第 44、113、151、166 页。

56　周佛海(一八九七—— 一九四八)，一九二一年曾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叛党。蒋介石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长等职。——第 44 页。

57 《新生命》是周佛海主编的反动月刊，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创刊。——第46页。

58 一九一九年七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国际，议决八月一日在瑞士卢赛恩召开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全世界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游行，向第二国际示威。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定八月一日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了反帝示威。——第46页。

59 惺惺惜惺惺，原意是聪慧的人爱惜聪慧的人。这里借用这句成语，形容机会主义者和反对派同类相聚。——第47页。

60 赤色工会，指当时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会，与国民党领导下的黄色工会相区别。——第48、181页。

61 钧，即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化名江钧。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〇年八月任长江局书记。同年十二月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历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时牺牲。——第48、201页。

62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要参加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但沿用了当时中央文件中流行的“消灭黄色工会”的不正确提法。——第51页。

63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共湖北省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人赤色先锋队，作为城市暴动的中心队伍，后来并未建成。——第51页。

64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主要是反对“左”倾，特别提出要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的错误观点。但沿用了当时中央文件中流行的“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正确提法。——第52页。

65 立三，即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即立三路线)错误。当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一九三〇年九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后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在党的第七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55、162页。

66 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

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宣布解散。——第55、138、151、165、203页。

67　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心城市爆发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而且中国革命必将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议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点。决议不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个决议案的通过使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第55页。

68　中央七十号通告，指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发布的《中央七十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第56页。

69　陈韶玉，即陈绍禹（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又名王明，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六十年代后堕落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第56、184页。

70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占领长沙，七月二十九日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八月五日退出长沙。这次事件被称为长沙事件。——第56页。

71　一九二八年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战后至一九二三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尖锐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发动时期；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时期；一九二八年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结束、总危机尖锐化、"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第56页。

72　国际十次大会的"决议"，指一九二九年七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第57页。

73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一九三〇年五六月间在上海秘密召开的。——第57页。

74　"八一""八三"的会，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在"八一"的会上决定把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成为中央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在"八三"的会上决定举行武汉暴动、南

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规定总行委是全国暴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当时周恩来不在国内。李立三在会上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第57页。

75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旅长、师长、督军、督办等职。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十一月五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一九二六年九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曾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和内蒙)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一九四八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九月一日在由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途中遭遇火灾逝世。——第58、120、170、194、211、2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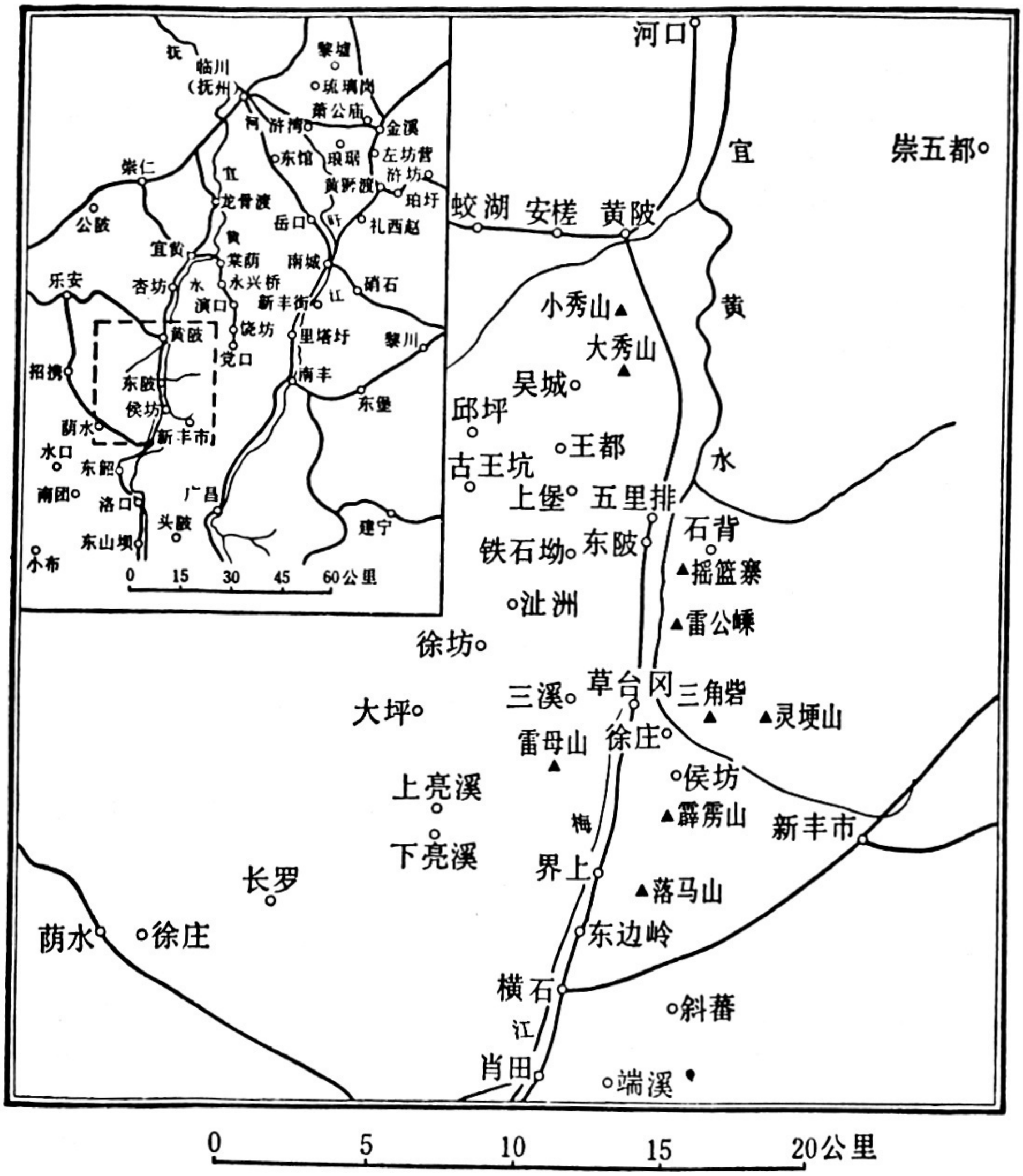
76 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蒋军十二个师，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分三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地向广昌进攻。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移到敌军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二月二十六日，敌第一纵队三个师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部队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进至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在二十七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敌军遭此打击后，即改变部署，三月十五日以六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红军放过敌人先头四个师，在二十一日晨突然向进至草台冈、东陂地区的敌人后尾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余敌仓惶撤退。红军两战共缴枪万余支，这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附略图)——第59页。

77 金溪战役，指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至八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地区进行的战役。——第59页。

78 吴、罗、周三师，指国民党军吴奇伟的第九十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第59页。

79 南丰战役，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二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南丰城以东石沟墟地区进行的战役。南城战役，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地区略图



二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南城以东礼西赵地区进行的战役。金溪战役，见注〔77〕。——第60页。

80 曾，即曾洪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叛变投敌。

邵，即邵式平（一八九八——一九六五），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

唐，即唐在刚（一九〇三——一九三五），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北上抗日途中牺牲。——第61页。

81 宜黄、乐安战役，指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红一方面军攻占江西乐安、宜黄的战役。——第61页。

82 陈诚（一八九六——一九六五），一九二二年在粤军任连长。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围剿”时任国民党军第二路军总指挥。西安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等职。——第61、114、192、277页。

83 朱，即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王，即王稼祥（一九〇六——一九七四），当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62页。

84 彭鏊（一九〇四——一九三三），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反“围剿”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三师师长。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牺牲。——第64页。

85 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第65页。

86 董，即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曾在国民党军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同赵博生一起率部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第五军团第十三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在甘肃高台战役中牺牲。

朱，即朱瑞（一九〇五——一九四八），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北方局军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解

放军炮兵司令员等职。一九四八年十月在解放义县的战斗中牺牲。——第68页。

87　彭，即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

滕，即滕代远(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第69页。

88　林，即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一九三〇年一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六六年后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叛国出逃，机毁丧命。——第69、179、203、253页。

89　聂，即聂荣臻(一八九九——　　)，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第69页。

90　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第70、193页。

宋美龄(一九〇一——　　)，蒋介石的妻子。——第70页。

蒋鼎文(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准备调他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第70、192页。

91　张，即张学良(一九〇一——　　)，东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第70、193、248页。

92　杨，即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西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九三七年四月，被蒋介石迫令去职出国。同年十一月回国参加抗日工作，随即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重庆国民党集中营惨遭杀害。——第70、193、248页。

93　何应钦(一八八九——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张群(一八八九——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

张嘉璈(一八八八——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

吴鼎昌(一八八四——一九五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

陈绍宽(一八八八——一九六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71页。

94 孔祥熙(一八八〇——一九六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

徐新六(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当时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复旦大学校长。

颜惠庆(一八七七——一九五〇),曾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中国出席国联第十六届大会的首席代表。

赵戴文(一八六七——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

邵力子(一八八一——一九六七),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

陈季良(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政务次长。

沈鸿烈(一八八二——一九六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青岛市长。——第71页。

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第71、194页。

曾养甫(一八九八——一九六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

朱家骅(一八九三——一九六三),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

俞飞鹏(一八八四——一九六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

卢作孚(一八九四——一九五二),当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

王世杰(一八九二——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宋庆龄,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杜重远(一八九七——？),当时任上海进步刊物《新生周刊》主编,一九三五年五月,曾因刊登爱国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判刑。西安事变前曾帮

助张学良接受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始出狱。一九四八年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粮食部长等职。——第71页。

95　七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也称“七君子”。——第71、192、248页。

96　阎，指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长期统治山西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79、85、229、236页。

97　教导团的全称是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决死队的全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少先队的全称是山西少年抗敌先锋队。

一九三六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开辟工作，在取得阎锡山同意后，相继组织了这些人民抗日武装，统称为山西新军。——第79页。

98　黄，指黄绍竑(一八九五——一九六六)，国民党桂系军人。当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第79页。

卫，指卫立煌(一八九六——一九六〇)，当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五五年由香港回到北京，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第79、200页。

99　刘湘(一八八九——一九三八)，四川军阀。当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79页。

100　许旅，指西北军十七路军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参加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参加易县、曲阳阻击日军的战斗和忻口战役。一九四三年在陕西郿县被胡宗南部暗杀。

赵师，指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一八九三——一九六五)，西安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三月到解放区。一九四八年一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孙军，指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一八九六——一九七九)，西北军爱国将领。长期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同情和支持人民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79页。

101 总动委，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它是在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建立的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当时的工作任务是在雁北、绥远、察南战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主任委员是续范亭。——第80页。

102 胡服，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北方局工作。——第80页。

103 宋任穷(一九〇九——)，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第80页。

104 彭真(一九〇二——)，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第80页。

105 雪枫，即彭雪枫(一九〇五——一九四四)，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一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河南夏邑和日伪军作战中牺牲。——第80页。

106 九国公约，是一九二二年二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主要反映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日本拒绝参加。出席会议的除原缔约国家外，还有苏联、印度等共十九个国家。由于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拒绝讨论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原则，会议没有取得积极结果，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第81页。

107 据英国伦敦《标准晚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报道，日本政府当时曾向蒋介石提出了六项议和停战条件：一、中国承认内蒙为独立国；二、华北五省有决定自治之权；三、上海日军占领区域改为日本租界，并须取得通海道路；四、中国沿海自山海关起至越南界止所有各岛附近之捕渔权让给日本；

五、中国退出国联；六、中国不得设立军用航空。——第 82 页。

108　华北自治政府，指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在华北制造的汉奸政权。这一傀儡政权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要头目是王克敏、王揖唐等。——第 82 页。

109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沦陷区利用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第 82 页。

110　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和操纵下，蒙奸德穆楚克栋普鲁（即德王）集团把原“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称“蒙古自治”。——第 82 页。

111　汪，即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一九四〇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第 83、115、208 页。

112　特殊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策略步骤。一九三五年四月，日本策划在中国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区域。同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十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第 83 页。

113　南怀化现属山西省原平县王家庄公社。——第 84 页。

114　这里讲的“三三制”是军队的一种编制，指每级直辖三个单位，如每团下辖三个营，每营下辖三个连，每连下辖三个排，每排下辖三个班。——第86页。

115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抗战十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第 87、154 页。

116　东北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辖区分别

划归河北、辽宁二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即派兵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攻。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仅仅百余日,辽、吉、黑三省即为日军所占领。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又进攻热河,前后不过十天,热河全境沦陷。——第90页。

117 一九二二年六月曾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被许崇智等逐出广州后退踞广东东江(惠州、潮汕一带)。东江战争指一九二三年夏至一九二四年夏,孙中山调集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闿、程潜的湘军,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进攻陈炯明部的战争。西江战争指一九二三年一月和五月在广东肇庆一带滇桂粤联军先后与军阀陈炯明、沈鸿英部的战争。北江战争指一九二三年五月至十一月在广东韶关一带,滇桂粤联军与军阀沈鸿英部的战争。南路战争指一九二三年九月和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广东廉州、雷州等地,粤军与陈炯明部邓本殷的战争。——第92页。

118 黄埔军校,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在该校担任过各种职务,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第92、114、166页。

119 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广州出发东征,打败了盘踞在东江的军阀陈炯明的主力。六月回师广州,平息了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十月至十一月举行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第92、117、118页。

120 杨,即杨希闵,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刘,即刘震寰,当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勾结在一起,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从东江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第93、117页。

121 一九二六年七月,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93、124、211、246、318、366页。

122 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同年七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

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政府在“不干涉政策”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经过三年苦战，一九三九年三月首都马德里沦陷，共和国政府失败。佛朗哥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第93页。

123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处大多变成了特务机构。它的任务是进行反共宣传，侦察和监视官兵的思想行动，以利于蒋介石个人对军队的控制。——第94页。

124　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第102页。

125　青帮，民间秘密团体。清初从漕运行业中发展起来，其成员主要是船工、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及破产农民等，其组织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和封建宗法制色彩。常为官僚军阀所收买和利用。但在辛亥革命中曾起过一些作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武汉等地的青帮头子充当了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破坏革命的工具。

大刀会，民间秘密团体。清末产生时是白莲教支派，主要活动在山东、苏北、皖北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曾在一些地区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和外国传教士的斗争，并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也常被封建地主利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第108页。

126　董必武（一八八五——一九七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领导筹建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常务委员。——第112页。

127　陈潭秋（一八九六——一九四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后历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湖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一九三九年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由于情况隔绝，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第112、185页。

128　何叔衡（一八七五——一九三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湘江中学校长，曾参加改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监察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后留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第112页。

129 夏曦(一九〇〇——一九三六),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任常务委员。——第112页。

130 宣中华(一八九八——一九二七),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杭州地委负责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被蒋介石反动派逮捕,十二日就义。——第112页。

131 侯绍裘(一八九六——一九二七),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在南京被捕就义。——第112页。

132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筹建国民党北京市、天津市、直隶省党部,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就义。——第112、322页。

133 于树德(一八九四——),一九二二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112页。

134 李永声(一八七二——一九五二),又名李锡九。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参加筹建中共顺直省委。一九二四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筹建和领导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112页。

135 于方舟(一九〇〇——一九二八),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四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建和领导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一九二七年秋领导河北玉田农民暴动时被俘,一九二八年春就义。——第112页。

136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从广州经上海到北京,准备同当时战胜了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张作霖等谈判。他在北上宣言中主张对内"推倒军阀",对外"推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到达天津时已病重,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

京逝世。——第113页。

137　一九二三年八月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发表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一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孙中山对此采取积极支持态度。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容的人民运动。各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一九二五年三月间，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113页。

138　冯自由，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谢持，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四年六月与张继等联名发出“弹劾共产党书”。一九二五年与邹鲁等发起西山会议。——第113页。

139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反动议案，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成立“地方党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第113页。

140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黄埔军校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组织。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第114、155、166页。

141　孙科，当时任国民政府广州市长。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曾提出弹劾共产党。——第114页。

142　五五宪草，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的简称。这个“宪草”的主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第114、228、265页。

143　李济深（一八八六——一九五九），早年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广州，一九二七年参加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九三三年联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第114、174、283页。

144　邓铿（一八八六——一九二二），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七年起任粤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等职。——第114页。

145　张发奎（一八九六——一九八〇），曾任粤军第一师团长，一九二五年任国

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114页。

146 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一九二〇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粤军,历任营长、团长。一九二六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二七年三月与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等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下令通缉。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后,邓流亡苏、德等国。一九三〇年回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第114、166页。

147 辛亥革命,指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推翻清朝专制朝廷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年十月十日,一部分驻在湖北武昌的"新军"在革命团体策动下,发动了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由于各省相继响应,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114、151、246、318页。

148 新军,指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辛亥革命前夕,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日益增多,新军就成为武昌和各地起义的重要力量。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的民间秘密团体。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利用会党举行武装起义。——第114页。

149 陈其美(一八七八——一九一六),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江浙一带策动反清革命运动,同时在上海加入青帮为大头目。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一九一二年初,指使蒋介石刺杀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第115、151页。

150 中华革命党,参见注〔2〕。——第115页。

151 黄克强,即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一九〇四年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任会长。一九〇五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黄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一九〇七年起,多次参与或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任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一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一九一三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第115页。

152 永丰舰,是广州革命政府的最大军舰。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曾在此舰避难。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舰"。——第115页。

153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炮击设在广州的总统府。——第115页。

154　王柏龄，当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积极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五年代理黄埔军校教育长。——第116页。

155　王懋功，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卫戍总司令，一九二六年二月被蒋介石免职。后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第116、201页。

156　鲁易（一九〇〇——一九三二），一九二一年参加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党代表。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洪湖战斗中被俘就义。——第116页。

157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解散。——第116、166页。

158　一九二四年，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八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组织武装叛乱而偷运的军火。陈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并在全省各地煽动罢市。十月十日，广州群众为庆祝辛亥革命举行游行，遭到商团的射击，参加游行的十六个团体成立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坚决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调集工农武装、黄埔学生及其他军队，在十五日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第116页。

159　为了声援“五卅”运动，香港工人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开始举行总罢工，参加人数达二十五万；六月二十一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这两处反英的罢工合称为省（指省城广州）港罢工。六月二十三日，两处罢工工人合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成立纠察队，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使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这次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胜利结束。——第116页。

160 谭延闿(一八八〇——一九三〇)，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第117、165页。

161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第117页。

162 程潜(一八八一——一九六八)，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第117页。

163 一九二四年，彭湃创办广东省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至第五期由彭湃、阮啸仙等主办。一九二六年五月第六期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改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任所长，肖楚女、彭湃、恽代英、周恩来、阮啸仙、赵自选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员。这一期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共三百二十七人，同年九月结业。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武昌又举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过一期学员。——第117页。

164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和黄埔学生军约十万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经沙基时，遭到沙面租界内英法军队机枪扫射，当场被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这次事件被称为沙基惨案。——第117页。

165 许崇智(一八八六——一九六一)，当时任粤军总司令。——第118页。

166 彭湃的堂哥彭汉垣，受彭湃的影响投身革命，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任海丰县长。一九二八年三月被捕，后在广州就义。——第118页。

167 陈延年(一八九八——一九二七)，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五大”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六月被捕，七月在上海龙华就义。——第118页。

168 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政变后回国。——第118、166页。

169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第二、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

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到鄂豫皖苏区第四方面军工作，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委。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党籍。——第119、140、159、213页。

170　陈独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六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否认无产阶级应继续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和托派组织相结合，一九三一年五月曾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第119、140、160、209页。

171　加伦（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即布留赫尔，当时是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一九二四年来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政变后回国。——第120、170页。

172　张静江（一八七七——一九五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一九二七年帮助蒋介石筹划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促成了蒋、汪（精卫）间的反革命联合。——第120页。

173　张太雷（一八九九——一九二七），一九二〇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五年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月出席“八七”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十月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十二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第120、174页。

174　李福林，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第120页。

175　欧阳格，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指挥、舰队司令。——第121页。

176 古应芬，一九二四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广东省民政厅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参与镇压广州起义。——第121、165页。

177 蒋先云（一九〇二——一九二七），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秘书，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省港罢工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总部秘书、补充第五团团长、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一九二七年任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五月二十八日在河南临颍战役中牺牲。——第121页。

178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第121页。

179 彭述之（一八九六——　　），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任《新青年》、《向导》编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主义分子，采取了托洛茨基的反动立场，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第123、159、216页。

180 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组织部代部长。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与其弟陈立夫一起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特务系统。——第123、151、155页。

181 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党务部主任；王法勤，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委员。

“大同盟”，是丁惟汾在“五四运动”以后组织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大同盟”一度成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领导的组织。孙中山逝世后，“大同盟”逐步走上拥蒋反共的道路。——第123页。

182 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123页。

183 朱克靖（？——一九四七），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政治部顾问、苏浙行署主任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联络部部长。一九四六年在我党争取郝鹏举部起义后任该部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郝叛变时被扣，同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秘密杀害。——第123页。

184　罗汉，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学习时参加托派组织。——第123页。

185　林伯渠（一八八五——一九六〇），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第123页。

186　一九一一年（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参议院议定将这一天作为国庆节，通称“双十节”。——第124页。

187　缪斌，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第124页。

188　柯棣华（一九一〇——一九四二），原名德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印度人。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格兰特医学院。一九三八年九月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二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突破国民党的阻拦到达延安。同年十二月赴晋东南抗日前线。一九四〇年八月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九日在河北唐县逝世。——第126页。

189　两岩，即红岩、曾家岩。红岩，指重庆市郊区化龙桥红岩嘴十三号，抗日战争期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曾家岩五十号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在市内的办公地点。——第128页。

190　斯大林说过的三点，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原文是：“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的结果；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45—146页）——第129页。

191　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39—140页）。——第131页。

192　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41页）。——第131页。

193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西斯德国侵占巴黎后，以当时法国总理贝当为首的卖

国分子向德国投降，七月一日将政府迁至维希，组织维希傀儡政府。——第 133 页。

194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片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始了卫国战争。——第 133、202 页。

195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德国对美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十二月十日，日本空军又在新加坡附近海面袭击英国远东舰队，使英舰队遭到重大损失。——第 133、202 页。

196 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在共和国后方有许多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三六年十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联合进攻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时，叛军将领摩拉在广播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已在首都等待着。后来，第五纵队就成了帝国主义在别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时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第 133 页。

197 列宁格勒保卫战：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国侵略军包围列宁格勒，苏联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历时十六个月，消灭了德军及其仆从军二十五万人。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苏军击破德军的包围封锁，列宁格勒解围。

莫斯科保卫战：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德军集中七十多个师向莫斯科大举进攻。苏军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顽强的防御，十二月六日转入反攻，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共歼灭德军五十个师，粉碎了希特勒的“闪击战”计划。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德国侵略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先后使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了大量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将其全部歼灭。这一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 133 页。

198 大西洋宪章，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

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当时德、日法西斯的侵略已使英、美两国受到损失，中国、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空前高涨。英、美两国在宣言中宣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第 133 页。

199　苏英同盟，全称《苏英战时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与国并在战后合作互助同盟条约》，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伦敦签订。主要内容是：苏、英两国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结成互助同盟；战后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德国重新侵略；双方决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同盟或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参加了北大西洋集团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苏联宣布废除这个同盟条约。

苏美协定，亦称苏美贸易协定。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苏、美以互换照会的办法签订，并规定每年展延有效期。一九四二年苏、美双方达成协议，将协定的效力一直维持到它被更广泛的协定所代替或一方声明希望停止生效时为止。根据这个协定，两国在有关货物输出输入各项问题上享有无条件的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宣布一九三七年的协定无效，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断美、苏原来的互惠贸易关系。——第 133 页。

200　二十六国公约，即《联合国宣言》。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波兰、印度和加拿大等二十六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止，法国、墨西哥和菲律宾等二十一国陆续表示赞同这一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一)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二) 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第 133 页。

201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西斯德国侵占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法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从组织怠工、罢工到建立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游击队已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戴高乐将军在国外组织自由法国运动，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九四三年一月法国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合作协定，六月三日统一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宣告成立，法共议员密台尔、法戎以个人名义参加。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第二次改组，法国共产党正式派出代表参加。——第 134 页。

202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国外的德国人建立的反法西斯组织。一九四三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的有德国反法西斯的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科学家、工程师和德国战俘营代表，正式成立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通过了宣言，选举出著名作家怀尔纳特为委员会主席。——第134页。

203 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一八九二——　　)。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延安，组织和领导了“日本在华士兵反战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任日共主席、名誉主席。——第134页。

204 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垮台；墨逃到意大利北部，充当德占区傀儡政权头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第134页。

205 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华北的日军和汉奸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在游击区实行“大检举”，在敌占区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第135页。

206 吴开先是追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官员，一九四三年五月带着日本招降蒋介石的条件，由南京到重庆，蒋介石曾亲自接见。——第135页。

207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日本大本营报道部部长谷萩那华雄发表对蒋介石的诱降谈话，内容是：倘同意停止抵抗，参加反美、英之战线，则日军将由中国撤退，承认中国之独立。——第135页。

208 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人员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为“三三制”。——第136、154、161、253页。

209 一九四一年一月，取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由皖南北移的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镇遭到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突然围攻。经过九个昼夜的浴血战斗，叶挺军长负伤被俘，九千多名指战员大部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在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乱”，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军法审判”。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

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的诬蔑，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十二条严正要求。——第137、175、201、219、235页。

210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胡宗南从担任河防的三个军中调出两个军，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发动内战。延安人民举行大会，动员保卫边区。毛泽东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历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揭露其进攻边区的阴谋。蒋介石被迫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第137页。

211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1页）——第143页。

212　见《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文是："法西斯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猖狂的进攻；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旧的译文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本文引用的是旧译文——编者注）；法西斯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最恶毒的敌人！"（《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45—46页）——第143页。

213　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藩部"，历代都有职官专管或兼管民族事务，例如清代专设了理藩院，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事务。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主要是用镇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对待边疆各少数民族。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继承了这种政策，甚至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的大小宗支。——第144页。

214　见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566页。——第144页。

215　见古文《尚书·大禹谟》。这段引文是书中舜教导禹的几句话。意思是：民心很危险，危则难安；道心很幽微，幽则难明；要专心致志地研究，以掌握其

中的奥妙。——第145页。

216 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05页。——第145页。

217 见《礼记·中庸》。原文是："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中庸》把"诚"说成是人人具有的天赋道德，同时又是客观事物的总规律。有了诚，才会有万物的存在；如果不诚，就没有客观事物。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文中的"无物不诚"、"有物不诚"是引申"不诚无物"一语，用唯物主义观点对蒋介石进行揭露与讽刺。蒋介石否认共产党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妄想消灭共产党，所以说他是"无物不诚"。人民革命力量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公开承认了边区存在的客观事实，但他仍然想一手取消，所以说他是"有物不诚"。——第145页。

218 庐山谈话会，指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第146、194页。

219 蒋介石鼓吹的力行哲学，是割裂知行关系，孤立强调"行"的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愚民哲学，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哲学。——第146页。

220 连坐法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人民的一种法律。它规定一人有罪，家属、亲友甚至邻居也连带给予治罪。《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蒋介石为巩固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分别在地方和军队中推行连坐法。——第146页。

221 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一九年参加德意志工人党（次年改为国社党），其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第146页。

222 四维八德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规范。四维，指礼、义、廉、耻；八德，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第146页。

223 《皇朝经世文编》，清贺长龄编，共一百二十卷，选辑清初至道光以前的官方文书、论著、奏疏、书札等，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部分。

陈弘谋，一作宏谋，清雍正进士，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所编《五种

遗规》，采辑历代有关修身、治家、处世、居官、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言论和事迹，分为五类，即《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第147页。

224　曾，即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晚清官僚，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主将。一八五二年为镇压太平军，开始在湖南招募、训练地主武装——团练。因士兵和将领大多用其家乡湘乡人，故名湘军。湘军自上而下有严密的封建隶属关系，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统领。中国近代军阀军队从湘军开始，以后袁世凯、段祺瑞直到蒋介石，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胡，即胡林翼（一八一二——一八六一），在贵州任知府期间镇压苗民起义，一八五四年后到湖北、江苏等地镇压太平军，是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首领。

左，即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一八六〇年任湖南巡抚的幕僚时，招募人马组成左系湘军，又叫楚军，在江西、安徽镇压太平军。一八六六年后又连续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成为著名的湘军军阀。

李，即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淮军军阀。一八六一年受曾国藩之命，回安徽原籍将淮南团练按湘军方式加以改编，组成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第148页。

225　拿破仑·波拿巴（一七六九——一八二一），即拿破仑第一，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七九九年在法国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雾月十八日（十一月九日）政变，自任第一执政。一八〇四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第148页。

226　“三二〇”事变，参见本书《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第120—121页）。——第148、159、208页。

227　“宁”，指南京政府；“汉”，指武汉政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革命群众运动的声势，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推动下，采取了“联共反蒋”的态度。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罢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全部职务，并申讨蒋介石。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并通过“清党”等反革命决议案，通缉共产党员，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及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这时出现的南京与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称为“宁汉分家”。

同年五月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公开走上反共的道路。七

月十五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公开屠杀共产党员。从此“宁汉合作”，蒋汪反革命合流。——第148、208页。

228 《礼运》大同篇，指《礼记·礼运》篇中对于“大同”之治的论述。“大同”是儒家宣传的理想社会，是小生产者的空想。——第150页。

229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统治山东的军阀。早年在上海陈其美部下当团长。一九一三年投靠直系军阀，后投靠奉系军阀。——第151页。

230 陶成章（一八七八——一九一二），一九〇四年在上海参加组织光复会，是该会领导人之一。一九〇六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后，发动上海、浙江等地的反清起义。一九一二年一月被陈其美、蒋介石暗杀于上海。——第151页。

231 《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编辑的曾国藩、胡林翼关于治兵言论的小册子。——第151页。

232 西安事变，参见本书《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文的题解。——第152、191、247、252页。

233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是一个两面性的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形式上的让步也成为一纸空文。——第152、252页。

234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规定由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加上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称为法币。——第153页。

235 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为加强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控制，四月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也取消了孙文主义学会），七月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自任会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个同学会成为蒋介石笼络和控制嫡系军事骨干的组织。——第155页。

236 康泽（一九〇六——一九六七），原国民党特务头子。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六三

年被特赦后，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155页。

2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讨论了中国问题，并作出了决议。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第158页。

238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召开。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第158页。

239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指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当时，在要不要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各党派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一贯支持沙皇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立宪民主党，欺骗工农，散布不经过革命和起义就可以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制度的幻想；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主张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反对武装起义，对沙皇政府实行妥协；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错误路线，揭露立宪民主党维护沙皇制度的反革命实质，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号召和领导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这次革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十月革命的预演。——第158页。

240　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一九二五年成立于莫斯科，一九二九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三〇年秋停办。——第158页。

2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讨论了中国问题，并作了决议。——第158页。

242　二月革命，指俄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历）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反沙皇制度的罢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首都卫戍部队也参加了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布尔什维克又领

导人民为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158页。

2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全会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并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第159页。

244 罗易，曾是印度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过中国。后来成为叛徒，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多里欧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曾来过中国。——第159页。

245 罗米那兹（一八九七——一九三五），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武汉“七一五”政变后，参加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提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认为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第160页。

24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参加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三万余人。起义部队八月五日撤离了南昌南下广东。九月底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彭湃、颜昌颐等率领下，同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力量相会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第160、246页。

247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等。会议否认革命处于低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敌人的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规定党的任务是“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会议还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60页。

248　十大要求，指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条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第161页。

249　参见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文中说："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形式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有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而且必须指出，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者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3页）——第161页。

250　两权并立是资产阶级创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两者互相制约。——第161页。

251　南四行，指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寄廎）、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第163页。

252　这两次屠杀，参见注〔9〕、〔10〕。——第163页。

253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同时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七年改称农工民主党。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163页。

254　史量才（一八七八——一九三四），一九一三年起任《申报》总经理。蒋介石统治初期采取拥蒋立场，"九一八"以后政治态度逐步改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曾捐款支持抗日，并任抗日群众组织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后来又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特务暗杀。

杨杏佛（一八八三——一九三三），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

年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抗日的进步活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蒋介石特务暗杀。——第164页。

255 孙科，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第165页。

256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〇），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第165、211页。

257 机器工会，原名“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后改名为“广东机器工会”，是国民党右派利用的工具。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协助反革命政权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年十二月参与镇压广州起义。——第165页。

258 吴铁城（一八八八——一九六三），一九二四年任广东革命政府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广东警卫军司令、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第165页。

259 马超骏（一八八六——一九七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头子。——第165页。

260 胡毅生，胡汉民堂弟。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参加创办国民党右派报纸《国民新闻日报》，积极反共。廖仲恺被刺后，潜逃香港。——第165页。

261 参见孙中山《致蒋介石手札》（见《孙中山选集》第876页）。精卫，即汪精卫；展堂，即胡汉民。——第166页。

262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在中国共产党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后，主持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主持中央工作时，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八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集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等“左”的教条主义宗

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同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被留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166页。

263 汪陈宣言，指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极力掩盖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声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同时又表示“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国民党”。宣言使工人阶级解除思想上的武装，放松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警惕。——第166页。

264 吴稚晖（一八六六——一九五三），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坚决反苏反共。——第166、228页。

265 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紧急会议上决定，利用当年的秋收时节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农民武装暴动。会后，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多次农民起义。参见注〔18〕、〔275〕。——第168页。

266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主力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部队曾占据市内绝大部分地区，一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起义武装中的一部分与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起义武装会合；一部分转移到广西，以后参加了左、右江的农民武装起义；一部分参加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转战到了井冈山。——第168、212页。

267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当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第168页。

268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选出领导起义的党总部。会上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他们在自己的意见遭到否决后，竟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的冒险行动，公开向敌人泄露了党中央关于在最近期间举行起义的决定。——第169页。

269 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一九二〇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曾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一九四五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一九四八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169页。

270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国民党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解散，军校学生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169页。

271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一九二四年打败直系军阀后，他的势力伸入关内。一九二六年又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退回东北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第170页。

272 伍廷康（一八九三——一九五三），原名魏金斯基，苏联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一九二〇年春来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代表第二次来中国。——第170页。

273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工农群众。这次事变是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前奏。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马”字来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次事变又称为“马日事变”。——第170页。

274 顾孟余（一八八九——一九七二），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第170页。

275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指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人民武装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举行的起义。后来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转战到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第172页。

276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为防贺龙、叶挺部入粤，让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绍

竑率军驻守北江。当时统治广州的汪精卫，担心黄绍竑的势力伸展到广东，派张发奎率第四军回粤挡截黄的军队。——第 174 页。

277 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革命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第 175 页。

278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指一九〇六年由沙皇政府大臣斯托雷平颁布的土地法令。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富农可以用贱价收买土地。这个法令的实行，使村社瓦解，富农地位加强，少地农民和贫民的状况恶化，农民的分化加剧。——第 176 页。

279 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创办《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三月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〇年五月六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就义。——第 179、333 页。

280 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六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京、上海郊区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参加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一九四五年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从事民主运动。——第 179、238、263、333 页。

281 职工国际，又称赤色工会国际。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三七年底解散。——第 182 页。

282 李明瑞（一八九六——一九三一），一九二九年任国民党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军事特派员。同年十月下旬和一九三〇年二月，他和所属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相继举行右江、左江起义，先后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李任两军总指挥。一九三〇年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率红七军转战到达中央苏区，同年牺牲。——第 183 页。

283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领导下，在江西宁都县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第183页。

284 沈泽民（一九〇二——一九三三），中共早期党员。曾在我党领导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一九三一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第184页。

285 向忠发，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第184页。

286 任弼时（一九〇四——一九五〇），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第185页。

287 李富春，一九二八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等职。——第185页。

288 关向应（一九〇二——一九四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党的第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186页。

289 文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第188页。

290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第188、200页。

291 延安文教大会，即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第188页。

292 察北同盟军，即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还有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同盟军在张北、沽源等地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把日伪军完全逐出察哈尔省境。由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同盟军的抗战活动于同年十月失败。——第191页。

293 福建人民政府，是国民党内同蒋介石分裂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年十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

订了停战协定。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福建人民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失败。——第191页。

294 这封信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的反动方针，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第192页。

295 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前，应以实现全国抗战为根本，不愿和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将抗日东征军撤回黄河西岸。——第192、248页。

29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第192、247页。

297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一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两个团，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战。——第192页。

298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任我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年秘密叛变，成为国民党潜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奸细。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香港等地我党情报、统战部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五五年他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第192、238页。

299 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七)，东北军爱国将领。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派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王以哲等主张和平解决。在反动势力的挑动下，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王以哲被少壮派刺杀。——第193页。

300 这个报告，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

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文内所说毛泽东在五月代表会上作的报告，也是指这篇文章。——第193页。

301　这篇文章指《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第194页。

302　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第194页。

303　林伯渠，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第195、253页。

304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谈判，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改编为一个军四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谈判中周恩来还提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复职授权等问题。因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无结果，最后只达成了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的协议。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安谈判后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再次重申了我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蒋介石则提出收编红军等无理要求。周恩来严正予以拒绝，同时仍坚持继续谈判。

一九三七年六月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宋子文谈判。在设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人事任命问题上，双方争论很久未得解决。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十七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八一三”以后，蒋介石被迫在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上述宣言并同意八路军设立总部。——第195页。

305　顾祝同（一八九二——　），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皖南事变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195、201页。

306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八路军的三个师先后开抵山西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板垣师团一部约三千人。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第195页。

307　这个协定，指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197页。

308　徐向前（一九〇二——　），一九三九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任第一纵队司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第198页。

309　鹿钟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和八路军进行摩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不断制造摩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第198页。

310　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军长。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三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彻底击败。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军团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第200页。

311　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曾奉蒋介石命令在河北一带同八路军摩擦。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200页。

312　汤恩伯（一八九八——一九五九），当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军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第200页。

313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这就是平江惨案。——第200页。

314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十二两日，河南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新四军伤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群众共二百余人，这就是竹沟惨案。——第200页。

315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这次进攻被新军的反击所粉碎。同时，阎军又在山西东南部进攻新军，摧残阳城、晋城、长治、沁水等地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团体，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第200页。

316 这次谈判是指一九四〇年六月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第200页。

317 参看《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谮，进谗言，说人的坏话；畀，给予；北，指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第201页。

318 "皓电"是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到黄河以北。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以外，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第201页。

319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十月十九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皓电"中将所谓"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向我党提出。——第201页。

320 两个军，指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苏鲁皖游击总队总指挥李明扬的部队和李守维的八十九军。——第201页。

321 陈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代理军长。——第201页。

322 日苏协定，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废除这一条约。——第202页。

323 新疆问题，指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间，新疆独裁统治者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抛弃革命伪装，大肆逮捕和杀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事件。——第202页。

324 张群，从一九四〇年起任国民党军成都行辕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第202、266页。

325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第202页。

326　邓颖超（一九〇四——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第202页。

327　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任国民党军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一九四六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留住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第203、257、319页。

328　一九四四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第204页。

329　赫尔利，美国共和党政客。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十一月间曾到延安同我党商讨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同年底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离职。——第205、254页。

330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两次由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第205页。

331　民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一九四一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今名。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重建组织。同年五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205、259、275、283页。

332　国民党政府曾决定在一九三六年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了“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并规定自七月起选举国大代表，十一月

十二日开会。但这次大会没有开成。——第206、228、243页。

333 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驻希腊盟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军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向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希腊爱国人民。——第206页。

334 陈赞贤(一八九四——一九二七)，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一月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和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三月六日在赣州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第209页。

335 瓦窑堡会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第210页。

33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上海工人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第212页。

337 这是针对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中的错误观点的批评。——第214页。

338 七个统一，是王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提出的主张。——第219页。

339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进步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蚁社。——第219页。

340 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把建设民国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需由政府选派考试合格人员，协助各县筹备自治，即进行县政建设和训练民众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达到规定的标准后，始能实行县自治。一省全数县已实行自治时，始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全国过半数省份开始实行宪政时，才能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训政为名，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实行法西斯统治。——第222、227、265页。

341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中称："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第223页。

342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中、苏、美、英发出照会，接洽投降。八月十二日，中国、苏联、英国政府同意美国提出的以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统帅麦克阿瑟为同盟国占领日本的最高统帅，中国、苏联、英国都派遣高级将领参加盟军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的投降。——第223页。

343　一九四五年一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施的步骤问题。蒋介石在三月一日的演说中，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同年七月四日，中共代表与来延安的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蒋介石在七月七日的参政会开幕词中，竟把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坚持召开独裁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合理批评，诬指为"肆意攻击"。七月十九日国民党控制的参政会通过决议案，再次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第223页。

344　邹韬奋（一八九五——一九四四），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从一九二六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二年创办生活书店。一九三三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七月被迫流亡国外。一九三五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与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日战争开始后获释，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政治斗争。皖南事变后被迫流亡香港，重新刊行《大众生活》。日军侵占香港后赴广东东江游击区，一九四二年到苏北解放区。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因病逝世。中共中央接受他遗书中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第225、238页。

345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

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合称“政协决议”。——第226、234、242、249、255、262、272、283、367页。

346 蒋介石的四项诺言是：(一)保障人民自由；(二)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三)实行普选；(四)释放政治犯。——第226、243页。

347 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重庆各界人民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每天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遣特务捣乱会场，殴打会议主持者及与会群众，跟踪、威胁到会讲演的政协代表。——第226页。

348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六十多人，这就是较场口事件。——第226、243页。

349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重庆沙磁区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多人。随后，《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也被特务捣毁。——第226页。

350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西安煽惑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袭扰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第226页。

351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名义，纠集逃亡地主、特务、流氓等千余人，举行反共游行，骚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226页。

352 廖承志(一九〇八——　　)，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第226页。

353 国民党反动派为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公布的“训政纲领”中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决定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及各政务官的人选。——第227页。

354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和监察权。“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不与国宪相抵触的省宪。——第227、234、256页。

355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的宪法原则。——第 227 页。

356 建国大纲，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见《孙中山选集》第 569—571 页。——第 228 页。

357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与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举行的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在宪草修改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商得了三个协议：一、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二、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第六项第二条条文取消（这一条文是“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第 228 页。

358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五项决议：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根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这里讲的“所增加之两点半”，指上述五项决议中的第一项、第四项和第二项的“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第 228 页。

359 整军方案，即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全文共八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全国陆军为一百〇八师（每师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其中中共部队十八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在十二个月内全部复员；此外还对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等作了规定，并确定以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实施本方案的执行机关。——第 229、234、244、255 页。

360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七月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 229、234、242、249、255、262、272 页。

361 林，即林平（现名尹林平），当时任广东东江抗日纵队政治委员。

郑，即郑绍文，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新四军

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处长。——第229页。

362 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职业军人，政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离华回国。——第229、238、255、262、281、321页。

363 三人会议又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参加组成的停战机构，马歇尔担任主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都受其领导与指挥。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蓄意破坏停战协定，美国又执行助蒋内战政策，同年六月以后三人小组会议停止活动。——第230、244、259、266页。

364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就需要修改……一党训政制度。”——第231、255、262页。

365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二十七日发表会议公报。公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问题上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有一团结的与民主的中国之必要，并且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第231、255页。

366 五方面代表，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的代表。——第231页。

367 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都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的烈士。

王若飞(一八九六——一九四六)，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以后，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一九二八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一年回国，在绥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狱中坚持革命斗争。一九三七年夏出狱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一九四四年五月任中共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在党的第五、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第233、254页。

368　博古，即秦邦宪（一九〇七——一九四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同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犯过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一九三八年起先后任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起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代表。——第195、233页。

369　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字希夷，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率部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斗中获胜，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一九二六年十月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十二月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出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一九三七年底到延安，后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出狱，七日由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第114、174、202、213、226、233页。

370　邓发（一九〇六——一九四六），一九二二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罢工和东征战役。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长征时任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九三八年起历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民运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四五年九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第233页。

371　黄老先生，即黄齐生（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教育家。清末在贵阳创办达德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一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主办遵义中学。一九二九年后在晓庄学校任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为抗日运动奔走。一九四五年赴延安。一九四六年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代表延安各界赴渝慰问被殴打的民主人士。——第233页。

372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等同机遇难的还有八路军中校参谋李绍华，副官赵登俊、魏万吉，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黄齐生先生的孙子、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和美军驾驶员兰奇上尉等四人。——第233页。

373 双十国共会谈纪要，参见本书《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第252—254页）。——第234、252、273、367页。

374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在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但协议签订才三天，国民党军队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向我营口、鞍山、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第234、255、263页。

375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军队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中原解放军在六月底分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第236页。

376 胡宗南，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第236、274页。

377 李公朴（一九〇〇——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十一月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战开始后获释。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第237、239、243、263页。

378 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诗人、学者。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长子闻立鹤为掩护闻一多也受重伤。——第237、239、241、243、263页。

379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民办报纸《秦风工商联合报》。四月逮捕并杀害该报法律顾问、民主同盟盟员王任律师。四月三十日夜，

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西安民主同盟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中共党员李敷仁(当时伤重未死,经群众抢救掩护辗转到达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这就是西安血案。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到达江苏南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执行小组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杀害参加欢迎的群众二十余人,随同执行小组到南通的新华社记者孙天平同时遇难,这就是南通血案。——第237页。

380 小超,即邓颖超,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第238页。

381 伍云甫(一九〇四——一九六九),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第238页。

382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第238、259、323页。

383 国民党反动派在撕毁政协协议、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的前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单方面颁布所谓"停战令",以掩盖其政治上分裂的阴谋,推卸扩大内战的责任。——第244页。

384 云南起义,指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爆发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蔡锷等在这一天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随即得到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的响应。次年六月,袁世凯病死。——第246页。

38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者唆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向绥东(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一带地区)进攻,为当地军民所击溃。——第248页。

386 "中美商约"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第249、266页。

387 这个宣言,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方针;针对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破坏团结、压制民主的活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紧急措施,主要内容是:(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二)划定八路军、新四

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第251页。

388 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国共共同纲领》，提出开放民众运动、释放政治犯、承认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项内容，建议国民党用两党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布，但为国民党拒绝，没有发布。——第252页。

389 青年党是“中国青年党”的简称，其成员是一些地主、资本家、政客和知识分子。一九二三年在法国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改名为“中国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参加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第253、259、262、275、284页。

390 张君劢（一八八七——一九六九），当时是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第253、285页。

391 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参见注〔357〕。——第258页。

392 五人会议，指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蒋介石指定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行的谈判。——第259页。

393 民社党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一九四六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其主要成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香港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宣布继续追随国民党，同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第259、263、275、284页。

394 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当时是《大公报》总经理。——第260页。

395 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当时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召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第260页。

396　杜聿明(一九〇四——　　)，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五九年被特赦释放，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263页。

397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各数十人，“巡逻”到天津西北七十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煽动，竭力想把美军牵入中国内战漩涡。我党及时揭露了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要求美国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第266页。

398　航空协定，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领空权的“空中运输协定”。——第266页。

399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蒋管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分别成立“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学生群众的这一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第269页。

400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冻结生活指数”，即不管物价如何飞涨，工人工资只能维持在一月份的水平，不能相应增加。（以上海米价为例，一月初每担售伪法币六万元，同年六月已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上海工人、店员在五月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坚决反对这一反动措施。国民党政府被迫在六月宣布解除对生活指数的冻结。——第270页。

401　吴，即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张，即张友渔(一八九九——　　)，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第270页。

402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起，国共双方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三个问题的谈判。参加谈判的除国共双方代表徐永昌、周恩来外，还有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美蒋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拒绝了我方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四项建议。——第273页。

403　这次改组政府，指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收买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无

党派的政客参加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称，这次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是“自由主义”和“多党”的政府，用以粉饰其独裁统治。——第275页。

404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国民党控制的第四届第三次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出席讲话。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和苏州、杭州、上海赴南京学生七千多人到参政会的会址国民大会堂前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打伤学生百余人。——第276页。

405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十三万余人，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起，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和谢富治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一个军八万余人，在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十八万人，同年九月上旬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地区。——第278页。

406 孙连仲（一八九三——　　），当时任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

傅作义（一八九四——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第279页。

407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280、286页。

408 美国政府给蒋介石的军事、经济援助，截止一九四九年的统计数字，抗日战争期间为十五亿六千七百八十万美元，解放战争期间为四十六亿四十万美元。两项共计六十二亿八百二十九万美元。——第281页。

409 魏德迈，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分来华，寻求支持与控制蒋介石集团的办法。——第281页。

410 宋子文，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先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第281、283页。

411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先后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

香港，十一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出领导机构，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等为常务委员。同时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第283页。

412　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283页。

413　这个指示，指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等人的假和平阴谋的指示。当时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策动支持下，少数地方系政客、军阀及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企图发动一场假和平运动，使面临总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取得喘息时机，使人民革命半途而废。刘航琛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央的这个指示揭露了这一阴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283页。

414　伪宪，指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华民国宪法》。——第284页。

415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组成。一九四五年成立。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285页。

416　君主立宪制，是保留君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君主权力受宪法限制的政治制度。这里是指保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只进行某些改良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主张。——第285页。

417　这个宣言，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1179—1183页）。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第286页。

418　“五四指示”，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第288页。

419 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建立的。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和陕甘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曾领导人民先后进行了平分地主土地，废除农民债务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布暂时停止没收和平分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但对于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果实则坚决予以保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陕甘宁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和房屋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见《毛泽东选集》第370页），宣布取缔这种违反团结抗日原则的破坏行为。在这以后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一个时期内，陕甘宁边区人民根据“布告”精神，坚决地进行斗争，使土地又陆续归还了农民。——第288页。

420 陕西省绥德县黄家川，当时属于陕甘宁边区。它的典型经验是：在已进行过土改的基础上，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方法调剂土地，使土地分配更为合理，既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第289、299页。

421 河北省平山县，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典型经验，是指这个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经验。——第295页。

422 用三查与诉苦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一个重要运动。“三查”和诉苦是在部队中发动广大指战员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的痛苦。——第303页。

423 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被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的那次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召

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第307、357、363、366页。

424 李宗仁(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原为国民党桂系首脑。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第307、317页。

425 蒋介石反动集团崩溃前夕，为了进一步搜刮人民，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主要内容为发行"金元券"，并限期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禁止任何人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民间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第310页。

426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成立"特种刑事法庭"，八月十七日以行政院名义发布命令，发动所谓特种刑事检举。由特务、暗探开列进步的工人、学生的"黑名单"，并自八月十九日起陆续在报上公布学生的黑名单，限令他们在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到特种刑事法庭"投案"，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逮捕。——第310页。

427 郑洞国(一九〇三——　　)，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率领所部在长春放下武器。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第313页。

428 曾泽生(一九〇二——一九七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在长春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313页。

429 王耀武(一九〇三——一九六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范汉杰(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锦州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3页。

430 吴化文(一九〇四——一九六二)，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长等职。——第313页。

431 肖劲光(一九〇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

肖华(一九一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313页。

432 陈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战争期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倡议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任主席,曾到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314页。

433 张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爱国民主人士。从抗日战争后期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314页。

434 济南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的战役。这次战役全部歼灭守敌(内有一个军起义)十一万人,俘虏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辽沈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辽沈战役迫使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放下武器,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司令卢濬泉、廖耀湘,共歼敌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

淮海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淮海前线我军的一切行动。这次战役毙敌兵团司令黄伯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兵团副司令吴绍周,共歼敌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

平津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底,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地区共

同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我军的一切行动。战役中先后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守敌，俘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由于我方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在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北平守敌接受我军改编，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全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第315、346页。

435　黄伯韬，参见注〔434〕。——第315页。

436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虚伪建议，主张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第317页。

437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第317页。

438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一月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布"引退"，把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退居幕后指挥。——第317页。

439　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以后，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在上海组织了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的"上海人民代表团"。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参加了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二月十四日到北平与我党商谈和平谈判问题，又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南京。——第317页。

440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第317、328页。

441　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九年在《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统计》一书中公布的资料，一九四九年中国现代性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第317页。

442 参见注〔425〕。——第318页。

443 广州，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所在地。溪口，在浙江省奉化县。蒋介石自宣布“引退”后，便住在溪口，幕后操纵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继续与人民为敌。——第318页。

444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发动了武装干涉。美军曾在苏俄北部和东部登陆，侵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牟尔曼斯克和海参崴等地，直到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才被迫分批撤离。——第323页。

445 傅泾波，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第323页。

446 师爷，是旧时对官署中幕僚的称呼，如刑名师爷、钱谷师爷等。旧时绍兴人在官署中担任幕僚的较多，因有“绍兴师爷”的说法。——第325页。

447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117页。——第329页。

448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至十日在北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后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331页。

449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在党的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333页。

450 汉学，亦称“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清朝的一部分学者用汉儒的方法研究经典，注重一字一句的考订，称为汉学，以与宋儒空谈义理的“宋学”相对立。汉学对整理古籍，辨别真伪，有不少贡献，但往往流于为考据而考据的倾向。——第333页。

451 这是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187—1204页）。——第336页。

452 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7页）。——第336页。

453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在北平召开。大会总结了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文艺工作经验，确定了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344页。